

当代经济前沿文库

经济学的 “科学困境”及人文转向

朱成全 著

FE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大 连

© 朱成全 20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学的“科学困境”及人文转向 / 朱成全著 . —大连 :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 2007. 7

(当代经济前沿文库)

ISBN 978 - 7 - 81122 - 041 - 4

I. 经... II. 朱... III. 经济学 - 研究 IV. 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8255 号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大连市黑石礁尖山街 217 号 邮政编码 116025)

总编室 : (0411) 84710523

营销部 : (0411) 84710711

网 址 : <http://www.dufep.cn>

读者信箱 : dufep@dufe.edu.cn

大连北方博信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发行

幅面尺寸 : 148mm × 210mm 字数 : 195 千字 印张 : 7 1/4

印数 : 1—2 000 册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 杜 峰

责任校对 : 李海峰

封面设计 : 张智波

版式设计 : 孙 萍

ISBN 978 - 7 - 81122 - 041 - 4

定价 : 24.00 元

本书由

中国第 37 批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

辽宁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资助

大连市人民政府资助出版

前 言

“经济学是什么”是经济学方法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关系到经济学学科性质及其理论建设的重大问题。经济学中几乎所有重大的争论、困惑和危机都会上升到这一问题及对其的回答上。

经济学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科学偏重真，人文偏重善和美；科学被称为“工具理性”，人文被称为“价值理性”。科学与人文都是对人或人类社会最高境界“真、善、美”的追求。

经济学具有科学性，这是因为从科学的划界标准来看，经济学有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体系、检验标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或解释世界，以至于能够指导人们改造世界。

但是，经济学和自然科学是有重大区别的，自然科学通常能够做到“价值中立”，而经济学却往往很难做到。所以，如果经济学完全具有科学性的话，就意味着经济学和自然科学没有本质的区别，这必将导致经济学的“科学困境”。

摆脱经济学“科学困境”的出路就在于经济学还具有人文性。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表明了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经济学不仅要从科学角度来进行理解，还应从人文角度来进行理解。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角度来看，经济学是人学，必然具有人文性。经济学中充满了价值判断和道德特质。

依据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经济学可以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依笔者看来，西方经济学还处于功利境界，具有科学性，但尚未进入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缺乏人文

性。虽然西方经济学有人文追求，但是，这从属于科学追求，且局限于功利追求。所以，西方经济学仍然缺乏合理的人文追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有科学追求，又有人文追求，并且强调通过科学来实现人文追求。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更具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如果仅仅将经济学视为科学，就是科学主义的理解，必将使经济学走向“科学困境”，而缺乏人文性。如果仅仅将经济学视为人文，就是人文主义的理解，必将使经济学缺乏科学性。

由上，笔者认为：

第一，经济学不仅要应用科学方法，而且要应用人文方法。

由于人文学科是以人文世界为研究对象的，所以，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对“意义”的理解方法，而不能像研究自然界那样去进行实证分析。要特别强调的是，人文学科必须遵循历史学科的原则和方法，即历史主义的原则、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人学或人道主义的方法。经济学的德国历史学派就在某些方面不自觉地运用了历史主义的原则。恩格斯曾经说过，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第二，要将“经济人”与“道德人”、“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同时要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性，来构建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具有西方文化特色，我国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参照 19 世纪到 20 世纪的西方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每一种文化的合理思想，这样，才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构建出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经济学。

第三，西方经济学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丰富的营养。

西方经济学要从功利境界提高到道德境界、天人合一境界，当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还应当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性——“天人合一”思想、“人际协调、道德修养”思想、“义利”思想、“中庸”思想、“自由经济”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意象语言。

以上是我的思考，会存在疏漏或不当，衷心恳望同仁们批评、指正。

朱成全
2006年12月

目 录

第1章 导 论.....	1
1.1 经济学：科学与人文的统一	1
1.1.1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	1
1.1.2 “两种文化”在经济学中的表现	9
1.2 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科学特质与人文特质的统一	16
1.2.1 社会科学的学科性质之争：科学抑或人文？	16
1.2.2 经济学：科学特质与人文特质的统一	18
1.3 马克思的经济学观.....	21
1.3.1 科学：“人的科学”	21
1.3.2 马克思的人文经济学观：科学与人文的统一	25
第2章 经济学的“科学困境”及其出路	34
2.1 作为科学的经济学.....	36
2.1.1 科学标准的演化.....	36
2.1.2 经济学正走向科学.....	43
2.2 经济学“科学困境”的种种表现	56
2.2.1 对象问题.....	57
2.2.2 价值问题.....	57
2.2.3 假定问题.....	58
2.2.4 实验问题.....	60
2.2.5 过度的数学化问题.....	62
2.2.6 理论体系问题.....	65

2.2.7	预测问题.....	67
2.2.8	检验问题.....	69
2.3	经济学的科学特质是单方面的.....	69
2.3.1	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	70
2.3.2	作为科学经济学的人文转向.....	74
第3章	作为人文的经济学.....	80
3.1	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反思.....	80
3.1.1	“稀缺规律”的自身矛盾.....	80
3.1.2	人力资源稀缺是一切经济问题的总根源.....	83
3.1.3	解决资源稀缺的根本点在于人类自身.....	84
3.2	经济学的人学本质.....	86
3.2.1	“经济学是关于人的学说”的逻辑分析.....	86
3.2.2	“经济学是关于人的学说”的历史分析.....	87
3.3	经济学的道德特质.....	97
3.3.1	西方经济学伦理道德观的发展.....	97
3.3.2	利他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108
3.4	经济学的价值分析.....	112
3.4.1	两个不同的研究对象.....	112
3.4.2	两种不同的价值判断理论.....	113
3.4.3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 西方经济学的超越.....	117
3.4.4	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132
3.5	经济学的境界.....	139
3.5.1	人生四大境界.....	139
3.5.2	不同人生境界中的经济学问题.....	142
3.5.3	走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功利困境.....	144
3.6	人文经济学如何可能？.....	145
3.6.1	“经济人”和“道德人”框架.....	146
3.6.2	“理性人”和“非理性人”框架.....	153
3.6.3	经济学的最高指标：人文指标.....	159

第4章 语言、文化传统和经济学.....	167
4.1 经济学的语言哲学反思	168
4.1.1 经济学中“语言转向”的根据	168
4.1.2 “语言转向”在经济学中的表现	169
4.2 构建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经济学	173
4.2.1 日本民族文化特色的管理经济学的启发	174
4.2.2 构建有中国文化特色经济学的设想	178
4.2.3 西方经济学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	182
4.2.4 中国传统哲学的意象语言与经济学	197
第5章 结论.....	201
主要参考文献.....	206
致谢.....	218

第 1 章 导 论

本章首先详细论述了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及其在经济学中的表现，指出：经济学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其次从社会科学的特质角度，论述了经济学具有科学特质与人文特质。马克思经济学是以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归宿的，这正是马克思经济学超越西方经济学、始终具有强大魅力的主要原因所在。

1. 1

经济学：科学与人文的统一

1. 1. 1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通常是以近现代文化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出现的。这一关系通常又被人们称为功利与人文、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

1.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

科学主义认为自然科学是人类知识的典范，通过科学家所描述的科学研究方法能够获得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在科学观上，它认为：第一，信奉科学是合乎理性的。第二，信奉科学知识是客观的。第三，确认科学是程式化的事业。如孔德的“观察——比较——实验”方法等。第四，相信科学方法可以推广到一切领域。它把科学方法直接运用于一切文化领域，使科学成为一切文化形式的基础，且以此为标准对其他文化形式进行重新建构，使其获得某种科学的形态。实证主

义就是如此。第五，主张科学是价值无涉的。它将科学内容的客观性等等同于与认识主体的无关性，进而认为科学和价值是完全对立的两极。

由此，科学主义认为，科学的最重要特点是实证性，即客观性、系统性、普遍性、精确性、检验性、预测性等。科学的最高价值是求真。所以，它认为，人文学科就不是科学。人文学科，通常被认为是与自然科学相对应的，是关于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学科，包括文学、艺术、历史学、哲学等。科学主义认为，人文学科的最重要特点是具有不可实证性，即主观性、个别性、模糊性、不可重复性、难以控制、难以量化等。于是，科学主义认为，要以其科学的标准来改造人文学科，且使之科学化。甚至有的科学主义者认为应该取消人文学科。当然，科学主义这一做法遭到了人文学家的坚决反对，于是，出现了人文主义思潮。

通常认为和“科学主义”相对立的“人文主义”，是指现代西方哲学中“人本主义”思潮和解释学等。总的说来，20世纪的欧洲大陆哲学，改变了主要以自然科学知识为对象的研究方式，日益显著地以人以及对其研究的人文学科为对象，从而形成了反“科学主义”思潮。比如，存在主义认为，“在人的世界、人的主体性世界之外并无其他世界”，且“人”是单纯的主观性存在，即孤独、苦闷、畏惧、焦虑，甚至面临死亡、绝境等的非理性存在。显然，存在主义是与“科学主义”不相容的。再如，早期解释学者狄尔泰认为，人文学科所指向的是人自身，是在实证主义视野之外的“生命的意义”。唯有通过理解所获得的知识在实证主义者看来，既不能被驳倒，也不能被证实，本质上不能被科学地解释。所以，早期解释学可以说属于同“科学主义”相对立的人文主义。

由于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科学致富”的强劲形势下，科学常被称为“工具理性”、“功利意识”。而哲学、文学等人文学科由于缺乏直接的功利效率，而被人们称为“价值理性”。所以，笔者所理解的“科学”除了具有实证性之外，还具有功利性。由此，人文主义反对科学主义思潮，认为科学给人带来的仅仅

是工具理性，即它使人仅停留在功利境界，从而对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没有任何帮助，与此同时，人文主义也总是强调以其来“规范”科学主义，即通常人们所说的“人文学科为科学启示方向”。

但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对立最终都失败了，这表现在：两者总是要求以自己的观点来努力改造对方的做法最终都失败了。比如说，科学主义总是强调以科学的标准来改造哲学，使哲学能够科学化，这就是科学哲学这一哲学派别兴起的原因，但是，科学哲学的发展尤其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发展的这段历史表明：科学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和其他文化没有绝对的界限，这样，以科学作为唯一的、标准的文化模式，且以之来改造其他文化是有问题的。事实上，科学哲学派别自始至终也未建立起它所追求的科学的哲学这一目标。与此相反，人文主义也总是强调以“人文”来改造科学，反对科学的工具理性。但是，在当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强劲形势下，人文主义反对科学的这一观点也是有局限的。

于是，出现了两者相互融合的趋势。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科学主义思潮渗透着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通俗地说，将科学视为一种文化现象，视为人性的表现，因而，要从文化或人性的角度来理解科学。与此同时，在科学主义影响下，人文主义思潮渗透着科学主义影响，通俗地说，人文主义努力将自己的观点奠定在科学事实的基础上，且以科学的标准来努力改造自己。

所以，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文主义思潮虽然就其本质来说是对立的，但又是相互影响的，即不存在两者的绝对对立。

依笔者理解，科学偏重对“真”的追求，人文偏重对“善”、“美”的追求，两者都是对人或人类社会最高境界——“真、善、美”的追求。在当今世界，虽然强调“科学”的观点已深入人心，但是，没有人文，科学的不当应用就会给人类社会带来问题乃至灾难，这就违反了人性。比如，“原子能”、“计算机”等科技成果在没有人文的规范下，就会使人走上歧途乃至犯罪；当今的“克隆”技术更是如此。这也说明了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为什么会非常强调科学家应该有很高的道德水平，以及他为何会拒绝“原子弹之父”这一

称号。

具体地说，科学和人文的关系为：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灵魂”。这就是说，人文应该以科学事实为基础，且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科学标准，而科学应以人文为价值规范，即人文应为科学提供价值规范。否则，没有科学，人文就不可能富有清晰性、准确性等；而没有人文，科学就失去了价值规范和方向。

2. 功利与人文、科学与哲学

功利与人文的关系，又称为“功利”与“终极关怀”（或超功利）的关系。前者主要追求的是现实的利益，常常把满足感官的享受作为首要的选择，精神、理想并不在视野之内。后者主要追求的是人生最深刻的意义和价值，帮助人们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与精神归属。

由于人总是在维持自己自然生存的基础上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人生价值，所以，人的完整生命存在并不仅仅是功利性的，同时也是“超功利”的。显然，这里的“超功利”并非“脱离功利”之含义，而是说立足于功利又摆脱功利的束缚，这是因为人不可能脱离功利物欲而过禁欲主义的生活，人生超功利的方面只能建立在功利追求的基础之上，把超功利理解为抛弃功利的“纯”精神生活只不过是一种虚构。“超功利”的真正意蕴不是教化人们在空洞的精神王国里生活，而是引导人们在追求功利的同时，勿陷入功利而不能自拔。它内含功利追求，其使命就在于实现从功利物欲到精神境界的升华，使人们趋向于崇高、真诚、友善。所以，功利和超功利的关系，就引证了上面所说的科学与人文的关系。^①

现在国际上所理解的哲学通常有以下几个定义：一为“哲学是关于存在、知识和行为的原理和真理的理性考察”。二为“哲学是关于知识的本性、存在、道德原则和美学价值的研究”。三为“哲学是

^① 参见丰子义：《关于人文精神批判与建设的几个问题》，载《青海社会科学》，1999（3）。

对最重要问题进行理性的和批判的尝试”。^① 其实，这三个定义大同小异，其共同特点在于强调哲学的理性分析功能。而依我看来，哲学的这一功能就是我国哲学界常说的批判、反思功能，即哲学总是对科学所包含的“前提”进行批判，这就是说，哲学的功能不在于其对科学进行概括和总结。马克思强调：理论不仅是为了说明世界，更主要在于改造世界。由此可知，马克思是非常强调哲学的批判功能的。

由于科学是人的事业，所以，对科学进行批判，就必然会揭示出科学中的人性内容及其最高的理想境界，这就是说，哲学偏重的是人文。所以，哲学不仅仅是科学，更重要的是人文。这也是我国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所提出的“哲学超知识立场”思想的实质所在。

事实上，没有人的价值的规范，科学往往会走向“异化”，即给人们带来的往往是“生存意义”，乃至灾难。所以，哲学不仅仅是知识、科学，更应该关怀人的价值，即人的“终极关怀”。冯友兰先生指出，学科学的目的，是使人能够成为某种人，即能有一定职业的人，这至多是人的“生存意义”，即“工具理性”，而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这就是说，使人生活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即“生活意义”。所以，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的儒家，并不注重为知识而求知识，主要是求理想的生活。求理想的生活是怎样的？这是儒家哲学的精神所在。梁启超曾说，中国哲学以研究人类为出发点，最主要的是使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怎样才算一个人？人与人相互有什么关系？

所以，哲学偏重的是人文，而不是科学。哲学对科学的作用在于以人文来批判、反思科学。由“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指导科学”可知：科学是人文的基础，人文规范科学。

3. 科学与人文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功利与人文、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反映了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所以，有必要再简述

^① 张功耀：《哲学是什么？哲学家应该做些什么？》，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1）。

一下科学与人文的关系。

简单地说，“科学”是人认识外物，主要是指自然科学。“人文”是指人认识自己，主要是指对人性中的价值、善、审美等进行认识的人文学科。

科学与人文分裂、对立的实质，实际上是真理与价值之间的分裂、对立。贝尔纳就曾分析了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科学观：一种是肯定科学的真理追求而否认其价值追求，另一种是肯定科学的价值追求而否认其真理追求。他认为，这两者的偏颇在于没有看到两种追求的统一性，且人为地在科学的真理、价值属性之间设置了障碍。文德尔班、李凯尔特也都将这“两种文化”的对立，看成是事实知识和价值知识的对立。李凯尔特认为，自然科学是与任何价值无关的，而历史文化科学则不是如此。石里克把自然科学视为“事实科学”，把伦理学等人文学科视为“规范科学”，他拒斥的是人文科学。

在20世纪50年代，C. P. 斯诺指出：人文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的分裂、对立，已令西方人丧失了其整体文化观，且陷入了危险的境地。萨顿也将“两种文化”及其代表人物之间的冲突视为当代最可怕的冲突。奥本海默和汤川秀树对“两种文化”现象进行了分析和反思，指出科学与人文是一致的，进而，对科学日益脱离哲学和文学之类的文化活动深感忧虑。但是，在当今，对保持科学的人文价值必要性的认识，远未引起足够的、普遍的重视，这就难免会产生科学的反人性化现象。比如，世界大战的残酷性、机械文明的非人性化、地球生态环境的破坏等就是如此。这同时也使有些人文学者把此归罪于科学技术，甚至作为抑制乃至禁止科学发展的托词。于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人们对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发生了动摇，进而，出现了反科学主义思潮。比如，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科学技术已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已悲剧性地从作为人类摆脱自然强制性的武器转变为人统治人的工具，从而使个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社会、文化等也变成了“单向度”的了。^①

^①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导论》，张峰译，7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

与此相反，后现代科学思潮的代表人物在批判、反思科学的基础上，努力建构一套理论，以寻求科学与人文融合的道路。比如说，罗蒂首先消解了实证科学的客观性和理性。他认为，科学理论并非来自对客观事物的发现，并非完全由客观“材料”所决定，而是人们用以适合感性材料、为某一特定的目的提供的一种有用的世界描述方法。这些观点对非科学理论显然也是适合的。所以，要对客观性和主观性加以区分是异常困难的，更不能指望以客观性作为科学和非科学的分界标准。因此，他主张放弃客观性，而代之以主体间性作为理论的评价标准。与其说科学有客观性，倒不如说科学有“亲和性”，即主体间具有一致性。罗蒂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合理性”无非是指事先预定的程序及其“条理性”，是那种只要遵循就可期望成功的固定准则。由此，传统观念总是将科学和理性划上等号，自然科学成为所有领域学科“合理性”的典范，而人文学科显然不符合这种标准。罗蒂认为，这是一种“强理性”。人们也常把“强理性”和客观的“真理”、“实在”相关联。既然“客观性”已为“亲和性”所取代，那么，“合理性”就该相应地弱化。“弱理性观”更多地关注主体间性。理性已经成为一种礼仪、一种德性，“两种文化”就没有什么根本区别了，人文学科因此也可称为“理性的”学科了。因此，科学家不应再被誉为比其他人更客观、更有条理或说更有逻辑性，也不能再说他们为真理而献身了。这就是说，罗蒂在消解实证科学的客观性和理性基础上，进而消解了科学的权威性，降低了科学的地位，使之与人文学科平等，并进一步地把科学划归于人文学科之中。费耶阿本德以“怎么都行”的“无政府主义认识论”反对“科学有独特的方法论”的传统观念，动摇了科学的权威，并进一步批判了以所谓科学的、理性的方法”主宰一切生活方式的错误，主张科学与国家分离，降低其凭借权力而在文化领域中取得的至尊地位，使之与人文学科，甚至与迷信、巫术等伪科学平权，其结果不是使科学与人文融合和统一，而是从根本上消解了这一问题。^① 所以，后现代科学思潮

^① 参见黄瑞雄：《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科学人文主义思潮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者虽然寻求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道路，但是，将科学归及于人文，乃至消解了这一问题，这也是有问题的。

综上，科学与人文一方面是有区别的，这主要表现在：科学不能完全归于人文，人文不能完全归于科学。另一方面又是相互联系的。

具体地说，科学与人文的相对确定性的区别表现在：第一，从对象上来看，科学多是以客观的物化的东西作为研究的对象；而人文基本上是以精神的、主观的东西作为研究的对象。由此，科学被看做是求知的学问，以认知为主导，具有外向度，用“事实”说话；而人文是体会“觉”的活动，以觉悟为主导，具有内向度，是对人的反观，依“价值”而立论。第二，从表达手段来看，科学主要以精确的语言、严谨的推导以至形式化特别是数学化的手段来描述所要表达的内容；而人文则以模糊的语言、解释性的语句、体悟的抒发来表达内心世界的认识。模糊的语言在人文领域是经常使用的手段。第三，从认识的结论或成果的公认度来看，科学的认识成果一般具有共识性；而人文的感受或解释性结论通常是个别性的。由此，科学知识是非人格化的，去除了特异性的个性；而人文知识则是个体化的、人格化的。第四，从认识结论的判别标准来看，科学往往要根据实验或实践来判别；而人文往往很难通过设计实验的方法来进行判别。所以，根据这四条标准，可以区分出典型的科学和典型的人文，前者如物理学，后者如哲学和文学；根据这四条标准，同属一个“阵营”的诸学科也有“科学性”或“人文性”的“强”“弱”之分。如生物学在科学的“阵营”中，虽然在第一、第三、第四条标准上看“很科学”，但它应用数学的程度远不如物理学，这就是说，在科学性上“弱”于物理学。历史学在人文领域里也有同样的情形。由于其对象是已经流逝的过去，是无法通过实证方式来把握的，所以，历史学必然带有主观的推断。但是，历史学在人文中是多少带有科学特征的学科，甚至可以走向专门以实证性判别为权威的考古学的研究方式，从而更加靠近科学的“阵营”，所以，相对于文学和哲学来说，历史学是一种“弱”的人文学科。由此，这四个方面也表现了科学与人文

之间界限的不确定性。^①

1.1.2 “两种文化”在经济学中的表现

综观经济学发展史，就可以发现关于“经济学是什么”这一问题，有许许多多的回答，但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种观点：

1. 经济学是先验的科学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认为，正如逻辑学和数学一样，经济学所依赖的“先验的定理”是不可能来自实验的，它在逻辑上先于经验。人们只能借助于先验的定理来理解行动。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弗朗克·奈特就提出了这一观念。他认为，经济行为受人们的有目的的意识所支配，由此，经济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能接受外界的验证。他认为，可检验的理论并非真正的经济学，不可验证并不是坏事，而是真理性的标志。

2. 经济学是类似于数理科学的

1983年，罗森伯格发表了《经济学不是科学，那它是什么？》一文。他把经济学与欧几里德几何学、燃素说进行了对比，认为，欧几里德几何学“是一种具有重要效用的非经验论断……我们现在可以解释它的成功，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另外的几何理论和狭义相对论，这说明了它局部的成功。就像燃素说一样，其局部的成功可以用氧化理论来说明。但是，它当然是未经证伪的”^②。进而，罗森伯格推导出：经济学是“处于纯公理系统与应用几何学的交叉点上的，类似于数学的一个分支”^③。

林德对经济学的性质持另一种立场，在《评经济学和物理学中的基础理论和理想化》一文中，基本上支持“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的物理学”的观点。这是因为“经济学和物理学一样，也是一门具

^① 参见肖峰：《论科学与人文的当代融通》，336～338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② A. Rosenberg, 'What Rosenbergs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Is Not', *Philosophy of Science*, 53, 1986.

^③ A. Rosenberg, 'If Economics Isn't Science, What Is It?', in *The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An Anthology*,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28.

有相同的普遍目的的科学”^①。不过，林德还认为，“在经济学和物理学中，基础理论和理想化的作用上存在着某些差别”^②。一种典型的理想化理论只关注少数重要特征，而对其他重要的因素全部忽略不计。在物理学中，这种理论常常是和更复杂的理论相关的，而这种复杂的理论至少被认为是接近真理的。但在经济学中恰好相反，只有一大堆理想化理论，没有似真的理想理论。

3. 经济学是“趋势科学”

穆勒在《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适当的研究方法》一文中，明确指出：经济学既不能概括所有的事实，又不能进行自然科学式的受控实验，因而，只能去建立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真理，即所谓的模型真理。模型真理只是在某些假定的前提下，才是真理。所以，经济学理论仅是“近似的”趋势科学。由此，豪斯曼在其名著《不精确、分离的经济学》中认为，就经济学的内容来说，真实世界远比它丰富得多，这就是说，经济学是近似的、不精确的。

4. 经济学是人文学科

萨缪尔森就认为“经济学是一门可以把科学的精确性和人文方面的诗意济一身的科学”^③。澳籍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认为：经济学是以“快乐”为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④我国经济学家厉以宁特别强调经济学“是人文科学，是以人的活动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⑤。汪丁丁先生曾写了一篇《数学与经济学的人文精神》。^⑥陈惠雄博士在其《人本经济学原理》中，依据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指出：当今经济学尤其是西方经济学主要仍停留在功利境界，还没有上升到道德境界、天地境界，^⑦也即人文境界。

① Hans Lind, 'A Note on Fundamental Theory and Idealizations in Economics and Physics',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44. 1993, p. 494.

② Hans Lind, 'A Note on Fundamental Theory and Idealizations in Economics and Physics',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44. 1993, p. 494.

③ [美] P. A. 萨缪尔森、W. D. 诺德豪斯：《经济学》（上），英文12版，高鸿业等译，6~7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④ 参见[澳]黄有光：《经济与快乐》，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⑤ 厉以宁：《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7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⑥ 参见《经济学消息报》第220期。

⑦ 陈惠雄：《人本经济学原理》，7~14页，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5. 经济学不是科学

早在1898年，经济学家凡勃伦就首次提出了这一问题：“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发达的科学？”经济学被一些经济学学者戏称为“裸体的皇帝”^①。这里要特别一提的是：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组织了一些经济学家编写了《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一书。^②

6. “经济学尚未成为一门合格的科学，但经济学正继续走向科学”

这是大多数人的观点。^③

经济学自边际转折以来，一直是朝着科学的方向发展。这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从科学知识的要求来看，经济学日趋符合科学的标准。这表现在经济学有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研究对象自边际转折以来实现了从古典经济学的“财富”和“财富的增长”的常识性的研究对象，到把对资源稀缺性的人类行为选择这一一般性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转变。其研究方法实现了边际分析方法，从而，实现了经济学语言由基本的自然语言转向符号语言，使经济学摆脱了传统的内省和心理分析而走上了经验和行为分析道路。二是从理论和知识性质的演变方向来看，经济学逐步地强调实证、预测等，从而逐步向经验的自然科学的知识性质靠近。这依然开始于边际革命，其动力则来自科学知识所要求的可检验性和可预测性标准。

但是，经济学至今仍不是一门合格的科学。其主要理由是：第一，经济学研究难以保持“价值中立”。第二，经济学研究很难以严格的科学实验为基础。第三，部分学者认为，数学的应用，除了出于方便的需要之外，似乎并没有给出多少哪怕仅仅是可供交流的最简单的经济学思想。

^① 参见赵凌云：“裸体的皇帝”：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载《开放时代》，1998（6）。

[美]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苏通等译，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② 参见[美]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苏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③ 狄仁昆：《走向大科学的经济学——经济学的哲学》，249~261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7. 科学哲学界中“经济学到底是不是科学”的争论

一是否定论。库恩认为，由于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缺少“范式”，而“范式”是一门学科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和成熟标志。所以，他认为，经济学还不能算是科学。^①

二是肯定论。夏佩尔和达尔顿认为，科学研究对象是信息域。信息域是由观察得来的经验事实，以及该学科中的理论、观点、方法、原则、信念等项目相互联系所构成的有机整体。由于经济学有其自己的信息域，所以，经济学当然是科学。^②

三是“半科学”论。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学说，认为“科学研究纲领”的生命力取决于：一是其能否指导实践，二是其本身是否有所创造。他认为，经济学不能完全指导实践，但确实有新创造，至少可以算是“半科学”。

当然，上面也仅仅是“关于经济学学科性质”的主要观点，还有其他的观点，如有人认为经济学是一门介乎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软”、“硬”兼备、富有特色的科学。^③ 麦克洛斯基认为，理解经济学的性质，应避免认识论，而去研究经济学的“修辞技巧”^④。他在《经济学的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⑤ 中认为，经济学是文学。

上面所说的观点，总的说来可分为两类：一是认为经济学是或类似于自然科学，二是认为经济学是人文学科。所以，近现代文化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文化思潮在经济学学科性质问题上也表现了出来。

实际上，这最明显地表现在经济学及其方法论中一次有名的争论——边际经济学派（以卡尔·门格尔为代表）和新历史学派（以施穆勒为代表）之间的论战。这一论战虽然被称为英国学派与德国历

① 参见黄河：《经济科学学》，71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

② 参见黄河：《经济科学学》，71~72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

③ 丁文峰：《经济学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载《当代经济科学》，1996（3）。

④ 参见〔美〕黛尔德拉·迈克洛斯基：《经济学的花言巧语》，石磊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⑤ 这本书在我国被翻译成《经济学的花言巧语》。见〔美〕黛尔德拉·迈克洛斯基：《经济学的花言巧语》，石磊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史学派之争，但是，准确地说，前者将经济学看成是一门实证的、抽象的和演绎的科学；而后者将经济学看成是一门伦理的、现实的和归纳的科学。就这一争论实质来说，恰恰是以“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争论”为导向的。

亚当·斯密既采用抽象演绎法，又采用历史描述法。李嘉图则抛弃了历史的制度的描述方法，而单纯采用假说演绎模型法。在马歇尔之前，斯密的方法论对当时的主流派经济学家有很大的影响，如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就采用了这一方法。在马歇尔之后，李嘉图的方法论则成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主流。第一本专门讨论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是西尼尔的《政治经济学导言》（1827）。西尼尔的方法论是逻辑演绎型。他指出，经济学的基础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公理，用不着加以证明。其中，有一条公理是：每一个人都应用尽可能少的牺牲求取最大限度的财富。约翰·穆勒发挥了这一思想，提出了“理性经济人”概念，进而得出了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是一门抽象科学的结论。

由于穆勒是一个实证论者，他认为，只要理论是从真实前提中推演出来的，理论就在任何场合都是正确的。因此，对理论的检验归根到底是对前提的检验。这样，就提出了经济学以事实为标准、且以假说——演绎方法为寻求真理的模式，即经济学界通常所说的逻辑实证方法论，这也是以后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主流方向。凯尔恩斯是穆勒的嫡传弟子，在方法论上与穆勒一脉相承，由于他出版了一本重要著作《政治经济学特点和逻辑方法》（1875），所以，凯尔恩斯与西尼尔、穆勒齐名，他们所主张的逻辑演绎方法论，通常被称为西尼尔—穆勒—凯尔恩斯传统。所以，逻辑实证方法论是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

早在边际革命之前，旧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罗雪尔、希尔德布兰德等就对这种逻辑实证方法论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经济学不可能如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所设想的那样，能够揭示出经济运动的自然规律，且适应于一切时代、一切国度。经济学应当以文化为基础，根据历史观察和统计衡量，研究社会经济的实际进程，以当时的伦理标准

和文化标准去评价，且提出改进社会生活的方法。所以，经济学方法绝不是英国正统派经济学的方法，即假说——演绎方法，而是观察、归纳和类比，即历史主义方法。他们还认为，这种抽象演绎模型是对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机械的模仿，但对社会科学是不适用的。由此可见，旧历史学派的方法导向显示出了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

1883年，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出版了《对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研究》一书。在此书中，门格尔继续坚持科学主义的导向，从维护边际分析和建造抽象演绎模型的研究方法的立场出发，攻击了历史学派的历史主义方法，批评了历史学派抹杀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科学”的本质，因为“理论经济是经济的一般性质（经济形式）和一般联系（规律）的科学，仅仅通过归纳——类比方法所提供的经济事实的描述，无法建立起一般的规律，正如这种描述不能成为理论物理学和理论化学的基础一样，所以，唯有通过抽象和演绎才能得到一般的规律”^①。与此相反，历史学派的后期（即新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施穆勒则站在人文主义立场上，坚持认为国民经济学“更接近于伦理学及历史哲学的研究”。

在经济学方法论问题上，对边际经济学派和新历史学派等方法论之争进行全面总结的是J. N. 凯恩斯。总的说来，J. N. 凯恩斯在189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中，指出：在理论和方法问题上，两者各有千秋。演绎法对经济学的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但历史的归纳法也不可偏废。经济学方法当兼容并包。

综上所述，边际经济学派和新历史学派等方法论之争是以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一文化思潮为底蕴的。以后的经济学方法论之争仍然是以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一文化思潮为基础的。

从19—20世纪之交到20世纪20年代，是制度主义经济学崛起和盛行的年代。制度主义经济学曾受到德国历史学派的深刻影响。它的制度——结构分析方法长期以来与“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相抗衡。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共同研究方法是演进的、整体的方法。经济学要研

^① 转引自孙慕天：《新的边疆：从经济学哲学到科学哲学》，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2）。

究变化、研究过程，这就是经济学研究中的演进的方法。制度主义经济学中的整体方法，实际上就是制度——结构分析方法，包括权力分析、利益集团分析、规范分析。所谓权力分析，是指在分析社会经济活动时，要着重分析权力问题，首先是“决策的权力”问题。所谓利益集团分析，是指把社会划分为若干个利益不同的集团，考察它们的相应地位和相互关系的变化等。所谓规范分析，是指分析“价值判断”的依据、人们动机和习惯的形成、行为选择等对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以及对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分析。除了经济价值外，价值还应包括社会平等、生态平衡、环境舒适，以及美、尊严、生活情趣等。所以，制度主义经济学仍然主要是从人文主义角度来研究经济学的。凡勃伦就把自己的经济学理论称为“文化的”经济学。^①

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制度主义经济学方法论逐渐衰落，随之而起的是罗宾斯的方法论。罗宾斯在1932年发表了《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此书是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大论战的产物。在此书中，罗宾斯重申和发展了西方经济学的西尼尔—穆勒—凯尔恩斯传统。他指出，经济学的重要原理都是从近于公理的假设中演绎出来的，而这些假设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人们可以直接感知到的。他极力反对历史学派关于经济真理依时间和地点为转移的观点，同时也强烈反对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制度主义经济学在理论上没有任何成就的。这表明：罗宾斯仍主要是从科学主义角度来理解经济学的。

向正统派逻辑演绎方法论回复的又一表现是现代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其代表人物如罗思巴德、柯兹纳等，逆流而动，虽然坚持极端的西尼尔—穆勒—凯尔恩斯传统，但是，他们反对对经济预言作数量验证，特别是反对数理经济分析；也不赞成一味研究最终均衡状态的性质。现代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渊源是米塞斯和哈耶克。米塞斯在《人类行为论》（1949）一书中提出了人类合理行为的一般原理。他认为，关于有目的的个人行为的假定是解释一切行为的先决条件，这

^① 转引自陈宪：《经济学方法通览》，899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实质上是主张综合演绎原理。他认为，确定特定理论正确性的最终标准不是基于经验的证实或证伪，而是不附加任何经验成分的纯粹推理。他认为，自然科学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有重大区别，且极力反对对经济理论的前提和含义作任何定量说明。哈耶克声称经济学是非科学的。他认为，将自然科学的诸原理应用于人类研究中，就是“科学主义”，试图通过数学公式化和经验证明而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是行不通的。可见，现代奥地利学派及米塞斯、哈耶克等虽然自认为在方法论上是禀承西尼尔—穆勒—凯尔恩斯传统的，但是，实际上更偏重的是“人文主义”，甚至是反“科学主义”的。

“两个剑桥”之争是凯恩斯内部对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理解所引起的分歧，是指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萨缪尔森等人为主要代表与以英国剑桥大学的琼·罗宾逊夫人为主要代表的关于凯恩斯经济学方法论之争。前者坚持回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法、坚持回到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主观边际分析法等。后者则坚持凯恩斯的历史分析法、坚持凯恩斯关于资本主义收入分配不合理的规范分析法等。这也显示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文化思潮。

1.2

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科学：科学特质与人文特质的统一

1.2.1 社会科学的学科性质之争：科学抑或人文？

“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知识体系，通常是与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相对立的。“社会科学”一词大约在18世纪下半叶才在西方文学中出现，到了19世纪以后，才逐渐形成了庞大的群体，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人类学、心理学、地理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最初是从道德哲学之类的人文研究中分化出来的，似乎具有典型的人文特质，但自它包括了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之后，其对象就从人的个体的内在面转向了外在面，从精神生活

世界转向了事实世界，即社会科学开始以社会的组织、结构和规律等客体作为其研究对象，从而，与体悟和表达人的内在精神的“人文学科”形成了区别，它似乎应该归入科学而不是人文的范畴。但是，将社会科学归入科学又引起了科学阵营的反对。通常在自然科学的眼中，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和自然科学显然是不同的，如果从“文”和“理”的角度去看，社会科学应该归入“人文”的范畴。物理学家常常批评社会科学不是科学，因为它不精确，缺乏预测性。所以，在“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中，社会科学或者被一方或双方所“排挤”，而另立门户，或者被一方或双方所“争夺”，而成为科学与人文联姻的中介。

科学主义要么认为社会科学根本不符合自然科学的标准而完全否认它是一门科学，要么认为应该按照自然科学的标准去改造社会科学，而使之成为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真正的科学，这就是实证主义者们曾经从事的“伟大事业”。孔德认为，社会现象虽然比自然现象复杂得多，但在本质上同样“服从不变的规律”，因此，可以把社会现象当作科学来研究，可以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即观察法、实验法和比较法去研究社会，使社会科学成为像自然科学一样的实证科学。所以，他把真正科学的社会科学界定为“关于社会现象根本原则的实证研究”。斯宾塞则是从自然科学中选取了生物学作为社会科学的模仿对象而建立了“生物社会学”。他把人类社会与生物相类比，认为两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进而，把达尔文生物学中“生存竞争”学说运用于社会领域。但是，实证主义的做法最终失败了，这是因为科学的社会科学并没有建立起来；且社会科学在“科学”意义上的生存权实际上被否定了，因为它把自然科学视为唯一的知识典范。因此，将社会科学划归到自然科学的做法是不对的。

同样，将社会科学简单地归入到人文科学，也是不对的。这是因为，其所研究的“社会世界”不可能简单地归结为人文科学所研究的“精神世界”或“价值世界”。或者说，由于人文研究只限于“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因此，人文科学不可能包容和代替社会科学。

总之，社会科学在一定意义上介于科学与人文之间，它具有科学

与人文的双重性质，但又很难算作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或“人文”。

1.2.2 经济学：科学特质与人文特质的统一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而社会科学具有科学特质与人文特质，所以，经济学是科学特质与人文特质的统一。

斯蒂芬·科尔用六个变量——理论的成熟性、定量化、认知共识、预言能力、过时的速度和增长的速度，将科学分为不同的层级，层级有其顶端和底部。层级顶端的标准有：一是高度成熟的理论，研究受范式指导，具有高水平的严密性。二是思想用数学语言表达。三是在理论、方法、问题的意义和个人贡献的意义上达到了高水平的共识。四是具有运用理论作出可证实的预言的能力。五是当旧理论过时，具有高比例作为目前工作的参考——表明知识进行了有意义的积累。六是“进步”或新知识增长的速度相当快。层级底部的标准有：一是无理论形态或低水平的概括性，处于前范式阶段，仅有低水平的严密性。二是思想用词来表达。三是在理论、方法、问题的意义和个人贡献的意义上仅有低水平的共识。四是不具有运用理论作出可证实的预言的能力。五是当旧理论过时，仅有低比例作为目前工作的参考——表明知识缺乏有意义的积累。六是“进步”或新知识增长的速度相当慢。落实到具体学科，物理学最高，接下来是化学、生物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宗教、文学……简言之，“层级顶端”的学科是典型的自然科学，而层级底部的学科是典型的人文学科。显然，在顶端和底部之间是可以有过渡性学科的，即它可以解决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亦此亦彼”的问题。^①

可以设立一些标准来判断不同的社会科学对于自然科学的接近程度或“隶属”程度，例如：第一，看一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所形成的交叉科学的数量，这种交叉科学的数量越多，表明其科学的色彩越浓；第二，看一门社会科学运用数学的程度如何，运用得越多、程

^① 参见肖峰：《论科学与人文的当代融通》，339～34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度越深，这门社会科学就越像是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第三，看一门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能够物化或非精神化的程度，这种程度越高，就越接近“以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物为对象”的科学；第四，看一门社会科学能达成共识的程度如何，达成共识越多的学科，就越接近科学，分歧纷争越多而又找不到公认判别标准的，就离科学越远。如果这些标准合理的话，就可以得出：经济学是目前诸社会科学中最接近自然科学的。这是因为：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而产生的交叉学科最多（据统计，在经济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目前已产生了284门各级交叉学科，而社会学是147门，法学是62门，政治学是39门），使用数学也最多，其研究对象——社会的经济现象本身就是一种物质现象而非精神现象，经济学的某些成果也较其他社会科学可更多地达成共识，其是否正确也可以通过经济活动的实践来加以检验，这些就使经济学具有了“硬科学”的特点。排在经济学后面的大概应是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①

总之，对待经济学，不仅可以从科学层次来进行理解，而且可以从人文层次来进行理解。

目前，大多数经济学家尤其是西方经济学家仅仅将经济学看成是科学，且使经济学仅仅停留在功利境界，这是有问题的。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人的境界依次可经历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因此，经济学必须由功利境界提高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即应该从人文层次来理解、研究经济学。这样，就比较好理解为何西方经济学会从实证经济学转向规范经济学了，也比较好理解亚当·斯密为何总是交替地修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了。《国富论》主要强调理性经济人，强调从科学层次来理解经济学，而《道德情操论》主要强调道德情操人，强调从人文层次来理解经济学。J. M. 布坎南说：“假如我们围绕所谓的‘具有自然科学性’的经济学……打转……我们就

^① 参见肖峰：《论科学与人文的当代融通》，187～188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会在促进人类进入衰败过程。”^① 因此，他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但是它与我们常说的物理——生物科学不一样……经济学上的问题是不能用现成的科学公式来验证的”^②。于是，他主张，“一些‘经济学家’与一些从事非经济学研究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较之经济学家与本专业的一些学者可能进行的学术交流还更有效”^③。

当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明确指出：经济学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比如，马歇尔认为，经济学既要研究财富，又要研究人。萨缪尔森明确指出，经济学介于科学与人文之间。布坎南把经济学定位在“介于预测科学和道德哲学之间”。我国也有不少学者持这样的观点。汪丁丁的专著《经济学与哲学之间》就反映了经济学与人文之间的联系。盛洪在其著《经济学精神》中特别强调：“在最高境界中，经济学不是一堆结论，不是一组数学公式，也不是一种逻辑，甚至不是一种分析方法，而是一种信仰、一种文化、一种精神。”^④ 实际上，这包含了经济学应该是科学特质与人文特质的统一。盛洪在另一篇论文《会有一个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吗》中^⑤提出了这样的论断——“作为科学与超越科学的经济学”。“超越科学”一词，他本想用较为中性的“非科学”一词表达。但几位经济学同行很不赞同，认为这过于消极且容易引起误解。张宇燕博士建议他用“形而上”，但他认为不够准确。他想表达的东西（指经济学）介于“科学”与“形而上”之间，故最后采用了“超越科学”一词。后来他发现，在希腊文中，“形而上”意为“在物理学之后”。所以，他认为，“超越科学”就表达了经济学介于“科学”与“形而上”之间。可见，盛洪所说的“超越科学”或“形而上”就是笔者所说的“人文”意思。

① [美] J. M. 布坎南：《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罗根基、雷家瑞译，88页，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

② [美] J. M. 布坎南：《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罗根基、雷家瑞译，235页，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

③ [美] J. M. 布坎南：《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罗根基、雷家瑞译，119页，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

④ 盛洪：《经济学精神》，273页，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

⑤ 于光远、董辅初：《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279~295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1.3

马克思的经济学观

马克思主张建立充满人性的新科学观，即人化的科学，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是一致的。认为，科学的人化就是指科学的人文化、人性化、人道化。从而得出结论：经济学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马克思认为，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己的理论是科学，但不仅仅是科学，更主要是为了“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即人文。但是，西方经济学缺乏人文性。

1.3.1 科学：“人的科学”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指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①这就是说，马克思主张建立充满人性的新科学观，即人化的科学，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是一致的。具体地说，科学的人化就是指科学的人文化、人性化、人道化，始终围绕人的个性自由、现实生存、未来发展进行，使科学复归于人的生活世界，并真正成为人的科学，从而克服科学的无人与无视人的状态。

第一，自然界是确证人的生命和本质力量的不可缺少的对象。这是因为科学的对象是人的直接对象——自然界。

在对自然界本质的认识中，人确立了其主体地位，不仅表现出了其有意识、有目的，能够选择、评价对象的主体特质，而且展示出了其能够感觉、知觉和表象对象的反映功能和能力，以及能够通过概念、判断和推理对对象进行建构的思维功能和能力。人的能力如何直接影响着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水平，即科学的水平。科学的性质和水平直接反映出了人的主体特质及其功能和能力。特别是，经过实践改造

^① [德]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了的自然界，绝不仅仅是单独的自然界，而是人和自然界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与人没有发生联系的自然界，不可能成为科学的认识对象。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科学对自然界本质的认识就是人对自我的认识，科学的认识活动就是人的自我认识活动。

第二，科学使工业成为现实，工业则进一步确证和实现着人的本质。

工业把人所面对整个感性世界变成了其实践的产物，变成了人展示其本质力量的舞台，表现出了人能按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把整个自然界变成自己的“无机的身体”的普遍性。因而，“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①。这也可以这样说，人类把自己的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按照美的规律塑造着对象世界，实现自然的人化，创造着适合人的生存发展需要的理想世界。所以，通过工业，自然科学同人之间发生着现实的历史关系。

马克思认为，“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②。这就是说，通过实践、工业形成的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现实的自然界、有意义的自然界，它既是生活的基础，也是一切科学和哲学的基础。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的自然科学，就成为关于人的科学的基础，并且它本身就包括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必将包括自然科学在内一样。如果自然科学片面地脱离人这一基础来研究自然界，它就是一种“唯心主义”方向。所以，经过实践和工业改造了的自然界，绝不仅仅是单独的自然界，而是人同自然界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体现。真正

^① [德]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② [德]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的唯物主义必须从自然界和人的统一这个现实的基础出发来研究自然界和自然科学。

第三，科学及其活动对于人的本质及其展示有着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的获得、实现只有通过对象及其活动才是可能的。“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①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性是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而人的这一特性就来自于且存在于改造对象世界的实践活动之中。在人的对象性活动中，人的本质不仅得到确证，而且展示出其丰富性。事实上，人的感觉或感觉的人性就是在人化自然的对象性活动中产生和丰富起来的，例如，人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②。因此，马克思指出：“一方面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另一方面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需要，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③

所以，科学，一方面作为认识自然的对象性活动，就是人的对象性活动，另一方面作为认识的成果，又通过工业实践进一步深化和丰富着人的对象性活动，从而直接地或间接地确证、展示着人的本质及其力量。

总之，马克思认为，必须把人的科学当作自然科学来加以研究，而自然科学也必须研究人本身。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全面的科学。

其实，西方无论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代，都有“大家”持“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是一致的”观点。在古希腊，人始终都是科学的追求，古希腊的科学研究实际上都是关于人的研究。赫拉克利特关于宇宙本质和规律的“逻各斯”，虽然是对自然的本质和规律的描述，但也是关于人类社会生活的规范，所以，赫拉克利特的这一思想

① [德]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② [德]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③ [德]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在西方伦理学中被称为“宇宙主义”。同样，毕达哥拉斯的“数”、德谟克利特的“原子”，以及伊壁鸠鲁关于“原子偏斜运动”等，无不是托物咏志，在探索世界的本质、规律和结构中实现其对人的关怀。虽然近代以来的科学走着愈来愈远离人的发展道路，从文化中独立出来，但是，即使是处于近代入口的霍布斯，他所提出的物质本质及其运动的力学和几何学论证，最终也体现了文化的追求。“无论科学可能会变得多么抽象，它的起源和发展的本质却是人性的。”^① 休谟在《人性论》的引论中说到：“显然，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联系，任何科学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即使数学，自然哲学和自然宗教，也都是某种程度上依靠于人的科学；因为这些科学是在人类的认识范围之内，并且是依靠他的能力和官能而被判断的。”因而，人们要最终认识科学，就必须“直捣这些科学的首都或心脏，即人性本身”。他进一步认识到：“任何重要问题的解决关键，无不包括在关于人的科学中间；在我们没有熟悉这门科学之前，任何问题都不能得到确实的解决。因此，在试图说明人性的原理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是在提出一个建立在几乎是全新的基础上的完整的科学体系，而这个基础也正是这一切科学唯一稳固的基础。”由此休谟得出结论：“关于人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唯一牢固的基础。”^②

在现代，倡导人本主义心理学的马斯洛指出：“科学是人类的创造，而不是自主的、非人类的。科学产生于人类的动机，它的目标是人类的目标。科学是由人类创造、更新以及发展的。它的规律、结构以及表达，不仅取决于所发现的现实的性质，而且取决于完成这些发现的人类本性的性质。因此科学是人学。”^③ M. W. 瓦托夫斯基在其重要著作《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中写道：“科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不仅涉及科学是什么，或科学思想是如何发生的问

^① [美] 萨顿：《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陈恒云等译，29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② [英] 休谟：《人性论》，关文译，6~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③ 转引自江涛：《科学的价值合理性——一种主体实践的认识论研究》，16页，136~137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题，而且也涉及到科学思想与其他类型思想——常识、文学艺术中的人性研究以及创造性的艺术家的思维的非常方式等——的关系。因此，科学哲学提供了两种文化之间的联系，力图以某种首尾一贯的方式将它们彼此联系起来。”达到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是科学哲学的目标”；从哲学的最美好最深刻的意义上说，对科学的人文学理解，就是对科学的哲学理解”。因而“达到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就是在自身中实现和认识到由科学本身所例证的那种概念理解的模式；就是去影响一个人自己的理解与科学所显示出的那种理解之间的和睦关系，这就使得有可能认识科学思想中的充分的人文主义”^①。著名科学史家萨顿主张建立新人文主义或科学人文主义。他指出：“我们必须准备一种新的文化，第一个审慎地建立在科学——在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即新人文主义”，“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②。萨顿坚信科学人性化是可以实现的，且认为科学史不仅是唯一可以反映人类进步的历史，而且是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桥梁。^③

1.3.2 马克思的人文经济学观：科学与人文的统一

从科学的本质是“人的科学”中必然会得出：经济学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总是认为自己的理论不仅是为了解释世界，最主要是为了“改变世界”。“解释世界”是科学的任务。“改变世界”，即“改造世界”，也即“实践”。实践当然包括了科学，但实践还需要“人文”的规范。这是因为科技应用需要“人文”的规范，否则，科技会出现异化。罪犯等人的活动也是实践活动，可以包含“科

^① [美] M. W. 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范岱年等译，7页，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

^② [美] 萨顿：《科学的生命——文明史论集》，刘珺珺译，4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③ 参见李桂花：《科技的人化——对人与科技关系的哲学反思》，170~173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学”，但缺乏“人文”，尤其是合理的人文的规范。由此可见，实践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现实“人文”。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总是认为，自己的理论是科学，但不仅仅是科学，更主要是为了“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即人文。

事实上，马克思从其中学的毕业论文一直到《资本论》等都是从人文来关怀人类的，其毕生都在追求人类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科学仅仅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个手段、途径。比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强调自己的经济学是科学，他所用的是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研究和表述方法，而不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方法，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是反人性、反人道、反人类的，人依赖于物，受物的奴役和统治，人的关系变成物的关系、钱的关系，而且人又受自然历史左右，受科学技术及制造的机器的摆布，即人被“物”化、被“异化”、被“钱化”。所以，马克思通过科学，进而对拜金主义、拜物教进行了全面批判，最后，马克思将“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视为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原则。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未来社会作预见时，只是提出了其最本质的特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更为人注意的是，46年后的1894年，当一位记者请求恩格斯为即将出版的周刊《新纪元》写一段题词、且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社会主义纪元基本特征时，恩格斯在回信时认为，除了上述这段文字外，他“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①。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含义，较之《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原理》做了更加具体的表述，指出：全面发展的人，就是“把不同的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人”^②。以后，在法文版《资本论》中，马克思又更加明确地指出：所谓“全面发展的个人……也就是用能够适应极其不同的劳动需求并且在交替交换的职能中只是使自己先天和后天的各种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1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生产职能的痛苦的承担者”^①。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含义，实际上包含了四个层次的含义：第一层次是指人能够适应不同的劳动需求，把不同的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这无疑包含着旧式分工的消灭。第二层次是在交替交换的职能中，人的先天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了自由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全面的活动，才能使我们的一切天赋（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②；“从全部才能的自由发展中”必然产生“创造性的生活表现”。^③ 第三层次是指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第四层次是指个人和社会的和谐统一发展。

所以，马克思始终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其经济学的主要关注的对象、目的。这就是说，马克思认为，经济学的“灵魂”是人文。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强调指出：“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④，“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⑤

虽然西方经济学偏重的是现实性价值判断，研究如何发财致富、使资本增值，而马克思经济学则偏重于终极性价值判断，追求的是人类的解放。虽然西方经济学注重于既定制度下的微观研究，注重于实证分析与研究，偏重于数理逻辑的运用，而马克思经济学则注重于历史维度的宏观分析，偏重于价值分析与理论推导，即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虽然西方经济学主张按生产要素分配，而马克思经济学则主张按劳动分配；虽然西方经济学遵循的是商品——使用价值——效用——需求价格，而马克思经济学则主张商品——交换价值——价值——劳动——生产价格；虽然西方经济学主张效用价值理论，而马克思经济学则主张劳动价值论。但是，马克思经济学在人的发展问题上是对西方经济学的超越，主要表现在^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③ 《资本论》，法文版，第1卷，5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上），1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上），1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⑥ 参见许崇正：《人的全面发展理论：马克思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超越》，载《经济学动态》，2001（12）。

第一，西方经济学虽然强调人的自由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建立在旧式分工基础上，以维护旧式分工。而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强调人的发展必须要打破旧式分工，建立新式分工。

第二，西方经济学虽然更多地强调人的政治自由，人应有天赋自由的权利，但是，对人的自由发展的内涵并没有下定义。而马克思通过长期对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说史的深入研究，通过对早期资本主义造成人的片面发展的研究，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

第三，西方经济学把人的自由发展作为手段，而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即人文追求从属于功利追求。而马克思经济学正好相反，它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自由竞争、追求效益乃至市场经济只是手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目的。

第四，新旧古典学派虽然强调人的发展，但更多的是强调资本创造价值，按资本要素分配价值。这就是说，在价值创造中，人的才能、智慧、创造力，并不占有重要和主要的地位。而在马克思的价值论中，人的才能、智慧、创造力、复杂劳动占重要和主要的地位，同样在分配中也是如此。

所以，虽然我们强调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但是马克思还是认为经济学和自然科学是有区别的。马克思也曾经认为，分析经济问题，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必须用抽象力。所以，我们在强调马克思经济学是科学的时候，我认为这是强调经济学的科学性，并非说经济学和自然科学是一样的。马克思认为，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相比，更具有人文性。

但是，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缺乏人文性。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为自然的永恒的前提是具有辩护性的，或者说是具有很强的价值判断性的。马克思认为，它撇开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研究，而专门研究物的关系，以物的关系掩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经济学充满着拜物教气息。

事实上，在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上，企图将经济学变成一门像自然科学那样纯粹的科学的做法由来已久，西方主流经济学往往排斥价值判断，主张实证经济学。所以，西方主流经济学偏重的是科学主

义，而忽视了人文性。

下面主要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例，来重点论述这一点。在书中，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尤其是从劳动本身出发考察了私有制的本质、起源和意义，得出了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学的反人性。^①

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国民经济学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例如，当它确定工资和资本利润之间的关系时，它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最终原因；就是说，它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作前提。”^②恩格斯也指出：“政治经济学没有想到提出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③“在最近的经济学家面前却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学说；一切结论都已经做出来了，各种矛盾都表现得十分清楚，但是他们却没有去追究各个前提。”^④“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把这种科学称为私经济学，因为在这种科学看来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⑤所以，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及其辩护的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如劳动、价值、交换和需求等进行了批判，特别是，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承认劳动是国民财富的基本要素，但是它把劳动看成是没有人文关怀的要素。这就是说，它所理解的劳动不是真实的人类劳动，而是异化劳动。

马克思由劳动的自身异化理解了人类的自身异化，理解了阶级关系和私有财产的本质。具体地说，马克思借助于当时的经济学事实，得出了异化劳动思想：第一，劳动者的劳动同其产品之间的异化关系。这就是说，劳动者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去占有外部世界，他就越是失去生活资料。他只有成为生产资料的奴隶，才能得到工作、挣得面包以维持生活。他也只是为了维持自己肉体的生存，作为生活资料

^① 参见杨适：《马克思 经济学—哲学手稿》，34~47页，78~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②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5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598~5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6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的奴隶，才不得不去劳动。第二，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这就是说，劳动对于劳动者来说是外在的，不属于他自己的，不是肯定自己、自由地发挥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而是否定自己的、非自愿的强制劳动和被迫的劳动，如同瘟疫一样。劳动不是劳动者本身的需要，只是维持生存的一种迫不得已的手段。劳动本来是人的本质，现在却成了这样，他在劳动时如同畜牧一样，只有在不劳动而只是吃喝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在从事人的活动。这就是说，他只是在运用自己动物式的机能时才觉得自己是人，而在从事人的活动时反而觉得自己是动物。第三，人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关系。既然人的本质是由劳动来实现和确证的，那么，由于劳动变成了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走了生产和生活的对象和自然界，从事生产的人也就不能再进行发展自身、肯定自身的劳动，人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类生活与类本质。劳动作为类的发展的自由的活动，变成了个人维持生存的手段；各人都为私利、为谋生而活动，人“类”就失去了自己的目的，而异化为自私自利的个人之间的战争。第四，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化。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个人把他自己的劳动以及他人的、类的劳动活动统统都只当作他自己谋生谋利的手段，而不是把人类本身当作他活动、劳动的目的。所以，异化劳动造成了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种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这就是说，异化劳动必然造成私有财产和阶级的对立。

由此，马克思设想了未来的共产主义是人文的共产主义。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 = 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 = 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

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①。这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这是因为私有财产作为异化于人的对象或物质财富的东西，无非是人和人的劳动的自我异化的表现。它的本质不在物的形态本身里面，而是在主体方面的异化。第二，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所谓“通过人”，就是说，共产主义不是单纯通过物（私有财产这种异化了的物的形态）的扬弃可以获得的，而是通过对异化了的人本身所具有的异化性质的扬弃才能得到的。“为了人”，就是说，不是单纯为了占有物、占有对象形态的财富，而是为了人本身的解放。“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使人的自己的本质得到重建，这是共产主义的意义所在。这是因为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统治和支配下，人不仅失去了外部世界（生产和生活的资料，乃至整个的自然界），而且失去了自由，失去了自己的本质。也正是由于自身的异化，才导致了他同物的世界相异化。第三，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复归。共产主义不仅是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即复归，而且强调了这种复归是“向社会的人的复归”，只有向社会的人的复归才是人自身的复归。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人是社会的人。人的本质就是社会性。但是，在私有制和异化劳动的活动中，人异化了，丧失了他本来应能具有、享有的社会性质，变为孤立的利己的个人而同他人、同社会相隔绝相对立。人失去了社会，也就失去了全面的外部世界，也就失去了自己作为人的地位、意义、价值和本质。所以，人的异化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的社会异化或社会的人的异化。第四，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这就是说，共产主义的复归不是倒退，不是对以往全部文化和文明的抽象否定，而是一种人类自身的辩证发展。离开了这种自我发展，人就不可能实现对人自己本质的真正占有，就不可能有向社会的人的复归。马克思认为，异化不仅是消极的、否定的，而且是必然的、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类发展阶段。共产主义不是抽象地同私有制

^① [德]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对立的，而是异化阶段的必然的辩证进展。在私有制和人的异化中得到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工业和科学，为丰富具体的共产主义创造了现实的前提。第五，“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 = 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 = 自然主义”。在这里，“完成了”的含义是“完备的”、“完善的”、“全部实现了的”。“自然主义”是用自然界及其规律来解释一切的学说，在 17 至 18 世纪哲学上的自然主义是同唯灵论做斗争的唯物主义学说。它把自然界认作世界的唯一真正的本体和基础，人也是自然物之一，这是唯物主义观点。“人道主义”是与“自然主义”相比较的，是强调以人为中心为本位来理解和说明世界的一种哲学本体论观点。它认为人不仅是世界的真正主人，人本身具有最高的价值，而且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切创造物的主体本质和基础。马克思认为，这两者都是重要的，并且应该统一起来，即完成了的以自然界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应该以人为中心，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应该把人首先看作自然界的一部分，与自然主义相一致。所以，一方面，要在自然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着重强调人的作用和意义，另一方面，要把人及其活动本身主要理解为自然的物质的感性活动。人是在自然界和对象中实现自己的，而自然界也要成为人化的自然，通过人的活动使自然界自身达到更高的发展阶段。马克思所要肯定的唯物主义不是片面地强调自然或强调人的学说，而是把这两者高度统一起来的学说。共产主义扬弃了人和人、人和自然界的异化，因而实现了人和人、人和自然界的统一。这种唯物主义包括了以往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且是它们的高度发展的统一。第六，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下，人的活动异化了，人自身异化了，因而人同自然界、同别人、同类、同自己生产的对象之间，也统统异化了，因而这一切对立的方面都处于尖锐的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共产主义既然扬弃了异化，也就必然会恢复人的社会的本质、恢复人和自然界、人和人、人和物之间的正确关系，也就使上述种种矛盾得到真正的解决。所以，马克思得出结论：“它（指共产主

义)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所以,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得出了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学的反人性结论。

当然,马克思全面地评判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自然科学的二重性。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①。”一方面,自然科学研究了自然界的秘密,为人类全面地利用、改造自然界,也为人通过劳动、活动来全面发展和占有自己的本质,提供了科学的理解。要研究自然界,就应研究同人的活动相联系的自然界,研究同整个自然界密切相关的人本身。另一方面,自然科学在财产私有制下所能做的又是不得不直接完成非人化,这是因为它的每一步发展都只能是私有财产的增强,是对人的异己统治的加强。并且,由于这种异化性质,自然科学就成了只片面研究自然界的科学,而与人的科学相分离。这就是说,私有财产下的自然科学把自己看作是同研究人无关的纯粹以自然界为对象的科学,这是它的缺陷。事实上,离开人来讲自然界,这种自然界既不能使人生存并获得自己作为人的感性存在,也不能成为自然科学的真正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人的科学,历史学、哲学等就同自然科学相疏远而不能结合。这就是说,以往人文科学对人的研究,恰恰离开了人的自然界的存在和对象化活动来空谈人性,不是把人与人的发展当作自然存在和自然史过程,而只是顺便提到自然科学,正像自然科学只是顺便谈到人和人文科学一样,两者都是片面的。

总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学是反人性的。而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对人自己本质的真正占有。马克思经济学不仅仅具有科学性,更主要具有人文性,这是在扬弃私有财产和异化过程中得以实现的。

^① [德]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第 2 章 经济学的“科学困境”及其出路

虽然经济学具有科学性，但经济学毕竟是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所以，以自然科学来要求经济学肯定是有问题的。只有将经济学还视为具有人文性，经济学才能摆脱其科学“困境”。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西方经验主义哲学。而经验主义哲学最早的表现是英国古典经验主义；19 世纪中叶以后往往表现为科学哲学，其派别有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等。

西方主流经济学以经验主义为其哲学基础有其内在的、必然的原因，这表现在（1）经验主义哲学是文艺复兴后自然科学尤其是实验科学发展的产物。自然科学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经验主义在当时的英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流派，是各门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因此，英国古典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必然打上了经验主义哲学的深刻烙印。（2）经验主义把人类的知识限定在经验所能达到的现象范围内，排斥了许多传统哲学所讨论的形而上学命题，而强调其哲学应以实证自然科学为基础，成为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经济学一直致力于“科学化”的追求，因而，经济学在其理论建构和研究中就必然要贯彻经验主义哲学思想。例如，逻辑实证主义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学理论的构成对经济学形式化的影响，表现为数理经济学的发展；二是实证原则对经济学可检验性的要求，体现为计量经济学的发展。（3）从更深层次来看，经验主义哲学内在的认识论特质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基本思想倾向上有着内在的本质联系。经验主义哲学认为人类所有的知识只能来源于经验，不承认存在任何先验的自明的真理，不存在绝对的必然的知识，这就必然要求任

何人都不能因为自己掌握了真理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因此，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是经验主义哲学的自然推论。而对以自由选择、自愿交换为基础的市场机制的信赖和对经济自由主义传统的维护，一直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最基本的思想倾向，显然，这一倾向归于经验主义哲学内在的认识论特质。^①

纵观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史，就会发现，经济学的认识论基础的争论主要是关于“经济学是如何的”和“经济学应该是如何的”问题。尽管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认识论基础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激烈的争论，但也只是在自己经济学视野中进行争论，并没有从总体上做出全面的总结。这就是说，对经济学基础进行哲学反思的经济学需要步入科学哲学殿堂，这是因为科学哲学所反思的科学不仅包含自然科学，而且包括社会科学，也就包括了经济学。实际上，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应用科学哲学的理论和模型来从事经济学哲学研究。如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迪昂—奎因命题、观察渗透理论等就被应用于经济学哲学研究。

具体地说，经验主义哲学的表现——科学哲学和经济学哲学有着内在的联系，可以归及于以下两点（1）主题一致，科学哲学把科学作为研究对象，探求什么是科学、为什么需要科学、如何获得科学、科学如何发展等问题。而经济学哲学回答什么是经济学、为什么需要经济学、如何获得经济学知识、如何发展经济学等问题。（2）任务的趋同。科学哲学的具体任务包括：①对各门科学的逻辑结构和经验结构的分析。②对科学方法论问题的分析。③对科学知识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分析等。经济学哲学的基本任务是什么？豪斯曼在《如何研究经济学哲学》一文中指出：“我本人的工作使我相信经济学哲学的任务是显示那种经济学中完美的合理现象，而科学的合理性的标准则来自于科学哲学的存在，尽管它可能一样是不充分的。”^②可

① 参见张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与方法论特征》，载《经济科学》，1998（5）。

② D. W. Hausman, 'How to Do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In R. D. W. Hausman: Essays on Philosophy and Economic Method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29.

见，科学哲学研究所包含的主要问题，也同样为经济学哲学研究所包含。

所以，我们通过科学哲学来透视经济学，尤其是从科学哲学关于科学划界的标准来断定经济学正走向科学；从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来论证经济学的人文转向，说明经济学的科学特质是单方面的。

2.1

作为科学的经济学

2.1.1 科学标准的演化

科学哲学发展史表明，科学划界的标准经历了经验证实原则到实用原则，再到证伪标准、“权威约定”、“经验符合论”、“经验建构论”等。这一方面说明了科学划界标准的复杂性、全面性，而且没有终结，另一方面说明了科学划界标准由最初的经验与逻辑的绝对主义到绝对主义的怀疑和批判，再到极端的相对主义。也就是说，科学划界标准虽然取得了一些公认的观点，但是，最终不可能完成。

早期实证主义者孔德最先提出了“实证原则”，认为认识（或知识、思想）只能局限于经验的范围内，不能超出经验之外，只有这样，才是科学的。相反，经验之外是否有物质的存在，以及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如何等问题，都是人的认识能力所不可及的“形而上学”问题，即非科学问题。人们没有任何经验根据去讨论它们。所以，应根本不予理睬。从而，孔德划分了科学与非科学等。

但是，这种“实证原则”是以归纳法为基础的。而自从休谟以来，人们就怀疑归纳法的有效性，认为归纳法缺乏必然性。所以，“实证原则”也就缺乏逻辑必然性，而具有局限性。逻辑原子主义者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则想在数理逻辑或语言基础上解决这一问题。罗素一方面坚持了“实证原则”，即坚持了真理的“符合论”，认为科学真理就是语言与事实的“符合”；确定一个原子命题是否为真，方法就是把它与原子事实相比较，两者一致就为真，否则就是假。他另一

方面认为分子命题及其构成的复合命题无需根据事实，只需根据逻辑法则就可以确定真假，即凡符合逻辑法则的就为真，反之就为假。他说：“纯粹逻辑和原子事实是两个极端，一个是完全先天的，一个是完全经验的。”^①正是先天的逻辑法则的必然性决定了经验世界的构成形式的必然性。维特根斯坦基于“实证原则”，主要从语言角度论述了科学划界的标准。他说，语言的唯一恰当的任务就是描述现实，而一切自然科学命题都是对现实的描述，因此，自然科学命题是可以说的。相反，哲学、逻辑、宗教等都不是对现实的描述，都不具有经验内容，因此，它们都是不可说的，而只能用某种符号或形式表明。对于能说的东西，判断其意义和真假，需要遵循两条法则：一是符合逻辑法则；二是经验上可以证实。两者缺一不可。

逻辑实证主义继承了上述的观点，一方面明确地提出了“经验证实原则”（即任何命题或知识是否有意义取决于此命题或知识是否表述经验内容，即是否能被经验所证实。只有能被经验证实的命题或知识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就毫无意义，而只能是形而上学的“废话”）。从而，继续打着“证实原则”，坚持科学依靠经验；另一方面更发展了“实证原则”：第一，提出了逻辑上的“可证实原则”。这是因为以前的“实证原则”太拘泥于“眼见为实”，但在实际中并非只有被经验证实的命题才是科学。如果是这样，就会使许多因人的检验手段的局限性而暂时不能证实的命题被排除在科学真理之外，于是，他们又提出逻辑上的“可证实原则”作为对“经验证实原则”的补充。指出：一个命题只要逻辑上可证实，或具有证实的可能性，就是有意义的和科学的。第二，提出了用“确证”或“验证”来替换“证实”。逻辑实证主义虽然通过逻辑使人的认识超越经验所构筑的雷池，但是，由于强调人类观察的直接性、经验的中立性而仍然停留在“实证原则”上，也没有解决经验究竟能否最终证实命题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问题，所以，所遇到的挑战仍然是来自对经验或归纳法的怀疑，且迫使它继续退让，直到抛弃“实证”的概念。于是，逻

^① 洪谦：《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23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辑实证主义者卡尔纳普从经验“证实原则”退到“确证原则”，即“验证原则”，提出用“确证”或“验证”来替换“证实”。赖欣巴哈为强化卡尔纳普的经验“确证原则”或“验证原则”，又提出了“概率确证原则”（或概率确认原则）。他认为经验与真理之间只存在或然的概率关系，即“概率联结”。任何科学命题只有在人们有可能权衡其概率的情况下，才有意义。经验归纳只是概率归纳，通过归纳法得出的科学理论只是假设、概率性的知识、或然性的真理和相对真理。第三，由“可证实原则”或“经验确证原则”又走向了约定主义。由于经验实际上是人的感觉，而感觉具有主观性、私人性，甚至有错觉和幻觉，所以，无法判断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事物的经验或感觉内容是否一致，于是，卡尔纳普改用经验的语言表述的证实，来代替经验内容的证实，这是因为人们的语言是共同的、可以交流的。后来又把共同语言理解为共同的观察记录陈述，从而，卡尔纳普就倾向于约定主义了。

既然“经验证实原则”在科学划界上遇到了麻烦，不能证明科学知识的确定性，这迫使哲学家寻找新的出路。20世纪初，实用主义者另辟蹊径。詹姆士、杜威等人既不坚持逻辑的崇高和坚实，也不固守外在的感觉经验，“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因此，他们提出了用实用主义观点来发展和代替“经验证实原则”。詹姆士认为，理论的真理性并不存在于人的心灵和原型的实在之间的关系，相反，只要人们能够把经验材料联系起来，不自相矛盾，并能在应付环境的过程中取得效果，那就是科学和真理。杜威则从工具主义角度论述了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指出：过去的经验主义者将经验死死地钳制在固定的范畴和必然的概念之下，依靠超乎经验的固定原理和不能以实验证明的独断论证据，使科学和真理常常表现为一种支离破碎的分析或强硬的综合。唯理主义则常常出于鲁莽和呆板，给科学装上一个统一和普遍的外表，来为科学和真理铺设一条虚构的安逸的道路，使科学和真理陷于绝对论。而实际上，任何概念、理论不管是如何的精致和坚实，都必须视为假设和工具，视为对一定环境的适应和改造。如果成功，它们就是可靠、健全、好的和真的。如果不能

排除纷乱，免除错误和祸患，它们便是虚妄的、非科学的。

科学哲学家 W. 奎因在批判、继承“经验证实原则”、“实用原则”的基础上，提出逻辑实用主义的划界原则。尤其在验证对象上，他认为判定科学意义的最小单位不是命题，而是整个科学系统。作为一个系统，人们无法断定是该命题或理论错了，还是周围的其他命题或理论错了。这是因为对该命题体系中的其他命题做些调整，就能够抵消这种反证。

由于“实用原则”既缺乏逻辑根据，又没有认识到一切理论的真和善是对立统一关系，所以，实用主义在科学划界上同样会陷入困境。批判理性主义者（或证伪主义者）波普尔反对证实原则、概率确证原则、实用原则，在科学划界上提出了经验“证伪原则”。由于任何科学理论都是普遍命题，即全称命题，而有限的经验所能证实的只是个别或单称命题，但个别无论如何都不能通过归纳上升为一般，因而，经验也不能通过证明个别而证实一般，所以，经验“证实原则”对于理论的检验来说，是一种缺乏逻辑根据而毫无意义的原则，它永远不能使科学理论摆脱假说或猜测的命运。波普尔认为，人们虽然不能利用经验来证实科学理论的普遍性和真理性，但是，可以通过经验证伪个别命题来证伪理论的普遍性和真理性。只要人们在反驳理论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个经验事实与已有理论发生矛盾，就可以证明理论为假，从而证伪了它。所以，理论验证不是逻辑证实，而是一个不断反驳和证伪的过程。任何证实都是暂时的和相对的，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证实，只存在暂时经受严峻检验的确认或确证。波普尔经验“证伪原则”的中心思想就是：一个理论或命题的科学性标准在于可证伪性。一个不能为任何可想象的事件所证伪的理论是非科学的。这就是说，凡属于科学的理论，在原则上都可以反驳和证伪。按照这一划界原则，凡是在逻辑上具有可证伪的命题都是科学的，即使是猜测和想象，只要具有可证伪性，就是科学。反过来，数学命题、形而上学命题等都是非科学。但是，他认为：非科学也同样可能是有意义的。比如，形而上学可以作为科学发现的指导，数学是科学的表达和推理的主要工具。

但是，波普尔的经验“证伪原则”，当然也存在着许多逻辑和验证上的困难。这主要表现在：第一，证伪标准只适用于全称命题，不适用于或然命题。由上可知，由于任何科学理论都是普遍命题，即全称命题，而经验是有限的，即或然命题，所以，当经验和理论发生矛盾时，单一的证伪事例并不能说明任何命题，因为错误很可能不是理论，而是事例本身。第二，经验本身也有主观性，既然观察渗透着理论，要确认谁的观察正确，必然要陷入无穷回归的荒谬境地。所以，波普尔的经验“证伪原则”不久就受到科学整体论和历史主义的严重挑战。

在继承波普尔的朴素的经验“证伪原则”基础上，拉卡托斯建立了科学研究纲领理论。在理论检验对象上，他赞成奎因的整体论，认为不应该把单个命题看作理论检验或评价的对象，而应该把一切科学理论都置于一定的科学研究纲领中。或者说，任何理论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构成的一个整体。它有以下四个互相联系的部分组成：第一，由最基本的理论、观点构成的“硬核”。所谓硬核，就是这个科学研究纲领的基本理论部分或核心部分，其中包括形而上学的内容，也就是奎因所说的“本体论承诺”。第二，由许多辅助性假设构成的“保护带”。保护带的任务在于保护硬核，竭尽全力不让硬核遭受经验事实的反驳，从而使它成为名副其实的不可反驳的硬核。第三，消极保护硬核的反面启示规则，即“反面启示法”。反面启示法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反面的或禁止性的规定。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禁令，禁止科学家们把反驳的矛头指向硬核。第四，积极改善和发展理论的正面启示规则，即“正面启示法”。正面启示法是一种积极的鼓励性的方法论规定。它鼓励并提倡科学家们通过增加、精简、修改或完善辅助性假设等办法，来发展整个科学研究纲领。所以，当科学理论与实践发生冲突时，科学家可以通过调整保护带来拒绝对理论的反驳，这就是说，实验不能简单地推翻理论，科学理论不能被经验证实，也不能被经验证伪。如果说经过几次调整后，所获得的理论 T_2 成功地消除了理论 T_1 所遭受的反驳，预言了新事实，并获得实验的证实，就可以说理论 T_1 被证伪了。因此，他提出了经验“预见原则”，即

任何理论只要拥有较多的经验内容和较大的预见性，就能确证自己的“真”，并证伪一个经验内容较少、预见性较小的退化的研究纲领。从而，拉卡托斯就提出了科学划界的标准。

历史主义者库恩认为，波普尔的经验“证伪原则”只注重理性分析，忽视了社会、历史和人的心理因素在科学划界中的作用。他认为一切科学理论都处于一定的科学范式之中，而任何科学范式的形成和摒弃都决定于科学共同体的集体心理信念，结果是：不同范式的拥护者在不同的世界里从事各自的事业，他们从相同的方向来看相同的问题，所取得的结果却是不同的。因此，理论检验和划界的过程，实质上是科学共同体面对相互竞争的理论 and 范式进行选择的过程。选择的标准是一切科学理论（或范式）所拥有的五个基本特征：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和有效性。但是，库恩反复强调：这些标准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它们在应用时经常互相矛盾。有的范式虽然具有逻辑一贯性，但不具有简单性。例如，托勒密的天文体系虽与亚里士多德的力学理论在逻辑上非常一贯，但不及哥白尼天文体系简单。有的理论虽具有精确性，但不具有广泛性。如哥白尼天文体系，早期在解决日历年长度方面虽比较精确，但在其他许多问题上并不比托勒密天文体系精确，等等。

费耶阿本德从无政府主义的认识论和多元方法论的原则出发，在理论检验和划界问题上也坚持了库恩的自由选择原则。虽然每一种理论都是人类知识海洋的一个分子，即在科学与非科学、真理与谬误、理性与非理性之间也存在绝对分明的界限，但是，费耶阿本德认为，这些界限都是理性人为设置的障碍，要以相对主义的平等的权利来对待宗教、神话、非理性、非科学，以消除理性的愚蠢顽固、孤陋寡闻。

科学实在论在科学划界上，一反以前科学的这些传统，坚持科学理论的客观真理性。比如，针对历史主义学派的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就维护“真理符合论”，强调科学的任务就是表述外部世界；决定科学陈述的真假，不是人的主观感觉、内心结构或语言，而是外部世界。同时，人们也不能一下子就达到客观真

理，只能随着科学的发展而逐渐趋向真理。夏皮尔批判了哲学史上所提出的三种真理观：符合论、一致论、实用论，指出这三种真理观都有错误，也都有合理性。一种正确的真理观应该去除其缺陷，汲取其优点，使真理同时符合三个条件：成功性、无怀疑性和相关性。凡是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命题就可说是真的，科学由此就具有了客观性；反之，就可能是假的，伪科学的，必须被修改或摒弃。

反科学实在论的代表 L. 劳丹既批判了库恩的范式理论及其权威标准，也批判了拉卡托斯的“马后炮”和相对主义。在劳丹看来，只有选择那些比竞争对手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的传统才是积极的接受。一般说来，新的研究传统都具有较高的解题效力、较快的进步与更多的合理性。它和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与一个旧的研究传统及其构成理论之间的关系相比，总具有更大的适合度。所以，科学进步的标志之一是把反常问题转变为已解决的问题。对所有的理论，都必须问“它解决了多少问题，以及遇到多少反常”。范弗拉森在劳丹的观点上，提出了一种有代表性的反科学实在论。他从建构经验论出发，就科学理论与真理的关系问题指出：经验适合的理论不一定反映实存的外部世界。科学只能描述时空的局部，不能描述时空的整体；只能测量可观察现象，不能测量观察极限之外的现象。科学的目的是产生一个关于世界字面上真的故事，提供经验适合的理论，不是追求一个提供普遍的认识对象的真理。在一切科学理论的模型中，除了经验结构之外，其他成分，如公理系统、理论假设等都无客观性可言。因此，一种理论不一定是好的，它仅有助于描述作用。^①

总之，科学划界的标准经历了经验“证实原则”到“实用原则”，再到“证伪标准”、“权威约定”、“经验符合论”、“经验建构论”等。这说明了科学划界标准的复杂性、全面性，而且没有终结。同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科学划界标准正在弱化。这就是说，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是相对的。

依我看来，科学划界的标准简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第

^① 参见张之沧：《鉴定科学与非科学的原则和方法》，载《学海》，1999（1）。

一，科学必须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第二，科学必须有自己的研究方法。第三，科学必须有自己的完整的理论体系。第四，科学必须经过验证。第五，科学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或解释世界，以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指导人们改造世界。当代科学哲学中组合主义、重组主义到整体论，在很大程度上便显示了这一标准的合理性，这是因为它们都是从科学的精确性、简单性、系统性、和谐性以及确定性等方面来规定科学的本质的。

2.1.2 经济学正走向科学

下面从科学划界的标准出发，来论述经济学具有科学的特质。

1. 经济学有自己的研究对象

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上，西方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理解，主要表现在：第一，研究财富；第二，研究关于物品的生产和交换的那些活动；第三，研究如何选择使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商品和分配；第四，研究总体经济中的价格、产量和失业的变动趋势，以制定政策，使政府改进经济的绩效；第五，研究国际贸易原因和设置经济壁垒的效应。

虽然如此，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承认：经济学是研究如何有效地利用可供选择的有限资源生产各种商品，且把商品在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进行分配，以求人类现在和将来的欲望得到最大满足的科学。简言之，经济学就是研究有限的或稀缺的资源和人的无限的欲望之间的矛盾，以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人的欲望的最大满足。

按照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问题的范围、经济范畴的不同，经济学通常被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研究单个经济单位（如企业、消费者、资源所有者）的经济行为。它涉及的经济范畴是效用、利润、成本、收益、生产函数、个别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商品价格以及各种弹性概念、生产资源的分配、各种市场中的企业均衡等。而宏观经济学则研究经济总量，它涉及的经济范畴是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总需求、总供给、总投资、总消费、总储蓄、货币流通量、价格水平、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等。

由此，微观经济学主要解决的问题是资源配置问题，即生产什

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具体地说，生产什么取决于消费者的货币选票，如何生产取决于不同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以及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为谁生产取决于生产要素的供求关系所确定的要素价格。这些问题事实上就是市场经济如何运行的基本问题。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核心是价格机制。因此，价格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中心。以此为基础，微观经济学还包括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厂商与市场均衡理论以及一般均衡理论、福利经济学等。而宏观经济学主要解决的是资源充分利用问题，即当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不均衡时，政府应当采取哪些措施来恢复均衡，也即资源是充分利用了还是存在闲置现象？通货膨胀对购买力产生了什么影响？经济的生产能力是否增长？等等。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把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和就业率联系起来进行综合的分析，即收入和就业分析，所以，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此外，宏观经济学还包括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货币与通货膨胀理论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等。

因此，微观经济学对于市场机制的研究，有助于说明各个商品市场的价格决定问题，使人们有可能弄清楚收入分配的合理性和经济运行的有效性，找到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有限资源最佳配置的方法和途径。宏观经济学对于国民经济整体功能的研究，有助于说明整个经济产出水平的决定过程，使人们有可能弄清楚经济的长期增长和短期波动问题，找出实现整个社会生产能力长期持续稳定增长的方法和途径。

2. 经济学有自己的研究方法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经济学中的一些具体的方法。这主要有：微观分析方法（或个量分析方法），如需求分析方法、边际分析方法、供给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等；宏观分析方法（或总量分析方法），如总需求分析方法、总供给分析方法、宏观经济均衡分析方法、经济增长分析方法等；经济数量分析方法，如数理经济学方法、计量经济学方法、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投入产出方法等。二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般方法。这主要有：经济学研究方法论、

经济学方法论。前者是进行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如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和目标如何确定、经济学研究项目如何设计、经济学文献如何评价、经济学研究报告如何写作等；后者是所有科学中普遍使用的方法，如实证方法、规范方法、归纳方法、演绎方法、定性方法、定量方法等。三是经济学中的哲学方法。这是一切科学中最一般的方法，如辩证法、认识论、辩证逻辑等方法。当然，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这三个层次虽然是有区别的，但又是相互联系的。

显然，本部分偏重的是第二层次的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下面，重点论述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方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尤其是现代物理学和数理统计学的发展，对西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方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谓实证分析方法，就是指从某个可以证实的前提出发来分析人们的经济活动，并预测人们经济后果的一种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企图超越或排斥一切价值判断，来分析社会经济生活是如何运行的，是怎样运行的，以及它为什么是这样运行的。它不把价值判断作为基础，而只考虑建立经济事物之间关系的规律，研究各种经济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并在这些规律的作用之下，分析和预测人们经济行为的效果。也就是说，实证分析方法只是力求说明和回答经济现象“是什么”或“不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而不回答“好”或“坏”的问题，即经济现象的现状如何、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后果如何等问题，至于是不是应该作出这样的选择，实证分析方法则不予讨论分析。

实证方法包括理论实证方法和经验实证方法。实证研究的一般过程，可以概括为四个步骤^①

第一，提出理论假说的有关假设条件。建立任何一种理论假说的第一步，就是明确提出有关的假设条件及理论假说的中心内容。一般来说，在理论实证层次上，研究者主要关心的是在高度简化（抽象）的基础上，有关研究对象的少数几个主要变量之间的关系特征，而其他有关变量则被舍去。因此，如何把握和确定主要变量及其基本关系

^① 参见陈宪：《经济学方法论通览》，217~219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的特征，剔除其他变量的理由，就成为这一步骤要分析的具体内容。虽然合理地提出有关假设条件没有固定的方式可循，但是，从对西方经济理论实证过程的观察和分析中，大致可以得出三个方面的原则：一是简单性原则。西方经济学中基本理论层次上各种问题的研究最终总是归结为两三个主要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要实现简单性原则，就必须做出一定的假设。常用的一种方法是隔离法，即在分析主要变量之间的关系时，总是在“假设其他变量对其关系的影响不变”的条件下进行，这种方法在西方微观经济学中经常可见。另一种是综合法，即主要研究具有综合性质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其他有关变量对主要变量的影响要么已包含在主要变量之中，要么其影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或影响力太小，由此可以假定其他变量的影响是稳定的或是太小，因而可以忽略不计。这种方法多出现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二是从短期影响到长期影响。一般说来，许多经济因素在短期内变化稳定或较小，所以可以看作不变。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部分都是以研究短期问题为主要对象的。当然，必须要考虑长期（动态）问题。但是，由于在长期问题中，各种因素的变动性较大，所以，在考虑其他因素时，必须进一步分析各种长期影响程度的稳定范围及规律性，如果不能确定其规律性的固定形式，假设条件便难以成立。在西方经济学中，有关变量长期变化性假定多以与主要变量成比例性变化居多，不然，就要增加主要变量的数目，这就大大地增加了理论实证的难度。三是假设条件的提出要考虑到理论模型建立和其经验检验的要求。假设条件要保证最终确定的主要变量有具体明确的数量含义和它们之间较明确的数量关系，这是进一步建立理论假说模型具体形式的基础；同时，确定的主要变量要尽量与有关统计资料的情况联系起来，不然，建立起模型并推导出有关的结论和预言就无法得到直接验证，其实证研究只能是有头无尾，成为“悬念”。

第二，建立理论假说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结论。在一定的假设条件和理论假说构思的基础上，构造理论假说模型的主要问题是寻找模型的具体形式，即在把握各主要经济变量相互作用机制、方向及作用过程的基础上作出数学表述。一般来说，理论假说模型的形式应主要以

数学形式为主，并可进一步用几何图形和文字表格等加以直观和通俗地表述。理论模型确定后，应主要依据数学推理逻辑前后一贯地推导出各主要变量之间各种状态下关系的数量特征，并同时展开各种数量关系特征经济意义的进一步讨论、分析，直至得到与假说构思相吻合的有关结论为止。

第三，理论假说模型的经验检验。经验检验的主要内容有：对理论假说的基本假设条件进行验证，对理论模型推导出的主要结论进行验证。验证时所利用的统计资料应具有充分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同时应避免主观因素对数据和选择数据的影响。西方经济学中有关经验检验的主要技术手段是经济计量学中有关回归分析和统计假设的检验方法。经验检验的意义在于：通过已有的经验事实数据论证理论假说的真实性，进一步增加其说服力；通过经验检验找出理论假说的不足，不断推动理论向纵深发展，进一步提高理论的分析能力。

第四，验证理论假说，并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从经验检验得到的具体数据中分析结论往往并不是一目了然的，有时验证结果与理论假说的一致性表面上显得含混不清，甚至有一定的矛盾；有时由于缺乏有关数据，只能间接地或部分地检验理论假说的内容等等。因此，解释验证结果的工作有时是非常复杂的，需要做深入的、细致的分析。对检验结果的解释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它直接涉及到理论假说本身的价值，不能轻易地肯定或否定。同时，解释各种检验结果并展开理论分析，更可能是实证研究的重新开始。

在这里，特别强调运用经济计量学进行经验实证的一般逻辑过程。这往往有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根据理论假说的有关假设或结论，确定其主要经验实证的具体对象和有关具体的数量特征的结论。第二，根据所确立的经验实证对象，即结论，或预测，或假设条件，具体设计其对应的经济计量模型形式。其中，主要包括把有关不可能观察的理论变量转化为可以观察计量的经济变量，将有关经济理论命题转化为可以进行检验的统计假设，以及收集、整理有关变量的统计资料，并确保其统计数据含义与其模型中变量含义的一致性。第三，确定具体的经济计量学方法，即根据有关统计数据，对确立的经

济计量模型进行估计，并对其统计假设进行检验。这主要是经济计量学技术方法的直接应用过程，基本上属于数学内容。第四，对其估计、统计假设检验结果进行分析、解释。在分析、解释过程中，主要注意对其估计、统计检验结果受经济计量学方法影响程度的分析、解释。这是因为经济计量学方法基本上仍属于“线性分析”的范畴，其有关“线性”假设对其估价的效果往往产生极大的影响。这时需要弄清楚的是，估价、检验的结果主要是由理论假说引起的，还是由计量方法的影响而有“变形”的可能性引起的。在未分清之前，就不能完全根据估价、检验的结果来判断其理论假说的命运。这一点也往往是引起经验实证结果争论不休的主要原因所在。^①

所谓规范分析方法，是指从一定的价值判断或伦理判断出发，提出一些衡量经济活动的标准，然后，再根据这些标准来研究和分析经济现象，并把这些标准作为处理和分析经济问题的准则，作为经济理论研究的前提条件，作为经济活动的标准，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并研究经济活动怎样才能符合这些标准。所以，规范分析力求回答的是“应该是什么”或“不应该是什”、“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或“不应该怎样”之类的“应该”或“不应该”、“该”或“不该”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选择，而不作出另外一种选择的问题。它研究和分析个人、企业和社会应该怎样组织经济活动，判断它们提出的经济目标是否合理，并说明应该怎样解决这些问题。

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的关系和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关系是一致的，我们将在下面进行论述。

3. 经济学有自己的理论体系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学是由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这两部分构成的；二是经济学是由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所构成的。

由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毕竟有所不同，所以，

^① 参见陈宪：《经济学方法论通览》，230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它们之间还有许多不同点。这在上面已有论述，这里仅从宏观经济学分析与微观经济学分析的区别再做简单的论述。在微观经济学分析中作为已知量的东西，即整个国民经济的总产量，在宏观经济学分析中则作为数值有待确定的重要变量；在宏观经济学分析中作为已知量的东西，即产量、就业量和总支出量在各个产业和厂商的商品和劳务中的分配，在微观经济学分析中却都是变量。至于价格，在微观经济学分析中作为已知的总的物价水平，在宏观经济学分析中则作为一种变量；在宏观经济学分析中作为已知的相对价格，在微观经济学分析中则作为变量。

虽然如此，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仍有许多共同点。与微观经济学一样，均衡分析、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动态分析、数理经济分析、计量经济分析等也是宏观经济学分析的基本工具。事实上，宏观经济学分析和微观经济学分析是不能截然分开进行的。在分析宏观经济的各个变量及其相互关系时，必须把可能影响到宏观经济变量的微观经济的各个变量的变动考虑进去，反之亦然。在分析决定一国物质利益的经济变动过程时，必须同时考虑到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两个方面。从宏观经济学分析的观点来看，假如一国生产中实际利用的资源总量配置的优劣是一定的话，那么这种资源总量越是接近于充分利用，该国的物质福利就越大。从微观经济学分析的观点来看，假如资源总量的利用程度是一定的话，那么这种资源越是接近于最优配置，物质福利就越大。显而易见，这两种经济学的基本目标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全体国民的最大限度的物质利益。这一目标只有靠全部可利用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最优配置才能达到。目前，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区别正变得越来越模糊。近年来，大量的著作开始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许多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都带有明显的微观色彩。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区别就如同热力学中单个分子的行为与其总体物理特性的区别一样。统计热力学的微观理论就是从研究单个分子的行为及其相互作用开始的，然后推导出这些行为对于宏观体系的意义。同样，微观经济分析的出发点是单个的决策表明其选择，而宏观经济分析仅仅表现在这些单个决策的“总和”时才具有意义。

事实上，在经济学发展的早期，是不存在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区别的。直到1933年，弗瑞希把微观和宏观这一术语引进经济学。他最早使用的是“微观动态学”和“宏观动态学”，其意思就是现在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不仅如此，弗瑞希还对这些术语给出了明确的定义，这些定义更接近于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现代用法。他认为，微观动态学考虑特殊的市场、企业等，而宏观动态学与整个经济体系有关。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从而，使宏观经济分析与微观经济分析的区别变得十分明显。凯恩斯本人虽然没有使用这两个术语，但他实际上给出了明显的区别。他说：“我以为把经济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价值论和分配论，另一部分是货币论，实在是错误的分法。我以为正确的两分法应当是，一面是关于一厂或一业之理论，研究如何把一特定量资源分配于各种用途，其报酬为如何等；另一面是适用于社会全体的产量论及就业论。”^①

第一章曾经提到了经济学及其方法论方面的争论最终会反映出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的争论。事实上，经济学自身就是由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所构成的。实证经济学研究实际经济体系是怎样运行的，它对经济行为作出有关的假设，根据假设分析和陈述经济行为及其后果，并试图对结论进行检验。简言之，实证经济学是关于经济现象“是什么(What it is)”的知识体系。规范经济学试图从一定的社会价值判断标准出发，对一个经济体系的运行进行评价，并进一步说明一个经济体系应当怎样运行，以及为此提出相应的经济政策。简言之，规范经济学是关于经济现象“应该是什么(What it should be)”的知识体系。因此，实证经济学研究经济运行的规律，而不涉及评价问题，规范经济学则对经济运行进行评价。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最早对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加以区分的经济学家是英国的西尼尔。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这相对于后世所说的实证经济学。而研究经济伦理和经济政策建

^① [英]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徐毓桐译，252~25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议问题的是立法学和政治学，不是他所认为的政治经济学，这实际上相对于后世所说的规范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对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作出更严格区分的经济学家是英国的大卫·休谟。休谟提出了所谓“休谟问题”，也被人们称为所谓的休谟的“铡刀”，即不能从“是”中推导出“应当”来，也即从事实性的陈述性的说明不能推导出规范性的伦理性的说明。这就是说，休谟认为，实证分析研究“是”与“不是”的问题，而规范分析则研究“应当”与“不应当”的问题。这一“是”与“应当”的二分法是以以后西方经济学界关于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之间争论的焦点，即经济学应当不应当涉及价值判断，应当不应当涉及社会伦理问题。1891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即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父亲）发表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及其方法》一书，又把经济学区分为实证经济学、规范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艺术”。实证经济学为建立其他两种经济学提供一致性服务，而规范经济学则是构成联系其他两种经济学的桥梁。政治经济学“艺术”是为达到一定的目的所必须遵循的规则体系。但是，凯恩斯的三分法并未赢得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的赞同和接受。帕累托还在纯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之间划了一条分界线。他认为，纯经济学只包括实证经济学，不包括凯恩斯所谓的规范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艺术”。他认为，“帕累托最优”是一个纯经济学的命题，是完全独立于任何伦理经济学判断的，即独立于规范经济学。

近三四十年来，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已成为西方经济学的通用术语。在经济学中，所谓实证分析，是指分析经济现象“是什么”的方法，即是对事实判断的分析，也即对客观事物的状况及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的事实性陈述的分析；所谓规范分析，是指分析经济现象“应该是什么”的方法，即关于价值判断的分析，也即对价值主体与价值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的分析。前者主张摆脱价值判断，归属于实证经济学；后者主张贯穿价值判断，归属于规范经济学。

其后的西方经济学家一直对“二分法”持异议。其代表人物有尼格尔、缪尔达尔、罗宾逊、萨缪尔森、海尔布伦纳等。尼格尔主张

区别两种价值判断即描绘性价值判断和评价性价值判断。所谓描绘性价值判断，包括对所研究的题材的选择，按照一定的可靠性标准对资料所进行的选择，判定新理论的有效性所应遵循的标准等，这是可以通过强制性地诉诸客观依据的方法而加以解决的。所谓评价性价值判断，是指对世界状况的评价，它涉及各种人类行为及其社会成果是否合乎人的需要，显然，这涉及道德价值判断问题，可以通过劝说性的诉诸情感的方法来加以解决。尼格尔认为，对社会科学来说，不可能没有描绘性价值判断，但它至少在原则上不应受评价性价值判断的束缚。这就是说，尼格尔虽然承认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二分法，但他承认在经济学中存在着实证分析，这在原则上不应受规范分析的束缚。当代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缪尔达尔认为，在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不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正如手段和目的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样。价值判断是无所不在和无可避免的。没有一定的目的或价值，就不可能有经济假说的验证。所以，他主张将价值判断作为经济分析的前提条件，这有助于增强经济分析的客观性。这就是说，规范分析是实证分析的前提条件，规范分析是为了更好地实证分析。英国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强调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的相结合。她认为，经济学绝不可能是一门完全“纯粹”的科学，而不渗入人的价值判断。对经济问题进行观察的道德和政治观点，往往同提出的问题甚至和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现代新古典综合学派代表人物萨缪尔森认为，由于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关系及其规律性，这不可能像物理学、化学那样能进行人为控制的实验，而只能使用逻辑推理、统计归纳等认识方法来进行研究，所以，在经济分析中就不可避免地渗透着研究者的价值判断等主观因素。海尔布伦纳于1973年发表了《作为‘非价值’科学的经济学》一文，对经济学应摆脱价值判断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就在于人的行为受到有意识、有目的的支配。如果不对此作出某些假定就不可能从社会事实中得到任何结论。这就是说，没有规范分析，也就没有实证分析。他还补充说，经济学家像所有其他研究者一样，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带

着一种愿望去执行其任务，而不会没有利害考虑，即经济学家不可能摆脱其价值判断的影响，其著作必然充满了规范分析。

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之争，最明显表现在对帕累托最优化原理的争论上。在西方经济学界，一直存在着帕累托最优化原理属于实证经济学范围的观点。如阿奇博尔德、亨尼普门就是如此。阿奇博尔德认为，帕累托的福利经济学所研究的是个人基于自己的利益、为满足一定的需要而作的各种选择或各种安排的效率，个人的偏好同其福利是一致的，个人的选择不会影响其他人的选择，因此，不存在价值判断。亨尼普门认为，帕累托最优化原理建立在三个基本假定上：一是只有个人自己所选择的偏好才可算作个人福利的尺度；二是社会福利由个人社会成员的福利所组成；三是只有一致同意的资源的重新配置，才可视为社会福利的增加。虽然亨尼普门具有折中的观点，但是，由于他认为第一个假定带有实证的性质，因此，不能将帕累托最优化原理视为纯粹的规范经济学。亨尼普门还认为规范经济学的基本课题是提出政策建议，在这方面，帕累托最优化原理并不突出，它提供的只是各种社会福利状况的部分排列，因而，帕累托最优化原理并不带有明显的规范性质。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持反对意见，认为帕累托最优化原理属于规范经济学。例如，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既然帕累托最优化原理的核心是“看不见的手”论，它也就天然地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由于“看不见的手”论不是证伪性理论，因而，不可将帕累托最优化原理和实证经济学混为一谈。尤其是，即使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也对国家干预表示认可，主张借此来实现帕累托最优化，因此，认为帕累托最优化原理属于实证经济学的两个基本论据，即“看不见的手”论和不提供政策建议都不复存在，帕累托最优化原理乃至福利经济学也就理所当然地属于规范经济学范畴。

虽然西方经济学关于实证经济分析与规范经济分析的争论经历了一个多世纪之久，但至今尚未结束。从西方经济学发展史可以看出，作为两种经济学分析方法，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不仅是有区别的，而且是统一的，即规范分析应以实证分析为基础，实证分析应在规范分

析的前提下进行。这也说明了两者是相互渗透的。^①

首先，规范分析应以实证分析为基础。这是因为规范分析所必需的演绎的前提应是经过实证检验的，且由规范分析所得到的成果也必须经过实证检验。

其次，实证分析应在规范分析的前提下进行。这是因为经济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获得被实证检验了的假定或前提，从而建立规范经济学，其重要目的还在于将包括经济政策建议在内的规范经济研究成果用来指导经济实践的进行。可见，经济学的最终目的是实证经济学得以发展的重要动力，而此目的是由规范经济学提供的。事实上，当经济学家指出了经济问题的可能途径时，他已经是在进行规范分析了。这就是说，只要实证经济学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他实际上就在规定着未来政策等的选择范围和方法，含有强烈的规范成分。当实证经济学家孜孜不倦地对大量经济学假设命题进行证实时，他的潜意识中就蕴涵着渴望赋予这些假设命题的普遍意义。简言之，对实证分析来说，无论是课题的选择、方法的采用、成果的形成等都或多或少带有规范的成分。

由此可见：第一，规范分析中有实证分析。这是因为：①规范分析结论的说明要用到实证分析。这就是说，规范分析不仅要以事实为根据，而且要使用逻辑推理来证明其结论。这当然离不开实证分析。②规范分析的深化要借助于实证分析。例如，福利经济学曾被认为是一门典型的规范经济学，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此研究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实证化，甚至产生了许多专门研究福利经济学的实证工具。第二，实证分析中有规范分析。这主要表现在：①实证分析的大量问题来自规范，并为规范目标服务。这就是说，规范分析常为实证分析指明应当努力的方向，向实证分析提出问题。例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的许多实证分析，就是为了回答失业和通货膨胀哪个更重要，并应如何解决这一规范问题的。②实证分析中推理的“逻辑取向”是由规范分析确定的。例如，对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新

^① 沈莹：《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深层关系刍议》，载《当代经济科学》，1996（3）。

古典综合学派和新剑桥学派在开始它们的实证推论时，确定经济增长与什么结合考察的“逻辑取向”就是一种规范。前者将资本、劳动与技术 and 经济增长结合起来考察，而后者则把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结合起来考察。③实证分析所用的重要概念常是“规范”出来的。虽然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认为他们的大部分经济学理论是实证的，但他们的那些理论是建立在“效用”作为价值的基础上的，将效用作为价值本身就是一种规范。

从中也可以看出，在经济学中，价值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虽然马克斯·韦伯主张“价值中立”，但是他并不否定社会科学充满着政治倾向，也并不否认可以对人类行为的意向进行合理的分析。相反，他认为，思想意识的偏见会偷偷地潜入社会科学家对所研究问题的选择，甚至会使科学家从事实证据中作出的推论受到某种价值观念的影响，乃至其所提出的实际忠告会带有隐藏的价值判断。正因为如此，在经济学中就需要证实和证伪等理性标准来对人们的价值判断或规范判断进行分析或批评，马克斯·韦伯就非常强调这一点。这正如马克·布劳格所说：“所有科学都有哲学的、社会的甚至是政治的含意，这可以使科学家在估价支持或者反对某个假说时有偏见（人们只要想想对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和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科学反应）。所有各种思想意识基础和专门的辩护是科学工作的普遍特征，对此唯一的纠正办法是其他科学家以该学科所分担的专业为标准对之做的公开批评。对此，至今在经济学和任何其他科学学科之间还没有什么可选择。”①

一般说来，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中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基本上都属于实证经济学，但是，其中又都包括不少规范分析的因素。例如，在微观经济学中，在涉及消费者偏好和收入再分配的研究中，都具有规范经济分析的成分。在宏观经济学中，关于充分就业的含义、关于经济增长的后果等问题，就是一种规范分析。至于西方经济学说中的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和激进经济学则主要是一种规范经济

① [英] 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黎明星等译，16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学。这就是说，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中的正统学派，如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强调实证经济分析。而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异端学派，如新制度学派和新剑桥学派则偏重规范经济分析。

从上也可以看出，经济学有其检验的标准，这主要表现在其证实标准上。经济学有其目的，一是为了说明世界，这表现在实证经济学上；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主要表现在规范经济学上。

正是由于经济学有其研究对象、方法、理论体系、检验标准、目的等，所以，经济学具有科学的特质。

由上可知，规范经济学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或福利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这表明，虽然规范经济学是从人的价值或伦理出发的，意味着人的精神追求，但是，西方经济学追求的仍是功利，而且使人文从属于功利的追求，从而使自己仍主要停留在功利阶段。

2.2

经济学“科学困境”的种种表现

在自然科学中，研究者比较容易保持“价值中立”，而在经济学中，研究者既是观众，又是演员，很难保持“价值中立”。事实上，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来看，经济学是研究有限的或稀缺的资源 and 人的无限欲望之间的矛盾，以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人的欲望的最大满足。所以，人总是从自己的价值判断出发，对稀缺的经济资源进行不同的选择，这就是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这显然和自然科学有明显的区别。

除此之外，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一般区别还有：经济科学中没有普遍的永久性的法则，而自然科学中却有。经济学在改变社会的同时，也往往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经济学在实践的过程中能够使整个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发生改变，从而也就改变了自己适用的宏观经济条件，使自己成为不能适应新情况的理论。社会经济在不断发展变化，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问题，因而，就有不同的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理论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这种关系在自然科学中是不存在的。因此，由

于经济现象本身会因为经济学的发展而变化，所以，要在经济科学中发现永久普遍性的法则是困难的。即使有极少数这类法则在被用来解释具体经济现象时，也必须追加一些适用于特定研究对象的假设和辅助定理。正因为如此，在许多人看来，经济学总是处于一种不成熟的状态，没有长存的基本公理，没有决定性的检验，没有能力作出精确的预测，这实际上是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对经济学进行评判。

正是由于经济学与自然科学有重大的区别，所以，以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要求经济学肯定是有问题的，必将使经济学陷入“科学困境”。

2.2.1 对象问题

虽然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承认经济学是研究稀缺的资源和人的无限的欲望之间矛盾的一门科学，但是，依然有一些经济学家不完全承认这一定义。事实上，当今一些经济学如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等确实很难适合这一定义。

即使经济学是研究稀缺的资源和人的无限欲望之间的矛盾，经济学也必须一方面研究资源，另一方面研究人，更应该研究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环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的兴起，就说明了这一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的价值观或伦理观——功利主义。人和物之间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人，如果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好，人和物的关系就肯定不会解决好。

所以，如果深究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话，就会发现，经济学更应当是关于人的学问。“把经济学视为科学”所引发的种种问题，都与此有紧密的关系。如果经济学是研究物的话，那么，经济学就当然是自然科学了，也就不会引发这些问题了。事实上，经济学不是自然科学，将经济学仅仅看成科学是片面的。

2.2.2 价值问题

在自然科学中，人们容易做到“价值中立”。这通常被认为是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的表现，进而被认为是自然科学的最大的优点。但是，当经济学家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建立经济学体系时，他们很快就

会发现，经济学面临着—个在自然科学中通常不会遇到的问题，即当人们面对各种社会现象，特别是面对涉及人们切身利益的经济问题时，总要做出好坏或应该与否的判断，即价值判断。人们很快又会发现，不管用强制的高压手段，还是进行温和的劝说，人们在价值判断上都不可能完全统一起来。由此，经济学到底是建立一个“完善的”价值判断，还是彻底摆脱价值判断？如果回答是前者，那么，评价—个价值判断是“好的”或“完善的”标准是什么？建立这个标准意味着要建立另外—套价值判断，依此类推，人们也许可以提出许多的标准。这是否意味着经济学将被淹没在无休止的争议，乃至偏见、谎言之中？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人们又会问：经济学能够摆脱价值判断吗？如果能够摆脱，那么经济学家又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摆脱呢？这一方式又怎么能够保证价值判断不以隐蔽的方式在经济学中得以存在呢？^①

这就提出了—个非常根本的问题：人们接受或证明经济学的“科学标准”究竟是什么？在经济学中，客观的标准或科学的标准究竟存在还是不存在？由此可见，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要求经济学肯定是有问题的。

2.2.3 假定问题

西方经济学及其理论总是从其假定开始的，所以，经济学及其方法论方面的争论往往会涉及假定的现实性问题，即经济学中的假定总是具有非现实性。弗里德曼认为，只要经济学的预测是可靠的或正确的，那么无论经济学的假定正确与否，经济学及其理论也就是有效的或正确的。甚至他还认为，假定越是不现实，乃至荒谬，经济学及其理论反而是有效的或正确的。这就是说，经济学及其理论的有效性或正确性和假定的现实性无关，这被萨缪尔森称为F——扭曲。

对经济学中假定的现实性问题争论最多的就是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假定——理性经济人的假定。

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的假定，是不断变化而逐步演变的。经济

^① 陶永谊：《旷日持久的论争——经济学的方法论之争》，70页，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学家最先把人定义为具有资本职能的经济人，以后，开始从社会生产关系方面来考察经济人的行为和管理问题，并提出了社会人、组织人的概念，从而试图在经济理论、经济管理中引入社会伦理的因素。那么，经济人假定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呢？还是经济学家的一种假想模式呢？答案显然是后者。事实上，亚当·斯密也不认为经济人的“自利心”是人们行为的唯一动机，同情心同样也支配着人类的行为。就连提出每一个人的行为受自利原则驱使是“经济学第一原则”的爱奇沃思（Edgeworth），也承认这个原则并不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东西。^①在经济实践中，自利原则遇到的一个重要困难是现实中存在的利他主义经济现象，这一点就连马歇尔也不否认。他说：“无疑地，即使现在，人们也能做出利人的贡献，比他们通常所做的大得多，经济学家的最高目标就是要发现，这种潜在的社会资产如何才能更快地得到发展，如何才能最明智地加以利用。”^②

同样，“理性人”也具有非现实性。“理性人”从斯密开始，主要经过了三次大的争论。在斯密那里，经济理性表现为“人们在市场活动中，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得失和盈亏的精密计算”。到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理性被视为与自身利益最大化等同，理性经济人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这就使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被广泛应用成为可能。这种理性观，被后来的经济学家概括为三条基本含义：目标的一致性、手段与目标的一致性以及收益最大化。随着博弈论进入经济学，经济理性的外延被进一步放宽，“理性人”被理解为每一个人的自利行为与群体内其他人的自利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假设。这是一个很弱的理性概念。对于这一观点，阿玛蒂亚·K·森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仅仅有选择的内在一致性对理性来说是不够的，至少它还必须要求在一个实际持有的目的与他所作的选择之间存在一些令人信服的关系，而一致性假说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他进一步把“理性经济人假设”斥为“理性的白痴”。他进而建议，应该建

^① [法] 季德·利斯特：《经济思想史》（下册），徐卓英译，627～6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② [英]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朱志泰译，3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立一种比理性原则更为复杂的理论结构。他还指出，即使人们能够以理性的方式行动，正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定也不必然是有道理的。这是由于我们都会犯错误，都会陷入混乱，“冷静的理性方式可以充斥我们的教科书，但世界要丰富得多”。^①“理性人假设”本身是虚弱的，它的合理性来自于一些增强的补充性假设，如完全竞争、市场均衡、充分信息以及同质性假设，还应该加上个人有足够强大的信息处理和计算的能力。^②而这些补充性假设却是难以得到现实有力支持的。^③

既然“理性经济人”具有非现实性和不可检验性，那么，为什么主流经济学家仍然固守这一假说呢？“科学主义”可能是一个解答。由于经济学本质上是研究人的行为，而人是复杂的，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所以，既可以从科学出发来研究人，也可以从人文出发来研究人，这都需要将人的复杂现象加以简单化，即从人的某一现象出发来研究经济学，否则，把作为复杂现象的人作为研究对象虽然是真实的，但是，这无法进行。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科学的假设方法。可见，经济学假设是一种科学方法，但，如果认为它是绝对真实的，就是科学主义。特别是，按照自然科学的要求，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形式已很科学化尤其是数学化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形式上已很科学化的主流经济学却对现实经济问题不具有很强的解释和预测能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学的前提假定的非真实性。可见，经济学的前提假定的非现实性，是与人这一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紧密相关的。

2.2.4 实验问题

实验一直被认为是“科学”的标志。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也表明了这一点。

^① Sen, A. K., *On Ethics and Economics*, Oxford: Blakwell Press, 1987, p. 11.

^② [美]肯尼斯·J. 阿罗：《经济理论与理性假说》，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72~78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③ 参见庄宗明、杨旭东：《“经济人假说”：争论与超越》，载《学术月刊》，2001（2）。

传统观念上经济学通常被视为一门“观察性”学科，而非一门实验性学科。经济学中带有所谓实证意义的观察以及相关的经验研究，只是在一系列公理化假定前提下对经济现象与行为的描述和解释，或者是从客观经济环境中挖掘对严格假定和复杂技术（主要是数学技术）下形成的各类理论模型和命题的支持；至于计量分析中的统计数据往往并非由经济学家亲自获取，而多由政府及一些私人机构采集——至少，科学研究并非其主要目的。因此，经济学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第一，理论难以实证，更无法证伪。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假定——理性经济人假定也是如此。第二，经济学理论中的分歧乃至对立倾向愈演愈烈。对于同一经济现象，比如“滞胀”，不同的学者或派别往往作出不同的解释并开出不同的政策处方。第三，经济学理论与现实世界间的距离愈来愈远。如下面所说的高深的数理表达、精巧的建模技术，以及严格的前提假定，已成为经济学研究中的一种时尚。这使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已演化为科斯所说的“黑板经济学”，即其背后已很难看到现实基础，其付诸实践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科斯曾宣称他所创立的学说（即新制度经济学）旨在拉近与现实的距离。

所以，实验经济学就是要克服传统观念上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诸多不足，在经济学理论与现实之间架起一座新的也是可靠的桥梁。它认为，实验方法不仅能有效验证多种经济理论，而且还能对多种经济政策以及许多经济制度规则作出有效的评价。最早将实验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伦。为进一步研究垄断竞争理论，他于1948年在哈佛大学首次进行了自然市场的实验室模拟。由于实验结果不尽满意，张伯伦在此后放弃了该项工作。除了市场实验之外，还有个个体决策实验和博弈实验。

实验经济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观念上经济学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学的“科学化”。实验方法的主要优势集中体现在“可重复性”和“可控制性”，可重复性意指其他研究者是否能够重新进行同样一个实验，并由此证实某个单独发现。可控制性意指对实验条件的操纵，能够使观察到的行为或现象被很好地用于

对相关理论或政策的检测与评价。但在经济学研究中，记录下来的数据随着现实背景特别是一些未加观察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一般是独一无二和无法重复的，而且经济数据的收集和单独证实通常也意味着极为昂贵的成本。因此，花费相对低廉的成本，亲自进行能够重复的实验室查证，对职业经济学家来说，是相当有难度的。同样，自然市场本身缺乏控制或难以控制，使得在复杂情境下采集到的数据并不完备与精确，很难进行辨识和用于理论的检测。所以，实验经济学必须要对实验现象做极大的简化，才能在实验室里发现一个决策环境，这难免会引起经济学家对实验经济学的激烈争论。有人指出，经济学中的实验，不同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中的实验，它是十分有限度的。实验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科学主义的思潮。^①

2.2.5 过度的数字化问题

虽然古诺在 1838 年出版的《财富原理的数学原理研究》是最早应用微积分研究经济学的名著，但是，古诺的数理经济学的思想直到“边际革命”出现后才得到应有的重视。19 世纪 70 年代，西方经济思想领域出现了“边际革命”，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杰文斯、瑞士的瓦尔拉斯和奥地利的门格尔。“边际革命”强化了“经济人”的理念，它的基本规律是边际效用递减律。“边际革命”以后，边际分析方法广泛地应用于消费、生产、投资等市场经济规律研究。边际分析的基本数学含义是指自身变量发生微小变化时，引起的因变量变化的变化率。在经济学概念的分析中运用最多的是简单的一阶导数。以一阶导数为基础，许多相关的两个经济学变量的变化趋势都可以用二元函数图形作形象的描述，对于理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有一定的帮助。边际分析的延伸孕育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数量经济模型，如消费函数模型、生产函数模型、货币需求函数模型、投资函数模型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已趋于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从而使经济学这座理论

^① 参见蔡志明：《经济学中的实验方法与技术——兼论实验经济学的发展》，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3）。

大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计量经济学的崛起。“计量经济学”一词是挪威经济学家拉格·弗里希于20世纪20年代创造的。后来，库普曼、克莱因、迪鲁布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提出最早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而在“微观”经济研究方面的开创者是贝克尔，他将经济计量原则首次引入原来无法以数学来计量的领域，如爱情、利他主义、慈善和宗教虔诚等，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二，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大规模的应用。计量经济学之所以在20世纪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有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统计学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例如，弗里德曼的《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就是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他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了货币实际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了其货币数量学说。第三，博弈论的引进。博弈论从本质上说是用数学方式表述的，博弈的数学研究在20世纪才开始。较早在数学中研究博弈论的是泽墨罗、波依尔等数学家。将博弈论研究的数学成果系统引入经济学，是冯·诺伊曼和摩根斯特恩的贡献。此后，纳什明确提出了“纳什均衡”这一基本概念，阐明了博弈论与经济均衡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奠定了“非合作博弈”的理论基础。后来的研究者，如泽尔滕、豪尔绍尼等，都围绕“纳什均衡”展开了博弈论的精致化研究，他们三人获得了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20世纪80年代，博弈论迅速成为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它几乎吞没了整个微观经济学。

为什么经济学研究的手段能够从单纯的自然语言的理论描述过渡到数学语言结构的理论描述？这是因为经济学与数学之间有天然的联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与人之间通过“物的交换”而形成的关系，“物的交换”是有量化规则的；经济学基本范畴如需求、供给、价格等是量化的概念；经济学所揭示的规律性往往需要数量的说明。

特别是，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理性经济人”。由于经济人在行为上是理性的，经济人能够根据自己的市场处境判断自身利益，且在若干不同的选择场合时，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的那一种。所以，数学中所有关于求极值和最优化的理论，都适用于分析各种各样的最优经济效果问题；而很多求极值的数学理论和概念，也只能在最优经济效果问题中找到原型。总之，经济学应用数学有客观的基础。从1969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有半数以上的得主都与计量经济学的成果有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经济学的量化分析方法的重要性。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数学化是促进经济学科学化的一個有效途径。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学要想成为科学的理论，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可检验性、逻辑一致性和可积累性。而数学能够使经济学达到这些条件。如上所说，经济计量学能够根据经济理论建立模型，再将模型的结论同现实世界相比较，以此来决定理论是成立还是予以修改或者应当抛弃。由于数学具有逻辑的本质，所以，能够以逻辑为中介来论证经济学的数学化是可行的。这也可以说，数学能够显示逻辑的一致性。事实证明，数学的公理化方法能够提供多样的知识的有效积累方式。

然而，一般说来，美国主流经济学有比较明显的夸大数量分析作用的倾向。具体地表现在：在经济学学位论文的通过、学术论文的发表、学术会议论文的评价等方面都偏重于数学模型。国内一家最权威的经济学刊在多年前就表明了必须使经济学科学化（数学化）的立场，该刊近年来所发表的几乎所有文章多多少少都有数学模型，而且很快如果读者不具备高等数学的功夫，就无法读懂这些论文。国外的经济学家中曾流行着一句话“数字不会说谎，但说谎者在使用数字”，就目前中国的情况而言，数字也在说谎。西方许多经济学家对经济学滥用数学的现象进行了抨击。20世纪60年代被称为“奇怪的60年代”，因为对数学模型的崇拜现象广为流行，甚至出现了“没有理论的经济计量”和“与理论相矛盾的经济计量”趋势，“其中竟有按照特定的意识和愿望来编造经济理论和经济计量”。对此，里昂惕

夫很不以为然，在分析了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给美国《科学》杂志写了一封信，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①

这就是说，一些经济学家把数学当做经济分析的唯一手段，不顾条件地加以应用。这种应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应用。数学登堂入室，喧宾夺主，成了经济学的“主人”，成了经济学家头脑的“主人”，经济学家成了数学的“奴仆”。这种过分数学化的趋势，标志着经济学在逐渐脱离经济现象发生的政治、历史、文化、伦理等人文因素，也就标志着经济学在科学主义道路上走过了头。

所以，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始终正确地应用数学工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②

2.2.6 理论体系问题

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关系，在经济学中一直是争论不休的。实证经济学研究的是“是什么”，而规范经济学研究的是“为什么”。休谟认为，从“是什么”推不出“为什么”（这被人们称为休谟铡刀）。此后的经济学家都争论了这一问题，但都没有解决。这就说明了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这一构成是有问题的，这实际上反映了“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之间的争论。

对于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两部分构成之间的关系，也是争论不休的。甚至有的人（如张五常）根本就反对经济学有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分。通常所说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的争论乃至矛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方法上，微观经济学注重个体（或个量）分析方法，宏观经济学注重整体（或总量）分析方法。微观经济学一直以个量

^① 转引自朱绍文：《经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361页，376~37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② 参见郑秉文：《20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回眸》，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3）。

分析为基础，其核心内容是从“理性经济人”出发，来构建其理论体系。宏观经济学则采用了总量分析的方法分析了总供给、总需求、总生产、总收入、总消费、总投资、总储蓄、总就业等一系列总量。个量分析和总量分析对立的实质就在于：是从个人、个体出发去说明经济现象，还是从社会的整体即社会制度、组织、群体等出发去说明、解释经济社会现象？哪一种是更带有根本性质的说明？这实际上是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中难以解决的“困境”之一。一方面，个量分析对于解决具有复杂联系的、不可分割的经济系统时显得力不从心。“阿罗定理”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总和不一定与社会福利相一致。可见，要跨越个人与“社会”、“集体”之间的桥是不容易的。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掉入“合成推理谬误”（由于某一原因对个体来说是对的，便据此认为对整体来说也是对的）的深渊。新古典经济学家企图通过将个人效用加总计算即为社会效益的办法来过桥，最终还是掉下桥来。由于整体不等于局部的简单相加，而“经济人”假设使每一个个体具有同质特征，因此，在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内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人”行为悖论（个体“经济人”的最大化行为在集体行为中导致非最大化结果）、偏好系统悖论（反映个体“经济人”对不同商品进行效用排序和不同消费的偏好系统仅能推出同质性商品的效用排序和一致性消费行为）等难题。另一方面，整体方法也摆脱不了所谓“整体性悖论”：只有从整体出发，才能认识个体，也只有认识了个体，才能认识整体。整体确实不能归结为个体的总和，但是任何整体又不能脱离个体。经济现象如果脱离了个人的活动，那就会成为一种先验的、神秘的东西。

第二，在出发点上，微观经济学从确定性出发，宏观经济学从不确定性出发，从而显示了经济学内部的断裂。新古典经济学模型中一般均衡状态实现的基本前提，是假定各交易人对未来具有完全的预期。凯恩斯则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将自动趋向充分就业的均衡这一传统观念进行了批判，他首先否定的是完全预期的假定。他认为，市场上各交易当事人的行为，并不是根据完全信息和精密计算所做出的准确无误的决策，而是出于三个非理性的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

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这三大心理因素发挥作用的基础，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如果未来可以准确地预见，人们就无需为牺牲目前的消费而保留一部分可能根本用不着的收入以防不测；也不会让手头滞留大量的货币，而白白丧失利用它们盈利或享乐的机会；更不会对未来的资本收益做出过于乐观或过于悲观的估计。可以这样来理解，凯恩斯所说的这三大心理动机，实际上是人们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所做出的本能反应。虽然萨缪尔森等创立了新古典综合学派，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之间的沟通做出了一次综合，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依然没有彻底解决。^①

经济学理论体系之所以会出现上面所说的问题，原因之一就是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

2.2.7 预测问题

在经济学能否预言上，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大致可分为三种观点：第一，认为经济学完全可以与物理学一样，用来预测。法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莱说：“任何科学的基本条件是存在规则性，对于这些规则性，人们能够分析与预测。天体力学是这种情况，许多经济现象也是这样的。事实上，通过对它们进行彻底分析，其规则性得以展开。经济现象中的规则性与物理科学中的规则性一样明显。这就是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原因，也是该门科学基于物理学同样的普遍原则和方法。”^② 第二，认为经济学不能用来预测。希克斯认为：“科学，我认为，由一系列命题构成，这些命题有三个明显的特征：它们是关于我们观察的真实的事情，即关于现象的；它们是普遍性的命题，即关于现象的类的；它们是使预测得以可能的前提，这些预测控制着信念的程度。如果一些命题的结合体能够是科学的话，这三个特征都是必须的……[经济学]只是处在[科学]边缘，因

^① 参见杨立雄：《“个体主义”抑或“整体主义”》，载《经济学家》，2000（1）。

^② 转引自潘天群：《经济学何以预测》，载《经济学家》，2001（5）。

为它分析的经验是不可重复的。”^① 这就是说，希克斯认为，经济学所分析的经验材料是不可重复的，因而，建立在这些材料之上的理论不能用来预测。第三，反对经济学能够预测，但承认经济学是科学。自然科学与经济学之间存在着区别，但预测不是科学的本质。拉森认为，经济学事实上能够成为在任何其他科学（包括成功的自然科学）一样的意义上的科学。同时，成功的时间预测在经济学中不仅不可能得到，而且这既不是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科学的本质，事实上也不是经济学的社会背景所希望的。由此可见，第三种观点否认经济学精确预测的可能性。

经济学预测的“困难”在于：第一，经济学理论与经济现实之间存在难以消除的相互作用。对社会的预测关键是涉及人在预测中的作用。否则，如果历史按照固有的逻辑或规律前进，那么，人的自由意志体现在何处？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如何体现？即：如果说，无论人们做什么，历史将固定不变地发展，人的作用就不会体现，此时，人的责任与道德存在的价值在哪里？可见，人处于社会历史之中，却又要预测社会，这难免会给经济学预测带来困难。第二，由第一点可以得知，经济学理论是对经济世界的解释，却又影响经济世界，经济世界便发生自我调节，因而，经济学所预测的事件可能不会发生。这就像在量子力学中“我们既是观众，又是演员”，使得微观粒子的速度和位置不能同时预测一样。

由此，便可以知道有人所认为的经济学不能预测的理由了。这里，再强调两个人的观点：一是波普尔的观点。波普尔认为，预测社会发展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人类的发展受到不断增长的知识的影响，人们今天无法知道未来人们能知道什么。比如，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含有技术知识这一自变量，但我们怎么知道未来技术增长状况呢？我们无法知道预测技术的发展，我们也就无法确定性地预测某地区未来经济增长的状况。对未来，我们所能知道的只能是：技术发展快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快，技术发展慢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慢。

^① 转引自潘天群：《经济学何以预测》，载《经济学家》，2001（5）。

二是希克斯所强调的观点，即经济学涉及的是历史事件，历史事件是独特的不可重复的。对历史事件，人们只能理解而不能预测。经济学不是自然科学，如果是人文学科的话，它的特征就应当是“理解”，它的预测也就是不恰当的。

总之，经济学的预测和自然科学的预测有极大的不同，经济学的预测是相当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杨小凯认为，经济学预测只能对趋势做出预言，而不能像物理学那样做出准确的预测，但这并不能成为经济学不能作为科学存在的理由。^①

2.2.8 检验问题

对经济学的检验，集中表现在：是对其假设，还是预测（或预言）检验呢？如果是前者，那么，由于经济学假设的非现实性，所以，都有证据说明经济学假设的真实性或虚假性，检验的结果也就无法统一起来。如果是后者，那么，预测有经验事实（或观察证据），人们就认为，经济学的理论得到了证明，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实证原则”。但是，科学哲学的发展表明：“实证原则”是有局限性的。事实上，从个别的经验事实的真，进而推出经济学理论的真，借助的是归纳法，而归纳法具有或然性。在这里，再次提到弗里德曼的观点，即上面所说的F——扭曲。这就是说，弗里德曼强调经济学及其理论的有效性或正确性就在于预测的有效性或正确性，而不在于假设的真实性，即假设不相关。这更是引起了经济学界的激烈争论。

2.3

经济学的科学特质是单方面的

经济学的“科学困境”，说明了将经济学仅仅理解为科学是有问题的。经济学除了具有科学的特质，还具有人文的特质。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显示，还必须从人文层次来理解经济学。

^① 参见潘天群：《经济学何以预测》，载《经济学家》，2001（5）。

2.3.1 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

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早期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理性批判主义（波普尔证伪主义）、历史主义、科学实在论和反科学实在论、后现代科学哲学。

实证主义尤其逻辑实证主义以自然科学为唯一的、标准的文化模式，来改造人文学科尤其哲学。其实，实证主义的目标之一就是以自然科学为标准，来改造哲学，使哲学能够科学化，即使哲学成为“实证哲学”。从而，实证主义尤其是逻辑实证主义完全排斥了人文文化，认为人文文化与科学的客观性、严谨性水火不相容，人文文化被贬斥为主观的、世俗的东西，根本没有资格登上科学高雅、圣洁的殿堂。

事实上，实证主义自始至终也未建立起它所追求的科学的哲学这一目标，这就是说，实证主义的做法失败了。这说明，人文学科尤其哲学不可能完全科学化。其实，在逻辑实证主义内部，“拒绝人文文化”的观点也有所改变。菲利普·弗兰克是维也纳学派的元老，也是一位物理学家。他把科学哲学定义为科学和哲学之间的纽带，从而明确地提出必须把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联系起来。

自波普尔证伪主义开始，尤其历史主义之后的科学哲学发展表明，科学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和其他文化没有绝对的界限。这样，以科学作为唯一的、标准的文化模式，且以之来改造人文尤其哲学是错误的，这也表明了科学哲学已逐渐经历了文化的转向。

波普尔是从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过渡人物。他说：“我的著作是想强调科学的人性方面。科学是可以有错误的，因为我们是人，而人是会犯错误的。”“我们必须尊重个人以及由个人所创造的观念，即使这些观念错了。如果不去创造观念——新的甚至革命性的观念，我们就会永远一事无成。但是既然人们创造了并阐明了这种观念，我们就有责任批判地对待它们。”^①可见，波普尔将错误纳入科学哲学的

^① 《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转引自沈铭贤、王森洋主编：《科学哲学导论》，374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视野，认为错误不但必定会产生，而且人要从错误中学习，通过批判，才能排除错误、逼近真理。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和人性紧密相关的。显然，波普尔已从人性或人文角度来理解科学。

科学哲学自历史主义开始，更明显地显示出其文化转向。库恩的范式概念，并不是冷冰冰的纯知识、纯理论，而是包含着价值。库恩明确指出，范式是科学共同体共有的信念。这种信念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科学家的价值标准或价值体系。他甚至认为，科学是“以价值为基础的事业”，“不同创造性学科的特点，首先在于不同的共有价值集合”。^① 劳丹试图将价值纳入科学的内在结构体系之中。他认为，价值本来就内在于科学的结构，也只有使之纳入到科学的内在结构，才能更好地解释科学的合理性。他提出的科学的内在结构，也就是其所提出的网状模型，即方法、理论和价值（目标）在科学中相互协调、相互制约所形成的网状结构。劳丹认为，科学与价值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人们之所以重视科学，是因为科学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比如物质价值、精神价值等。另一方面，各种价值观念、价值导向也影响着科学的发展。比如说，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科学的发展。科学哲学必须面对科学与价值之间的相互作用，回避它，乃至排斥它，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削弱科学哲学的生命力。因此，历史主义学派把价值引入科学哲学，无疑是一大进步，也是科学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科学实在论是基于近代人类取得的科学成果，所建立的一种关于世界“实在性”的理论。它认为，只有科学所揭示的对象、过程、规律和实体，才是唯一真实存在的。可见，科学实在论和实证主义思想有相一致的地方。具体地说，科学实在论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第一，承认世界的客观性，坚持物质第一性，认识第二性。第二，坚持感性经验是人的认识的源泉和基础，没有经验内容或缺少理论概括的猜想或纯思都不是实在的。第三，主张真理符合论。第四，主张科

^① [美] 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326页、325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

学的精确性、普遍性、简单性、有效性和逻辑一致性，坚信科学是评价一切真假是非的标准。从中可以看出，科学实在论和实证主义一样，具有科学主义倾向，但是，由于科学实在论坚持“唯物主义”观点，而实证主义则拒斥“唯物主义”，所以，科学实在论较之于实证主义具有更宽广的文化倾向，即从唯物主义等所谓的“形而上学”角度来理解科学。

反科学实在论则更是体现了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值得一提的是，就目前情况所知，所有较为知名的反科学实在论者，既不是神学徒、宗教徒，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或主观唯心论者，而是地地道道的科学家或科学史家。可见，反科学实在论肯定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就其实质来说，“反科学实在论”反的不是世界本身究竟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而是科学所揭示出的世界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比如说，科学家所说的“1个水分子是由2个氢原子和1个氧原子构成的”，这在日常生活中却毫无“根据”。物理学中的“理想气体”、“刚体”等在物质世界皆不存在。因此，反科学实在论者认为，科学实在论只是一种理想的“人为中心论”，它完全否定了人的“心理作用和主观能动性”，这就是说，反科学实在论从人的主观能动性角度来理解科学。

在反科学实在论等以前的科学哲学和人文主义思潮等基础上，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这一思潮在科学哲学领域，则表现为后现代科学哲学。毋庸置疑，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是后现代主义与科学哲学相互结合的产物。无论是费耶阿本德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因素，还是罗蒂、法因、范弗拉森和利奥塔的后现代科学哲学，都存在着一些“家族相似”。这种“家族相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反对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基础主义认为，任何认识都有一个标准，且这个标准是确定不移的；任何认识都有一个“获得关于事物本质的真理”的目标存在。与此相反，后现代科学哲学把科学理论当作“话语”，由于“话语”因历史、语境而变化，所以，科学理论不可能超出语言之外，只能从某一实体那里，获得其意义。正因为如此，科学理论之间是不可通约的，科学理论也就没有一个终极

的基础。本质主义认为，事物有其固定的本质，认识有其固定的目标——获得关于事物本质的真理。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则认为，事物没有固定的本质，因而，“真理”根本就不存在。

第二，否认真理的存在，鼓吹认识论之死。这是由第一点引申出来的。德里达认为，文本就是一切，读者也只是从其习惯的世界中找到文本，而在文本中找到的也只是他自己。因而，他就否认了真理的存在。法因认为，类似于符合论、融贯论、民意论、实用论、指示论与相对主义的各种真理观，都是错误的。法因还认为，真理完全是由实在论者批发出来的，是由形而上学哲学家们虚构出来的。范弗拉森认为，真理概念所冒的风险太大，把真理置于人们的信念之上是不符合科学活动及其本质的。他主张用一个比较不具有冒险性或风险性较小的概念——理论的“经验适当性”概念来代替真理，即人们除了相信那些关于可观察的理论是适当的之外，其他方面统统括号起来。费耶阿本德认为，理论不分良与莠、好与坏、真与假，不管何种理论，都可以推动科学的发展。这样，费耶阿本德就完全否认了真理的存在，否认了认识论存在的必要性。

第三，摒弃形而上学（或哲学）。这也是由第一点引申出来的。众所周知，按照传统哲学的观点，哲学是以寻求真理为目标的，而寻求真理，就必须有确定的本体论与认识论。所以，对真理的否定，对认识论的否定，实际上也就是对传统哲学的否定。例如，罗蒂主张“超越科学哲学和科学认识论”，把哲学视为一种文学、一种对元叙事体方式的超越。

总之，西方科学哲学自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开始，经历了文化的转向。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转向”的完成标志着“文化的转向”的最终完现。这无疑显示，科学哲学可以架起科学与人文的“桥梁”。著名的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就将科学哲学看做是科学与人文联系的桥梁。他说：“科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不仅涉及科学是什么，或科学思想是如何发生的问题，而且也涉及科学思想与其他类型的思想——常识、文学艺术中的人性研究以及创造性的艺术家的思维的非常方式等——的关系。因此，科学哲学提供了两种文化之间的联系，力图以某

种首尾一贯的方式将它们彼此联系起来。”^①又说：“从哲学最美好最深刻的意义上说，对科学的人文学理解，就是对科学的哲学理解。”^②如上面所说的弗兰克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科学的哲学》一书中，已经注意到了人们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鸿沟的批评和忧虑，指出：科学哲学应该是沟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桥梁”。

2.3.2 作为科学经济学的人文转向

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科学和人文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仅仅从科学来理解经济学，而不从人文来理解经济学，这是有局限性的。从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来看，对经济学的理解更应该如此。经济学既具有科学特质，又具有人文特质。这就是说，如果从人文角度来理解，上面所说的经济学的“科学标准”所导致的问题——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价值（或客观性）问题、假定问题、实验问题、过度的数学化问题、理论体系问题、预测问题、检验问题就能得到解决。或者说，如果从科学与人文统一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经济学是研究物的，但更是研究人的学问。经济学的价值应建立在“主体间性”（即人与人相互联系性）基础上，其中，含有客观性。这就是说，经济学只要达到了“主体间性”，即被大多数人承认了，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有了“客观性”。显然，没有“主体间性”，就不会有“客观性”。^③假定是一种方法，没有假定，科学研究就无法进行。假定虽然具有一定程度的现实性，但毕竟和现实之间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将假定和现实

^① [美] M. W. 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范岱年等译，7页，北京，求实出版社，1987。

^② [美] M. W. 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范岱年等译，588页，北京，求实出版社，1987。

^③ 此外，能否引入实践？有人回答是肯定的。他们认为，为了既要引入价值，又要维护科学的客观性，必须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才能统一起来。实践作为主客体的中介，主体通向客体的桥梁，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

等同起来显然是不正确的，或者说对现实完全采取“科学”的态度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人们选择假定，一方面是因为科学研究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从其价值观出发的。科学研究总是有一定目的的，即假定总是与人们的价值观紧密相连的。所以，仅仅从科学层次来理解假定肯定是片面的。我们不仅要从科学层次来理解假定，而且要从价值或人文角度来理解假定。实验虽然是自然科学的最基本方法，但是，实验毕竟会受到人们头脑中理论的“价值”规范。即使是最低级的观察，也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一方面“观察渗透理论”。这就是说，观察必须有所理解，而理解就不可能没有理论或观点的指导。在不同理论或观点的指导下，对于同一观察事实，就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格式塔心理学的鸭兔图实验就说明了这一点。同一张鸭兔图，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事先暗示其为“兔”的观察者看它像兔，而被暗示其为“鸭”的观察者却把它理解成鸭。即使对同一个概念乃至理论，不同知识水平的人的理解也是不太一样的。比如，对于“水”概念，原始人的理解与现代人的理解肯定是有很大差异的，幼儿的理解与化学家的理解也肯定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对于同一个事物，在不同时间、地点等条件下所得的观察结果是不同的。比如，在不同光照、不同介质等条件下，对于同一事物的颜色、形状的观察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只有列尽相同具体条件的观察陈述才是确定的观察陈述。但是，条件是无限的，穷尽地列举具体条件是不可能的。条件的取舍，当然会涉及人们的价值观。由于实验远比观察复杂或高级，所以，实验不可能不受人们的价值观影响。这也可以说，仅从客观、科学的角度来理解实验肯定是错误的。科学确实离不开定量方法——数学，马克思的那句名言——“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至今仍然被人们广为引用。但是，定量分析毕竟是以定性分析为基础的，科学史往往就表明了这一点。例如，先有法拉第的电磁学理论，然后才有麦克斯韦的电磁学方程式。分析哲学总是想要将哲学数学化，最终依然没有完成。事实上，哲学由于其思辨性，而不可能数学化。恩格斯认为：“单靠数学演绎就确定一个论断为真理的事，这种情况几乎从来没有，或只是在

非常简单的运算中才有。”^① 列宁也指出：“数学公式本身什么也不能说明，它只能在过程的各个要素从理论上解释清楚以后对过程描绘说明。”^② 同样，经济学中真理成分的多少往往并不仅仅取决于使用数学公式的多少。马克思、熊彼特、凯恩斯、哈耶克、科斯等大师，很少在其作品中连篇累牍地使用数学模型，但谁也没有否认他们对经济学的贡献。今天，美国主流经济学权威杂志没有数学模型就不能通过编辑的形式审查，但迄今为止这些杂志上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凯恩斯的《通论》、科斯的《企业的性质》等相媲美的文章绝无仅有。是大师们不懂数学？不是。马克思把解数学方程作为休息的最好方式，熊彼特是国际计量经济学会首任会长，凯恩斯出版过概率统计的专著。他们的数学修养不逊于数学家，但是，他们认为数学仍然难以说明经济现象的本质。所以，仅用定量方法，而不用定性方法，肯定是片面的。预测在自然科学中非常重要，这往往涉及“一个理论是不是科学”这一重大问题。在自然科学中，如果一个理论所作出的预测得到了证实，人们就可以相信这一理论是科学的。但是，证实往往以实验或观察为基础，因而，预测最终又涉及人们头脑中的价值观。这样，经济学检验的是“假定还是预测”，也最终涉及到了价值观。

事实上，“证实”方法是有局限性的。“实证主义”的核心内容就在于其提出了“经验证实原则”，通俗地说，任何思想（或观念）只有局限于经验（或感觉）范围内，且为经验（或感觉）所证实时，才是科学的、有意义的。否则，任何思想（或观念）就是不科学的、无意义的，是应该被拒斥的。“实证主义”认为这一原则来自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实证”一词就是“肯定”、“明确”、“确实”的意思。所谓“证实”，实际上是指思想（或理论）被经验事实（或感觉事实，或实验证据）所证实。这在自然科学中确实是一重大原则，也是自然科学引以自豪的“客观性”（或“价值中立”）的优点所在，否则，自然科学便无“安身立命”之本，也无广大的信奉者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661~6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② 《列宁选集》，第4卷，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诚然，思想（或理论）和经验事实是相互联系的，尤其被人肯定的是，思想来自于经验事实，离开了经验事实，思想便不能为人所理解。这也是我们通常举例子说明理论观点、进行案例分析的道理所在。所以，“证实”思想来自常识、自然科学，它是有合理性的，“不能被最终推翻”。但是，证实“不能被最终推翻”是不是“证实”就没有问题呢？当然不是。“证实”思想的局限性，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共同的、客观的经验事实不易获得。原因之一，经验事实并非绝对可靠，可能有错觉和幻觉。比如，同样的一阵风，对健康人可能凉爽舒适，而对病人则寒冷难忍。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中，赖欣巴哈就曾论述了直接经验证实的不可靠性。他无可奈何地承认：仅凭直接经验，我们甚至无法区别现实和梦境。他写到：“当我们做梦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在做梦。只有以后醒来时，我们才能认清我们的梦是梦。那么我们怎能自称我们现在的经验是属于比梦中的经验更可靠的类型呢？”又写到：“我们现在在清醒中还是在梦中？这当然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确曾经验过一些梦境，在梦中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并得到我们是在清醒中的回答，后来才发现，我们错了，即是，我们还是在做梦。同样的事情会在现在发生吗？我们不能排除我们以后若干时候发现我们现在是在做梦的可能。我们感到很确定，这是不会发生的；但我们没有不会发生的绝对保证。”^①这虽然像是“呓语”，但毕竟道出了经验的不可靠性。原因之二，经验实际上是人的感觉，而感觉是具有主观性（或私人性）的。因为每个人所能感受的只是自己的感觉，而别人的感觉是无法感受的，所以，也就无法判断各个人对于同一事物的感觉内容是否相同。比如，对于同一朵花，我说它是红的，别人也说它是红的，但是，我感觉中的“红”和别人感觉中的“红”是完全相同的吗？更何况，正常人的视觉与色盲患者的视觉是不同的。可是，由谁来鉴别正常人与非正常人呢？由医生？可是医生自身是否正常也需要别人来鉴

^① [德] 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27页、204~20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

定。医生 A 需要医生 B 来鉴别，医生 B 又需要医生 C 来鉴别……这就走向了可怕的“递推”。原因之三：“观察渗透理论”。这在前面已经论述过。

第二，“证实”思想所依据的是“归纳法”，而归纳法具有或然性。由上面所说的“证实”内容可知，当某一理论（或思想）被经验事实所证实时，也就意味着从经验事实真推出理论为真。而经验事实具有个别性，理论具有一般性，所以，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归纳过程。由于归纳法的结论具有或然性，所以，归纳法所得的结论虽然具有创新性，也可能是错的。这就是说，归纳法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也是一些人反对归纳法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证实”思想所依据的是充分条件假言推理中“肯定后件式”，而此式是无效的。具体地说，假定思想或理论用“P”表示，由“理论”推出的结论用“Q”表示。然后，用经验事实证实了Q。进而，便认为，“P”得到了证实。用符号可表示如下： $(P \rightarrow Q) \wedge Q \rightarrow P$ 。然而，在逻辑学中，此式是无效的。在这里，举一例便可说明。现假定老虎必须呆在虎穴里，于是，我们便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就是说，“如果不入虎穴，就得不到虎子。”如果某人没有得到虎子，则，此人是不是一定“不入虎穴”呢？不一定，这是因为他很可能入虎穴了，但被老虎吃掉了。这一推理过程如下：

$$[(R \text{ 不入虎穴}) \rightarrow Q \text{ (焉得虎子)}] \wedge Q \text{ (得不到虎子)} \rightarrow P \text{ (不入虎穴)} \vee R \text{ (入虎穴)}$$

这里的“ \wedge ”读做“合取”，表示“并且”的意思，这里的“ \vee ”读做“析取”，表示“或者”的意思。显然，由于推理的结论不确定，即有可能是P，也有可能是 $\neg P$ ，所以，此推理是无效的。

从中也可以看出，“证实”方法是与人的价值观紧密相连的。

所以，不对经济学进行价值（或人文）层次的理解是错误的。经济学所存在的问题乃至危机，是主流经济学将经济学仅仅视为科学所必然遇到的。从早期的历史学派到新旧制度经济学派等，都对主流经济学进行了反思。例如，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希尔德布德早在

1848年就指出，主流经济学的缺陷就在于试图“从各国发展中某一时的事实里面，发现万世皆准的一般原则，而由此设立一种世界经济或人类经济。这种尝试完全与亚当·斯密时代的唯理主义相符合。他们的出发点认为，国民经济的一切定律，因为创立于与货物的关系，所以超出时间及空间的限制，而在一切变化不已的现象中仍然是正确的，因此他们不理解人类从社会动物的方面看起来，是文化的产儿和历史的产物。而他的需求、意见，对于货物的关系，对于人的关系，绝不能永远相同。这些都是按地理及历史而互异，且不断变化，并不断随人类的整个文化而改进”。^① 1981年由丹尼尔·贝尔和欧文·克里斯托尔主编的《经济理论的危机》一书则集中反映了现代各经济学学派对经济学危机的主要看法。12位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数字化倾向、一般均衡理论、理性假设、稳定偏好假设等进行了检讨，认为经济学危机的根源在于“它是与历史无关的和抽象地进行分析的……总的说来，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古典力学模型的基础上的并且是根据自然科学的设想发挥作用的……其结果是对于人类行为的基本上持一种机械论的观点”，因此，克服经济学危机的出路是“经济学理论必须回到时间（逻辑意义上）和历史（在经验事实意义上）”。^② 即经济学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主流经济学恰恰忽视了经济学的人文特质。

^① 转引自陶永谊：《旷日持久的论战——经济学方法论之争》，41页，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② [美]丹尼尔·贝尔、欧文·克里斯托尔：《经济理论的危机》，陈彪如等译，108~11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第 3 章 作为人文的经济学

经济学是关于人的行为的一门学问，它除了科学追求之外，还有人文的追求。西方经济学虽然有人文的追求倾向，但是，这一追求从属于科学的追求，且局限于功利的追求。所以，西方经济学仍然缺乏合理的人文追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有科学的追求，又有人文的追求，且强调通过科学实现人文追求，即人的解放、自由全面发展，这是对西方经济学的超越。当今，认为经济学具有人文特质的人虽然不多，但赞同的人正在逐渐增加。例如，厉以宁教授认为经济学“是人文科学，是以人的活动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①宋承先教授强调经济学“是研究满足人的欲望的行为的一门人事科学”。^②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同时是这两种文化（即人文与科学两种文化，笔者注）中的一部分……”^③

3.1

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反思

3.1.1 “稀缺规律”的自身矛盾

经济学家认为，相对于人的欲望而言，人力资源总是有限的，直

^① 厉以宁：《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② 宋承先：《过渡经济学与中国经济》，348页，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

^③ [美] P. A. 萨缪尔森等：《经济学》（上册），英文12版，高鸿业等译，6~7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接可用的自然资源也是不足的。经济资源存在的稀缺性，现代经济学认为通常有三种情况：

(1) 从资源结构来看，个别资源总是有限的，稀缺的。

(2) 即使从总体资源的存量上来看，总体资源也是稀缺的。

(3) 从自然资源的可直接与免费自由使用的角度来看，自然资源总是存在着少于人们可免费与直接自由取用这些东西的情况。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都是有限的，从而造成了商品和劳务供给的稀缺。

因此，人类只能把有限的人力与自然资源有选择地分配到相应的商品与劳务生产上，才能达到有限资源供给条件下最大生产可能性效用。

资源稀缺性前提，实际上存在着问题。

(1) 如果资源有限，那么发展又如何无限？

唯物辩证法认为，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是世界的总特征。如果资源有限，那么，依托于资源的人类经济又将如何无限地发展下去？发展是否真的有个“极限”？世界是否真的有个“末日”？

(2) 如果资源有限，人的欲望就不可能无限，而只可能有限，这就回到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清心寡欲”上来。

事实上，人们不承认发展极限论、人的欲望有限论，所以，单从逻辑学来看，资源是不可能有限的或稀缺的。

(3) 如果资源稀缺，那为什么“过剩”问题会成为一些国家或地区的首要矛盾？比如说，“富饶的贫困”现象。从古至今，都有端着金饭碗要饭的人类群体。我国秦晋时期的江南，气候温和，草繁物阜，到处是“果蔬羸蛤，食物常足”。可就是如此富饶的农业资源区域，在南朝之前却长期是火耕水耨，“以渔猎山伐为业”的经济落后区。现之云南，堪称植物、动物、矿物三大王国，然而却是个拥有几十个贫困县的经济落后者。西北地区的煤、油储量极丰，经济发展却远不及江浙。对这种富饶的贫困现象，经济学家曾给予了不同的解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源和生产力没有协同发展。这就是说，一定的资源如果不在一定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就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对象且发挥功能。看来，这仍是人的能力有限问题。

(4) 如果欲望无限，那么，资源又为何有限？

如果资源有限的话，那么人类总有一天会用完资源，而走向毁灭。即使人类节制其欲望，也仍然逃不出这一结局。所以，只有资源的无限，才能满足人类欲望的无限。

(5) 如果资源无限，那么今日世界又为何到处呈现出“稀缺”特征？

从自然资源、货币资源等物质资源，到人力资源都呈现出“稀缺”的特征。尤其是，生态污染、森林毁坏、环境恶化等更使资源的稀缺程度加重。这都反映了人类在利用资源、保护资源与促进经济发展之间举步维艰，也折射出了人的能力的有限。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似乎不仅回到了儒家的“中庸守常”的发展法则，而且给了发展极限论一个模棱两可的结论。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艰难，更是反映了人的能力的有限。

然而，科学早已说明了以下两点：

第一，宇宙资源是一个巨大的开放系统。人类居住的地球看似孤立无援，实则是一个开放性的资源系统，与其相联系的整个宇宙的资源潜力具有无限性。资源的无限性是人类所接受的宇宙资源系统的根本特征。

第二，潜在的自然资源具有无限性。

潜在的自然资源不仅意味着地球之外的宇宙资源是无限的，而且，由于地球是个开放系统，所以，地球上的资源也是无限的。单就能量来说，石油、煤、天然气等旧能源虽然有限，但是，当今人类对此使用的效率太低，浪费相当严重。比如，冬天以煤取暖，不用说直接损耗煤了，单从烟筒里散发出的黑烟和能量就不知浪费了多少。当然，更不用说暖气一路上不知因人为因素而浪费了多少。新能源如原子核能、太阳能、潮汐能、人体能等，当今人类利用得很少。海洋里有大量原子核能所必需的材料（如铀、重氢），但当今人类很难从海洋中大量地提取出来。海洋的潮汐能，至今人类利用甚少，人体能就不用说了。据报道，人体一昼夜所散发的能量可以把一定重量的水烧开。全世界有这么多人，可想而知当今人类所浪费的能量了。我们做

饭所散发的热气等无不表明人类因能力低下，而在浪费能量。所以，单就能量来说，地球能提供的实在是太多了，而人类确实因能力有限，有的利用不了，有的利用效率太低，甚至是浪费。这就是说，与其说地球能量资源有限，还不如说人类利用能量的能力实在有限。^①

总之，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人的欲望无限和资源稀缺矛盾进行反思后，不难得出结论，稀缺的不是自然资源，而是人力资源。

特别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或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发现，正在逐渐成为社会主导产业的知识产业或信息产业所生产和配置的资源不再是物质性的资源，而是知识或信息；这种资源是人类共享性质的，而不是排他性的；它在传播和消费中不但不像物质资源一样被消耗和效益递减，反而会在此过程中不断增值。这就是说，知识时代或信息时代的资源不再是“稀缺”的了，“稀缺”的是知识或信息的创造者，即人力资源的稀缺，或人的能力的稀缺。这正是为什么呼唤创新人才的原因，如不稀缺，何用呼唤？

3.1.2 人力资源稀缺是一切经济问题的总根源

由上，便可以再进一步对稀缺性作出总结和说明。

首先，虽然个量和直接可用的资源是有限的，但潜在的总量资源是无限的。所以，总量资源并不存在稀缺状况。这样，以个量资源的有限性来理解总量资源与潜在资源，笼统地以资源稀缺性作为经济学的一个理论前提是值得怀疑的。

其次，相对于人的欲望与需要而言，直接可用资源、个量资源以及由此所引致的商品与劳务的供给是有限的、稀缺的。这就是，无限欲望与有限直接可用资源之间的矛盾。但是，以往经济学在认识与确定这种有限性的“原因”，也即引起稀缺性矛盾的主要方面时，一般认为是自然界的资源存在状态，即认为森林、光温水土等资源条件的有限性是引起经济稀缺性的根本原因。而我则相反，认为，造成总量资源无限情况下的直接可用资源有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方面，

^① 参见陈惠雄：《人本经济学原理》，101～106页，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而非自然资源的“物”方面，即造成经济稀缺性的根本原因是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与人口增长超过了可直接使用自然资源的量界，而直接可用的人力资源的有限性则限制了人类对于直接可用资源的养护与潜在资源的识别、利用。简言之，人力资源稀缺才是稀缺问题的实质与根源。人类欲望无限性与人类自身能力有限性的矛盾，才是造成经济稀缺性的根本原因。

正是由于人类欲望的无限性和满足自身欲望的能力的有限性（包括控制人口增长与控制物欲能力的有限），才加剧了可免费和直接使用资源的稀缺状况，引起了无穷尽的经济难题。这就是说，人类认识、利用、改造与维护自然的能力不足，改善与控制人类自身行为的能力不足，才造成了经济稀缺性现象，进而产生了其他经济和社会问题。

总之，自然资源并不构成对人类欲望的绝对制约，其稀缺性矛盾的真正根源在于人类自身的有限能力与无限欲望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就成为了经济运行的内在动力。而有限的人力资源与无限的潜在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则成为人类不断提高自身的创造能力、实现无限欲望的条件。或者说，自然资源无限性的外部条件通过人的有限能力与无限欲望这对内在矛盾而起作用，推动着人类经济无休止地向前发展。可见，人类经济发展的矛盾根源在于人，而绝非在人之外。^①

比如说，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由于不平等的社会制度或国际秩序，一些人的稀缺状态往往是另一些人富裕的结果，落后国家的稀缺可能是发达国家富裕的结果。这就反映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矛盾的根源就在于人。所以，稀缺绝不只是人的需要与资源的关系问题，更主要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

3.1.3 解决资源稀缺的根本点在于人类自身

既然人类面对的经济难题根源在于人自身欲望与能力之间的矛盾，解决稀缺性矛盾的根本点也应放在人类自身上。这主要有以下

^① 参见陈惠雄：《人本经济学原理》，106～109页，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两点：

第一，要通过培养人、管理人、善待人、发展人，去解决人类面临的稀缺性问题，从而使人类获得尽可能多的满足。

要特别一提的是“发展人”。具体地说，人的发展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满足人的基本的合理需要；二是人的素质的提高；三是人的潜能和能力的发挥。而人的基本的合理需要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这可以用生活质量指标来衡量。人的素质提高包括人的健康素质、心理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现代人格。人的潜能和能力是指人们认识、理解、有意识地合理影响和规划现实世界变迁的能力和认识、理解、有意识地合理调整自身变迁的能力。这些能力又表现为思维的创造性和实践的创造性。

第二，要十分重视人类自身的关于财富欲望的调节。

在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征服自然与拜金主义思潮与日俱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曾谈到，由于商品与货币交换关系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出现了拜物教思想，进而使西方社会的崇物倾向变得异常风靡与严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经济学家们一直关注于 GNP 的增长，经济学几乎便成了以财富增长为唯一目标的学说。于是，人们不惜代价地将自然之物人为化，或对自然界无节制地进行索取。结果，出现了当今尖锐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以及严重的环境问题，既没有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物质财富，也背离了经济学的本意。在我看来，经济学的根本任务是研究如何通过发展人类自身能力及调节与引导人们的欲望，使之在尽可能地保持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来获得最大限度的需要满足。经济学如果不调节且引导人们的欲望，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就是灾难。可见，是重人还是崇物，其经济学出发点的含义是极不相同的。如果是重人轻物，则主要通过保物（保护自然）以善人的方法来满足人；如果是重物轻人，则主要通过向大自然无穷索取的方式来满足人。其实，物质财富增长的实质是将自然的东西人为化，如把泥土变为砖头、矿石冶为金银。这当然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然而，能否在保持自然资源不受损害或极少受损害的情况下，通过提高人类自身的能力和减少许多不合理的欲望去获

得真正的快乐满足，这是经济学研究成本最小化问题的一个真正切要的任务。^①

3.2

经济学的人学本质

3.2.1 “经济学是关于人的学说”的逻辑分析

经济学是关于人的学说，这主要有以下三个理由：

1. 人的欲望或需要是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欲望是因生物体感觉缺乏而要求得到满足的一种愿望，是生物体的内在的、直接的动力。任何生产活动如作物栽培、房屋建筑、矿产开采、音乐制作等都是因人类相应欲望或需要的存在而产生的。任何分配活动如资源、产品、劳务、利润在各个群体与各个人之间的分配，都是因满足人的需要及满足这些需要而必须处理好的相互关系而引发的。交换与消费也是如此，都是为了满足人类需要而展开的活动。所有由人类欲望引发的对各种物质对象的需要是经济活动发生的最直接、最根本原因。经济活动从哪里开始，经济学研究的起点也就在哪里。所以，经济学的起点应当是人，而不是物。

2. 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

“自然界从来不会主动地满足人，人只能自己满足自己”。在人与自然交往以获取物质资源的过程中，人始终处于经济活动的主体地位。深入考察各国的经济差异，其根源无不显示出了在人的（包括培训人、管理人、看待人、运用人等）诸方面的差异。

就人的欲望的无限性和满足人自身欲望的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来说，矛盾的主要方面仍在人而非物。这就是说，一方面引起稀缺性的主要原因在人，在人的欲望；另一方面解决稀缺性的手段也在人。所以，减少稀缺以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

^① 参见陈惠雄：《人本经济学原理》，109～110页，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人类自身的能力。

3. 人是经济活动的目的与归宿

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物、为了环境，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人本身，为了更好地满足人的欲望或需要。因此，经济学的目的就在于从根本上解决由人的欲望无限而能力有限的“稀缺性”矛盾引起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从而帮助人类在社会、经济、环境三者和谐发展中实现其目标。^①

3.2.2 “经济学是关于人的学说”的历史分析

从历史事实角度来看，“经济学是关于人的学说”至少有以下四个理由：

1.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转向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逐渐由人和物的关系转向人与人的利益关系。这主要体现在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

产权理论用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研究财产权利问题。它认为，市场上的交换并不只是物品之间的交换，物与物交换的实质是产权的交换，因而，产权理论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研究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矛盾、冲突，以及解决矛盾、冲突的规则。

企业理论可以看成是产权理论的一种应用，它主要回答以下两方面问题：一是企业的性质，为什么会有企业的存在？二是企业的监督、激励问题。企业是人们用各种要素（资本、劳动、经营管理才能等）所有者之间的长期契约来代替市场上大量的短期契约、用管理的权威来代替市场的议价，以降低交易成本而形成的一种经济组织。企业和市场的边界是：从理论上说，企业会扩大到这样一种规模，使得在企业内再组织一笔交易的费用等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费用。企业的基本问题是如何调动全体成员的积极性，使每个人都能最大限度地为企业的整体目标尽力。而调动全体

^① 参见陈惠雄：《人本经济学原理》，18~21页，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成员积极性的基本方法有两种：一是监督，二是奖励。如何分别应用这两种办法呢？企业理论的思路是：不仅要考虑谁的工作更重要，而且更要考虑的是谁的工作更难监督。对易于监督的工作，就可主要通过监督来调动积极性，如对生产线上的工人。而对那些难以监督的工作，则主要通过给予剩余索取权的办法来进行奖励，调动积极性，如对管理人员、销售人员等。这就是说，让在暗处工作的人去监督在明处工作的人，且对前者给予足够的奖励以保证其有监督的积极性。

制度变迁理论或新制度经济学是应用产权理论对制度和制度变迁进行实际的分析。它强调制度因素对人的行为、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的重大影响。特别是，它认为，制度是“内生”的，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服从程序和道德伦理规范，其目的是对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进行约束。在诺斯的研究中，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是说明长期中的制度变迁的三大基石。

博弈论认为，每个人的利益不仅取决于他本人的行为，而且要取决于其他人的行为，所以，它要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主体作为经济人，为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将会怎样选择？会造成怎样的结果？信息经济学是博弈论的一种应用，它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分析。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上的交易双方所掌握的信息量不等，一方掌握的信息多于另一方。

2.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潮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包括许多不同的学派和理论，如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学派、伦敦学派、德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产权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一般来说，当代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主要有四个阵营：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德国的弗莱堡大学、英国的伦敦大学和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它们的共同点是：强调以法治国、以德治国，强调政治自由与经济秩序。这里，只讨论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代表——当代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的经济伦理思想和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

思想。

哈耶克初期主要研究货币理论与经济周期问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他的兴趣转向政治哲学的研究，写了《科学的反革命》（1952）、《自由的宪章》（1960）、《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1967，1973，1979）等。20世纪70年代以来，哈耶克转向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在《法律、立法与自由》（1973）这部重要著作中，他主要是以社会学家、政治思想家和伦理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的面貌出现，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经济伦理思想。他的经济伦理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和道德标准是消费者主权决定生产者主权，而不是相反。二是在一个“理想社会”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人们有自由选择的机会，法治代替政府权力的滥用，理想代替社会道德的沦丧。三是经济自由是一切其他自由不可缺少的条件。自由选择的机会必须受到法律的保证。没有法治，自由是空洞的。所谓法治，就是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四是对于自由与道德的关系，他认为，道德只有在自由的环境里才会成长。只有在自由的行动受着强有力的道德引导时，自由社会才会良好地运行。五是对于民主与平均主义的关系，他认为，民主不是平均主义。所有的平均主义从本质上说都是不道德的。由上，哈耶克得出结论：一般来说，自由社会事实上不但是守法的社会，而且在现代一直是以救助病弱和受压迫者为目标的一切伟大的人道主义运动的发祥地。相反，不自由的社会无一例外地产生对法律的不敬，对苦难的冷漠，甚至是对恶人的同情。

芝加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是弗里德曼，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主要有：一是对经济自由的阐述，他认为，市场方法的基本要求是：只要交易双方是自愿的，且是不带欺骗性的，则他们双方都可以从中获利。这是一种自由的、私有企业交换的经济。他甚至认为，一切社会秩序的形成，包括语言、文化、社会习俗的产生，都是通过人们的自愿交换与合作发展起来的。二是关于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关系，他认为，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础和不可缺少的手段。三是关于政府的性质和作用，他认为，政府的性质在于它是可以行使自由、保护自

由的工具。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保护法律和秩序，保证私人契约的履行，扶植竞争市场。四是关于自由和平等的关系，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如人人生而平等、机会平等，这与自由是一致的。这实际上是把自由等于机会平等，反对促进结果平等的措施。他认为，生活是不公正的。有些人天生就具备一定的生理或智力上的优势，社会从他们那里获得好处。使结果均等的措施对天资差些的人是公平的，但对那些天资好的人就是不公平的了。

3. 发展经济学等的兴起

1848年所提出的“哈罗德—多马模型”被西方经济学家们认定为发展经济学诞生的标志。在一定程度上说，哈罗德—多马模型是将凯恩斯理论进行长期化、动态化分析的结果。它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储蓄率与资本产出率的变化。由于一个国家的资本产出率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所以，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储蓄率的高低。

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西方经济学界涌现出了像刘易斯、克拉克、罗斯托等一批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他们的发展经济学有三个明显的倾向：一是“资本积累”的倾向。即把资本积累看作是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而忽视了对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要素的考察。二是“重工轻农”的偏向。刘易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中同时存在着弱小的技术先进的工业与巨大的传统农业两个部门。农业因生产率低下，只能被动地适应工业的增长，且不断地向工业部门提供剩余劳动力，直至工业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完之后，才能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历程。三是“计划化”偏向。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经济学家对片面的“重工轻农”战略、“计划化”偏向等进行了检讨，重新肯定了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重视市场机制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中的作用，等等。

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世界环境大会上，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其含义是：“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已成为一种时尚。当今经济学所处理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每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出一条经

济、自然、人文协调发展的道路。除发展经济学外，还兴起了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发展文化学、发展战略学等。下面，重点对“发展”理论作一概述，我认为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发展已由单一的经济发展转向综合的社会发展。这就是说，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是集经济、科技、社会、政治和文化等社会活动一切方面的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这不仅因为，没有教育、文化、政治、社会诸方面与经济协调发展，社会将陷于无序和危机，而且，没有教育、文化、政治、社会诸方面的发展做坚实基础，根本就不会有真正的经济增长，根本就不会有真正的经济发展。二是发展已由以物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从人力资本与货币资本关系来看，强调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中心。从发展目标来看，物的发展只是社会的外在形式，是人的发展的手段和条件，而人才是发展的最终目的。三是发展从一时繁荣发展转向可持续的发展。四是从被动依附性发展转向开放促进内源性发展。发展中国家力图通过与发达国家的交往来实现现代化，但是，实际上，一些发展中国家除了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之外，国内、国际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生活结构都恶化了。于是，依附理论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交往中必然陷入依附性。它指出，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是造成不发达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不发达国家要想摆脱这种依附，就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建立自己新的经济结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约集一些学者开展了“内源性发展”研究，出版了一系列报告。其中，特别强调的是，各发展中国家应有自己发展的独特道路和自主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目的是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和自我发展能力，是增强民族的素质和提高人民的发展能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动力来自于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广泛参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应该是全面自主性的，包括经济的自主性、生活方式的自主性、价值的自主性、文化的自主性。五是发展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转化为全世界的发展。

此外，重点对发展的指标研究作一概述。20世纪6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们一般把人均GNP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志。

20世纪60年代初期，“福利增进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的观念已逐渐地被确立起来。福利指标体系包括人均医生数、蛋白消费量、人均钢消费量、各次产业的产值比例等。1967年，美国经济学家阿德尔曼和莫里斯提出了“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量”40个指标，这一指标体系试图以人们的物质生活、政治待遇与文化涵养诸方面发展来全面衡量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1977年，美国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莫里斯（Morris）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测度指标——“物质生活质量指数”。这包括预期寿命、识字率、婴儿死亡率三项指标。特别是阿马蒂亚·森最终把体现社会经济发展成败的指标确定在死亡率，即人类自身寿命这个单一指标的变化上，也就最终以人的发展来作为经济发展的最高尺度。人类自身寿命的变化是唯一可以确切地反映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自然环境总体发展水平的最高综合指标。

4. 知识经济学、休闲经济学、体验经济学等“后现代经济学”的兴起

伴随着后现代社会（或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来临，出现了与传统经济学不一样的“后现代经济学”，如知识经济学、休闲经济学、体验经济学等。依我看来，“后现代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关注人，尤其关注人的精神因素的作用和追求。

何谓知识经济？目前还没有一个全面的令人信服的定义。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为：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知识可分为四大形态：事实知识（Know - what）、原理知识（Know - why）、技能知识（Know - how）和人力知识（Know - who）。据估计，在OECD主要成员国中，占国内生产总值50%以上的行业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通常有以下几点：第一，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开发日益成为知识经济的重要基础。1993年，全部OECD成员国的工商业的科技研究开发经费有将近2/3用在高技术上。在制造业中的高技术行业，工资也高于平均工资水平。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那些对高技术的高风险投资小心翼翼的国家也把服务业研究经费的1/4或更多花在高

技术的研究开发上。第二，信息和通信技术在知识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在制造行业中，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等生产商的增长速度最快。在美国、加拿大、荷兰、爱尔兰、瑞典和英国，其增长速度都超过了10%。在信息和通信设备的部门与行业的投资中，金融、长途电信及零售业等服务行业占了巨大比例，这个数字在美国和英国高达75%以上。这些投资随着管理制度的改革促进了服务领域生产力的提高。第三，服务业在知识经济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在产业结构上表现为经济重心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换，特别是提供知识和信息服务将成为社会的主流，以至于“数字经济”、“网络经济”、“虚拟经济”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特点。美国华盛顿服务业联合主席鲍勃·瓦斯汀说，1996年，美国服务部门——从运输到零售及批发贸易、商业和专业服务、教育、医疗、信息和无数其他行业的产值，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4，它提供的就业岗位占总数的80%。令人惊异的是，美国经济1996年创造的260万个就业机会中，服务部门竟占了240万个（占92%）。在这样的经济趋势中，美国大学系统的实力被公认为巨大的经济优势之一。特别是，高新技术及其新型产业群的不断涌现，也带动着与其相关的服务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为社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第四，人力的素质和技能成为知识经济实现的先决条件。由于知识经济以知识为基础，因而，以最新知识武装起来的人力资源就成为决定性的生产要素。纵观经合组织国家，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人的技能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制造业新增加的大多数岗位都是需要高技能的白领阶层。高新产业更是对人力要素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总之，知识经济是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经合组织认为，传统经济学需要修改。比如，传统的生产函数注重的是劳动力、资金、原材料和能源，知识只是影响生产的外部因素，但在知识经济中应将知识直接包含于生产函数之中；根据新古典理论，边际收益是递减的，但在知识经济中，知识可以提高投资的回报，即收益是递增的。这就是说，知识经济学是和传统经济学有很大区别的，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它更重视人及其知识的作用。

休闲经济学“主要研究休闲行为中的投入与产出，休闲创造的产值，休闲经济的运行规律，休闲行为和经济的变量关系等”。休闲经济学作为当代新兴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是现实和理论的必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大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和人们的生活水平，人们的休闲时间和休闲需求在西方发达国家迅速增长，这就促进了休闲产业的产生与发展。到了20世纪70年代休闲产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在90年代已成为一些国家的主要产业。如果把“休闲产业”定义为“与人的休闲生活、休闲行为、休闲需求（物质的与精神的）密切相关的产业领域，特别是以旅游业、娱乐业、服务业和文化产业为龙头的经济形态和产业系统”^①，那么，在美国，休闲产业年产值达1万亿美元，年税收达6000亿美元，创造2500万个工作岗位，占全美国就业职位的1/4；在英国，休闲产业年产值达1360亿英镑，超过汽车业和食品业，并以30%左右的速度增长，创造1/5的全英就业职位，平均每户家庭休闲开支占家庭总支出的20%左右；在西班牙，休闲产业成为西班牙经济的第四大产业，休闲企业达9万多家，近5年来创造了76万个就业岗位，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等等。

在我国，尽管人均可支配收入远比西方发达国家低，人们能够用于休闲的支出还不多，以及人们传统的勤俭节约的观念，由人们的休闲需求而引发的休闲消费、休闲产业、休闲经济比起西方发达国家还远远落后，但是，自从1995年我国开始实行五天工作制，尤其是1999年国家颁布实施三个长假日（春节、五一节和国庆节）之后，由此所引发的休闲消费日趋明显。“休闲购物”、“休闲度假”、“假日经济”、“文化经济”、“旅游经济”、“休闲产业”、“休闲经济”等已成为人们的口头禅，成为推动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持续稳定与发展的实实在在的社会现象和经济浪潮。“休闲”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已广泛地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专家学者所关注。人们发现，休闲与经济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政府可以根据休假时间的长短，制定新的经济

^① 马惠娣：《21世纪与休闲经济、休闲产业、休闲文化》，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1）。

政策和促进不同方面的消费，调整新的产业结构，建立新的市场。同时，如果有经济头脑的人把消费与休闲、经济与休闲结合起来，就可能获得较大或更大的经济收入。总之，休闲经济学的兴起、发展，也表明了经济学应当更关注人的行为。

1999年约瑟夫·派思（B. Joseph Pine II）和詹姆斯·吉尔摩（James H. Gilmore）先生写了《体验经济》一书^①，指出：经济变迁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或产品经济）、服务经济和体验经济。如果整个社会都在寻求持续的经济繁荣，就必须展示体验，以便为经济增添足够的价值，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②

书中提到这样一个“体验的故事”：20世纪60年代，丽贝卡的妈妈过生日时，丽贝卡的外婆亲手烤制生日蛋糕，她购买价值10美分、20美分的蛋糕制作原料；20世纪80年代，丽贝卡过生日时，妈妈打电话给超市或当地的面包房订生日蛋糕，这种定制服务将花费10~20美元，而许多父母却认为定制蛋糕很便宜，毕竟这样做，他们可以集中精力于计划和举行画龙点睛的生日聚会；21世纪初，丽贝卡的女儿过生日时，丽贝卡会把整个聚会交给“迪斯尼俱乐部”公司来举办。在一个叫纽邦德的旧式农场，丽贝卡的女儿和她的14个小朋友一起体验了旧式的农家生活。他们用水洗刷牛的身体、放羊、喂鸡，自己制造苹果酒，还要背着干柴爬过小山，穿过树林。丽贝卡为此付给公司一张146美元的支票。丽贝卡女儿的生日祝辞上写着：“生日最美妙的东西并非物品”。“体验事实上是当一个人达到情绪、体力、智力甚至是精神的某一特定水平时，他意识中所产生的美好感觉。结果是没有哪两个人能够得到完全相同的体验经历，因为任何一种体验其实都是某个人本身心智状态与那些筹划事件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体验是使每个人以个性化的方式参与其中的事件”，虽

^① [美] B. 约瑟夫·派思、詹姆斯·H. 吉尔摩：《体验经济》，夏业良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② [美] B. 约瑟夫·派思、詹姆斯·H. 吉尔摩：《体验经济》，夏业良等译，5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然“当体验展示者的工作消失时，体验的价值却弥留延续”^①。

所以，体验经济在娱乐业“牛气冲天”。娱乐业的大本营——电影、录像带、流行音乐、主题乐园、广播、杂志、报纸、书、玩具等，都是大多数国家中成长最快的部门。吸引全世界上亿、甚至十几亿人和资金聚集在一起的是世界杯足球赛、是 NBA、是 F1 大赛、是奥运会和各国的各种职业比赛。体验经济不仅仅集中在娱乐业，而且还表现在制造业、商业界。“制造商必须将他们的商品体验化……例如，服装制造商能够关注穿的体验、洗涤的体验，甚至还可能有悬挂或者甩干的体验。”^②“一些产品充分利用它们的本质，给人以愉快的感觉，像玩具、棉花糖、录像带、CD 唱片、雪茄、酒类等等。恰到好处地使用这些产品可以创造出一种感官体验，企业可以通过突出任何一种产品的感官特征，使其容易被感知。”^③“可口可乐公司和百事可乐公司不断地努力，想要通过对方，试图使消费者相信喝自己的可乐会有更好的饮用体验。”^④“露天集市销售、拍卖会、跳蚤市场和类似的价值不固定的地方可以为商品买卖者创造出特殊的经历，尽管有些人不喜欢这种地方，但它们还是吸引了相当一批顾客。像 Aucnet, On Sale, Internet Shopping Network 和 Bay 这样的在线公司都已将这种历史悠久的商业模式移到了网上，虽然它们可能又在走产品销售规模化的老路，但至少它们的顾客从购买中获得了乐趣。”^⑤在旅游业，探险旅游也已成为时尚。曾发布世界各地许多地方度假指南的福德旅游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彼得·古特曼的《逃避现实者集锦簿》，为潜在的旅行者们描述了可以亲身尝试的 28 种历险方式：水上居住、水陆联运、山地骑车、骑牛、乘雪橇、远航、飓风追逐、峡谷漂流、护

① [美] B. 约瑟夫·派恩、詹姆斯·H. 吉尔摩：《体验经济》，夏业良等译，18～19 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② [美] B. 约瑟夫·派恩、詹姆斯·H. 吉尔摩：《体验经济》，夏业良等译，22 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③ [美] B. 约瑟夫·派恩、詹姆斯·H. 吉尔摩：《体验经济》，夏业良等译，24 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④ [美] B. 约瑟夫·派恩、詹姆斯·H. 吉尔摩：《体验经济》，夏业良等译，24 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⑤ [美] B. 约瑟夫·派恩、詹姆斯·H. 吉尔摩：《体验经济》，夏业良等译，26 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送车队、观察海豹、冰山旅行、捕捉海雀、驾驶赛车、热气球飞行、攀岩、探洞、乘筏冲浪、驾独木舟、弯道旅行、扎营远足、亲吻鲸鱼、美洲驼驮运、特技飞行表演、划旱船、重演历史战役、乘破冰船、极地耐寒和乘坐狗拉橇。这些中有的是旧的，有的是新的，但都是非常刺激的经历。^①

由于“农产品是可加工的，商品是有实体的，服务是无形的，而体验是难忘的”，^②所以，体验经济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向。经济学当然要研究它，这也表明了经济学要关注人、关注人的体验。

3.3

经济学的道德特质

3.3.1 西方经济学伦理道德观的发展

1. 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伦理道德观

市场经济制度是人类长期以来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其核心是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完善的行为规范准则。因此，西方经济学家在论述市场经济效率的同时，无不强调法律和道德对经济与社会秩序的巨大作用。总的说来，西方经济学伦理道德观经历了古典经济学伦理道德观、新古典经济学的伦理道德观、当代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伦理观。由于上面已论述当代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伦理观，所以，这里重点论述古典经济学伦理道德观、新古典经济学的伦理道德观。

古典经济学的伦理道德观集中体现在亚当·斯密的学说中。亚当·斯密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大师，而且是一位杰出的伦理学家。他先是于1759年写了《道德情操论》，后于1776年写了《国富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1776年《国富论》虽然出版了，但此后100年里，

^① [美] B. 约瑟夫·派恩、詹姆斯·H. 吉尔摩：《体验经济》，夏业良等译，22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② [美] B. 约瑟夫·派恩、詹姆斯·H. 吉尔摩：《体验经济》，夏业良等译，18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经济学仍然不是显学。在剑桥大学，直到1903年才设立了经济学和政治学荣誉学位，而此前经济学是作为历史和伦理科学荣誉学位考试的一部分来讲授的，大学里设置的经济学教授职位较少。为改变这种状况，马歇尔做了不懈的努力，J. N. 凯恩斯、西奇威克和福克斯韦尔都是马歇尔早年在剑桥大学的重要同盟者，他们一起为提高经济学的地位并肩奋斗。那个时代以及更早时期的经济学家顶的是历史学或伦理学教授的头衔，撰写一部著作如果不讨论历史问题，是要遭受非议的。亚当·斯密学识博大精深，伦理学和历史学什么都能谈，所以，不仅让学者们折服，也受政治家的尊敬。李嘉图在这方面则稍逊一筹，他主要在抽象概念之间演绎，因而受到广泛的攻击。对于这种状况，马歇尔和凯恩斯他们是难以容忍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亚当·斯密是从伦理学角度来论述经济学的，其《道德情操论》所假设的是“伦理的人”（或道德人、利他人），而《国富论》所假设的是“经济人”。他认为，富于同情心的人（即伦理的人），他的自利行为将促进社会的最大利益。这就是说，不存在所谓的“斯密问题”。

“斯密问题”简单地说，就是人性中“自利”与“同情心”之间的矛盾。由于“自利”假定表现在《国富论》中，“同情心”假定表现在《道德情操论》中，所以，人们通常认为，斯密留下了这两部伟大而又似乎矛盾的著作，《国富论》成了经济学的经典之作，《道德情操论》则成了伦理学方面的经典。

事实上，笔者认为，《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这两部著作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是，就其本质来说，都是一致的，这主要表现在：^①

第一，《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这两部著作交替创作、修订表明：这两部著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从1759年到1774年，《道德情操论》共出了四个不同的版本（第一版是1759年、第二版是1761年、第三版是1767年、第四版是1774年）。在对该书进行修改和1763年《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的基础上，亚

^① [英]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9~2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当·斯密酝酿创作了《国富论》。《国富论》于1776年问世。1778年，他又修订出版了《国富论》第二版。在《国富论》出版以后，斯密并没有停止对《道德情操论》的修改，1781年，出版了《道德情操论》的第五版。1784年和1786年分别出版了《国富论》第三版、第四版。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斯密又修改并出版了《道德情操论》的第六版。

第二，《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是斯密学术思想体系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按照苏格兰大学的学科分类法，两者都属于“道德哲学”这一门学科。当时的苏格兰“道德哲学”学科实际上包括了后来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斯密讲授这门课程的内容，就包括神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而政治学又包括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学。这就构成了斯密学术思想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斯密原计划要写出“道德哲学”这一门学科的全部内容。即使到了晚年，斯密也仍想实现“道德哲学”中的实用部分——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在1790年临终前几个月，斯密在为《道德情操论》第六版写的新增前言——《告读者》中写到：“在本书第一版的最后一段中，我曾说过，我将在另一本论著中努力说明法律和政治的一般原理……不仅涉及正义，而且涉及警察，国家岁入，军备，以及任何成为法律对象的东西。在《国富论》中，我已部分地履行了这一诺言，至少在警察、国家岁入和军备问题上。我长期以来所计划的关于法学理论的部分……虽然我年事已高，很难指望如愿以偿地完成这个大事业，但我并没有完全放弃这个计划……因而我把30多年前写的这段话未加改动地放在这里。”^①可见，斯密实际上把《国富论》看成是《道德情操论》思想的继续发挥。

第三，《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都是从人的利己本性出发的。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肯定了地主的利己动机。他说：富人只是从这大量的产品中选用了最贵和最中意的东西。他们的消费量比穷人少；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

^① [英]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① 在《国富论》中斯密又肯定了资本家的利己动机，他说：“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既以牟取利润为唯一目的，他自然总会努力使他用其资本所支持的产业的生产物能具有最大价值，换言之，能交换最大数量的货币或其他货物。”^② 其实，《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都论证了“经济人”的出发点。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写到：“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③ 他把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看作是“人生的伟大目标”。这种论述在《国富论》中发展成为表述自利行为动机的名言：“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④ 由此，斯密还探讨了人类沉湎于“对财富的追求”的原因。他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人性的本能迷恋发明、改良和革新。斯密认为，“经济人”天生就具有一种创造欲望和创新能力，他说，有的人对时间的准确性并不严格，而对手表计时的准确性却十分挑剔，这就论证了人天生就具有创造能力。“经济人”的这一“天性”驱使他展开经济活动，促使财富增加，进而，创造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写到：“天性很可能以这种方式来欺骗我们。正是这种蒙骗不断地唤起和保持人类勤劳的动机。正是这种蒙骗，最初促进人类耕种土地，建筑房屋，创立城市和国家，在所有的科学和艺术领域中有所发现、有所前进。这些科学和艺术，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使之更加丰富多彩；完全改变了世界面貌，使自然界的原始森林变成适宜于耕种的平原，把沉睡荒凉的

^① [英]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229～23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② [英]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2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③ [英]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101～10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④ [英]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1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海洋变成新的粮库，变成通达大陆上各个国家的行车大道。”^①第二个原因是“经济人”出于实现和维持其社会地位的需要。斯密认为，人需要同伴的同情，而同伴的同情更倾向于同情自己的快乐，而不是悲伤，所以，在旁观者面前，每个人都把夸耀财富、掩饰贫穷作为动机。“按照我们所说的人生的伟大目标，即改善我们的条件而谋求的利益”，就是“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斯密认为，人们肉体所需的必需品“最低级劳动者的工资就可以满足”，他们之所以拼命追求财富，是因为“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不过，虚荣总是建立在……相信自己是关心和赞同的对象的基础上”。^②斯密说：“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相反，穷人因为贫穷而感到羞辱……尽管这会产生一种约束力……然而，人们认为，这使大人物变成众人羡慕的客观对象，并补偿了因追求这种地位而必定要经历的种种辛苦、焦虑和对各种欲望的克制；为了取得它，宁可失去一切闲暇、舒适和无忧无虑的保证。”^③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把这种基于个人利益的利己称为“自爱”(Self—Love)。他认为，“自爱”是人类的一种美德，它决不能跟“自私”相混淆。他把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爱”看成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除了“自爱”动机外，人类行为的动机还有同情心、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倾向等。人们自爱的本性是与同情心相伴随的，但是，人们总是在自爱的引导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从而，妨碍同情心的充分发挥。在斯密生活的那个时代，“道德情操”这一短语，是用来说明人（被设想为在本能上是自私的动物）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能力，即能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所以，斯密竭力要说明的是，具有利己本性的个人

① [英]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22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② [英]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60~6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③ [英]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61~6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主要是指资本家)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为,从而,为建立一个有必要确立行为准则的社会而有规律地行动。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以他在《道德情操论》中的这些论述为前提的。可见,《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

第四,《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对“看不见的手”有统一的论述。“看不见的手”在这两部著作中各出现一次。在《道德情操论》中,他写到:富人“虽然……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①而在《国富论》中,斯密说到,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通常既不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己能在什么程度上促进这种利益,他所盘算的只是自己的利益,而“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②。显然,在《道德情操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是被用来说明这一问题的:对财富的获取欲本身如何实现促进人类福利这一更大的社会目的。而在《国富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是用来比喻说明竞争过程的有益后果的。可见,在《道德情操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所起的作用比在《国富论》中所起的作用更为基本。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古典经济学重视生产、供给和成本,新古

^① [英]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23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② [英]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2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典经济学则强调消费、需求和效用。如果说古典经济学家是生产论者，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和经济发展理论，那么，新古典经济学家则是交换论者，倡导边际效用价值论和经济均衡理论。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新古典经济学家继承了亚当·斯密的经济伦理观的基本思想，但是，赋予了其新的内容。其经济伦理观是以福利经济学这一经济学分支学科的面貌出现的。所谓福利经济学，就是从福利的观点对经济体系的运行进行评价的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本质上是规范经济学，它包含了价值判断的标准在内。这个价值判断的标准是：使福利增进的就是“好的”，使福利减少的就是“坏的”；对于经济体系的运行而言，能够增进福利的经济运行体系被认为是“好的”，导致福利减少的经济运行体系被认为是“坏的”。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提出了所谓“消费者剩余”的概念。“消费者剩余”就是一个人愿意支付的商品价格超过他实际支付的商品价格的差额，即“消费者剩余”表示消费者得到的额外的满足。他认为，只有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才能使人们得到的消费者剩余最多，才能使人们达到最好的幸福境界。

对经济体系的运行或经济福利的增进进行价值判断的另一个更为著名的标准是帕累托的“最优状态”。所谓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指，如果社会资源的配置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任何重新调整都不可能在不使其他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而使任何一个人的境况变好，那么，这种资源配置的状况就是最佳的，也就是最有效率的。帕累托效率的条件是：配置在每一种物品或劳务上的资源的社会边际成本等于其社会边际效率。由于在均衡状况下，交换双方得到最大的满足，而均衡状况又是以完全自由竞争为条件，因此，自由竞争符合社会利益，也是最具有道德的社会制度。

其实，新古典经济学所追求的福利标准与均衡趋向，是以功利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比如说，剑桥学派经济学家庇古的《福利经济学》（1920）一书的出版可以算是福利经济学建立的标志，其思想基础要追溯到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边沁认为，人们的理性活动是寻求快乐

和避免痛苦。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那就会实现公共利益，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此，边沁把道德归结为快乐和痛苦的计算，这就是所谓的“效用原则”。可见，“效用原则”实际上是功利性的道德观。功利是道德的最高准则。福利、幸福、效率等都是基于人的功利的根本动机的。到了詹姆斯·穆勒那里，边沁的功利主义便正式和政治经济学结合在一起。后来约翰·穆勒认为，凡是能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行为，就是正义的行为，但是，他没有发展出边际效用理论。

2. 阿马蒂亚·森的伦理经济学思想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研究“伦理经济学”的印度籍经济学家，现执教于英国剑桥大学的阿马蒂亚·森。阿马蒂亚·森对现代经济学进行了批判，这实际上代表着对现代经济学所进行的一场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即“经济学”需要“自利”这一普遍人性的假设，更需要加入伦理的内容，如道德意识、社会成就满足意识、同情心，尤其是自由和权利等本身所追求的价值目标。通俗地说，经济学重新将伦理学拉回到经济学的领域。

要特别一提的是，阿马蒂亚·森并不否认现代经济学对于“自利”假设之下人类行为特性的认识，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于经济生活的解释、描述和预测。他只是明确地反对将人的行为动机规定为唯一的“自利”动机，或者说，将人的历史道德伦理属性排除在经济学的视野之外。否则，他认为，在人类行为的“自利”唯一假设，且以最大化利益为目标的情况下，现代经济学就远离了“真正的人”，也就大大地缩小了它赖以生存的广阔土地，而越来越走向绝路。比如说，福利经济学就是如此。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理有两个：一是人类行为的自利假设，二是以效用为基础的社会成就评价准则。它确认人们必定以“自利”的行为来达到一种“效用”或“福利”的最大。当这种“效用”或“福利”达到不可改善的规模时，社会成就最大，社会的幸福程度达到顶点，经济学的解释由此而进入到了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由于没有伦理学的处理，所以，“帕累托最优在福利经济学中的神圣地位是与功利主义在传统福利经济学中

的神圣地位……密切地联系在一起”^①。“帕累托最优有时也被称为‘经济效率’。”^②帕累托最优实际上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最优。阿马蒂亚·森尖锐地指出：“帕累托最优指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当且仅当不减少其他人的效用就无法增加任何一个人的效用时，这种社会状态就称之为帕累托最优。如果不分享富人的奢侈荣华，穷人就无法快乐自在，那么，随着一些人的极度贫困和另一些人的极度奢侈，这种社会状态也可以被称之为帕累托最优。这样，帕累托最优可以像‘凯撒的精神’那样，‘从地狱到天堂’。”^③

诚然，主流经济学也讲自由、主观能动、权利等，但是，认为“自由仅仅只具有工具价值（因此，最终只计算成就）”，“假定每一个人的主观能动唯一地来源于他对自利的追求（因此，主观能动没有任何独立的作用）”^④，“在功利主义的传统中，这些权利（指自然禀赋、交换和契约等都会涉及到不同类型的权利）只是被当作获取其他东西的工具，尤其是当作获得效用的工具。也就是说，传统功利主义只是按照权利取得理想的结果的能力来判断权利，而没有赋予权利的满足以内在的重要性，因此，权利满足本身被忽视了”^⑤。由此，阿马蒂亚·森认为，主流经济学实际上已忽视自由、主观能动、权利等伦理内容。

阿马蒂亚·森认为，人的动机是多元的，自利并不是唯一的动机。“一旦自利动机这一束缚被解除，我们就可以看到以下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即一个人的主观能动不是——至少不完全是——由他或她个人的福利考虑来启动的”^⑥。因此，他认为，经济学“有两个中

① [印]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4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② [印]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3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③ [印]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35~3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④ [印]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6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⑤ [印]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5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⑥ [印]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4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心问题尤为根本：第一个是关于人类行为的动机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社会成就的判断”^①。他认为，“经济学问题本身就可能是极为重要的伦理学问题，包括苏格拉底的疑问：‘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②前一个问题又称为经济学中的逻辑和工程问题，“较为典型的假设是，人类的行为总是被看作是简单的和易于描述的”；接下来的任务只是寻求实现这些假设目标的最适手段”，对此的解决就形成了实证经济学。“在经济学的这一传统中还有许多更早期的贡献者。17世纪的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作为数字经济学的先驱，在其著作中，就有一个清晰的逻辑中心。这与配第对自然科学和机械科学的浓厚兴趣不无关系。”^③显然，这种经济学用的是“工程学”方法。“‘工程学’方法的特点是，只关心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德’或者‘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等这类问题。”^④对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就形成了规范经济学。阿马蒂亚·森认为，“虽然从表面上看经济学的研究仅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有直接的关系，但在更深的层次上，经济学的研究还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其他目标的追求有关，包括对更基本目标的评价和增进。‘挣钱是不得已而为之，财富显然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东西，只是因为它有或者因为别的什么理由’”。因此，“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⑤。虽然阿马蒂亚·森认为实证经济学可以对许多现实问题提供较好的理解和解释，也并不认为，没有伦理考虑的方法就必定使经济学失败”，但是，我想说明的是，经济学，正如它已经表现出的那样，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得更有说服力。我

① [印]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② [印]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③ [印]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④ [印]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10~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⑤ [印]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的目的并不是要列举经济学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正在进行的研究，而是要提出更高的要求^①。

总之，阿马蒂亚·森对现代或主流经济学进行了反思，一方面肯定了现代经济学的合理性——“自利”假设下对于最大化的追求，即“功利意识”；另一方面又指出了现代经济学的缺陷性，即缺乏伦理学的内容。从而，现代经济学越来越走向了绝路。所以，现代经济学要克服这一缺陷，就应当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就必须和伦理学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对许多现实问题提供较好的理解和解释。

由此，阿马蒂亚·森认为，人们通常误解了亚当·斯密，即“斯密问题”实际上在亚当·斯密身上是不存在的。他认为，亚当·斯密所提出的“自利”与“同情心”是一致的。亚当·斯密认为，即使“同情心”或“精明”（包括自制）超越了自利最大化，它也只是“最有利于个人的美德之一”，而“人道、公正、慷慨大方和热心公益是最有益于他人的品质”^②。斯密只不过“并没有满足于把经济拯救建立在某种单一的动机之上”^③，也“斥责某些‘哲学家们’试图把所有事情都简化为某种单一的美德”^④。通俗地说，亚当·斯密承认“自利”与“同情心”的存在，且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促进的，反对单一的“自利”与“同情心”的存在，“亚当·斯密在他的任何一部著作中都没有对自利的追求赋予一般意义上的优势”^⑤。

所以，经济学具有道德特质，经济学应该做到“利益与道德的统一”。没有道德，经济学就失去了方向，经济学就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经济学，只能给人类带来问题，乃至灾难。

^① [印]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1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② [印]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③ [印]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④ [印]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⑤ [印]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29~3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3.2 利他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虽然主流经济学一直以“经济人”作为一个基本假定，但是，人类行为的利他主义问题并没有消失在经济学家文献中。对于利他主义经济行为的这一事实，且不用说大量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对它关注，即使是主流经济学家也不同程度地关注它。但是，总的说来，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并未纳入“边际革命”以来正式的经济分析之中，即利他主义成为被经济学家长期忽视的问题。

然而，最近一个时期，经济学家对利他主义及其经济意义的兴趣得到复兴且日益增强。这种学术兴趣的复兴，就其广泛的学术背景而言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式的扩张，具体而言，可以说是起源于贝克尔（Becker）关于利他主义（特别是利他主义在家庭行为经济学中的关键性角色）的开拓性论文^①和社会生物学对利他主义的引人注目的分析。后两种构成了最近关于利他主义经济学分析文献的重要学术背景。特别是，《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等国际一流杂志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大量登载有关论文，直接推动了利他主义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

那么，为什么最近经济学家会突然地对利他主义问题给予了那么大的关注呢？这有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原因。从理论逻辑上看，诸如“囚徒困境”和“搭便车者”等问题表明了个人理性行为与集体的理性结果之间的冲突，这对经济学的基本教义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在实践上，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英美等国都出现了富人与穷人之间在收入与财富上不均等的差距加大的趋势。有的研究还指出，这种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并没有促进财富的创造。对如何解决这种问题的探讨，再次把经济学家的目光引向利他主义：自利模型虽然能够解释某些再分配活动，但肯定不能解释其中的所有活动。

^① Becker, Gray S, 'A Theory of Social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2 (6), December, 1974, pp. 1063 ~ 1093.

Becker, Gray S, 'Altruism, Egoism, and Genetic Fitness: Economics and Sociobiolog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4, September 1976, pp. 817 ~ 826.

所有这些因素，使经济学家不得不正视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大量利他主义行为这一事实。

通常，有以下两种利他主义：一是作为效用函数中的一种“偏好”的利他主义；二是作为“合作行为”的利他主义。前者认为，效用最大化不仅仅是个人福利，而且有其他人的福利，即效用是个人之间相互依存所形成的一个主观“偏好”，这样，就把利他主义纳入到个人的效用函数之中，这就是说，传统经济理论完全能容纳利他主义行为的分析。它特别关注的是关系紧密的团体中的利他主义。后者则超越了关系密切团体的范围，而特别关注人们之间的“合作行为”，这一点在囚徒博弈分析中最为典型。在“囚徒困境”博弈中，利他主义意味着采取“合作”的策略，而利己主义意味着采取“背叛”的策略。因此，利他主义便成为一种行为假设，而不是一种偏好假设。这一合作行为，便以这个人自己的理性选择，或者以基因遗传，或者以文化遗产来解释。比如，以互惠、声誉、社会赞许等解释“合作行为”是合理的。当然，通过所达成的在法律上有约束力的、可强制实施的协定，对自私的理性人来说，“合作”也可以是“理性的”。更一般地说，强制的规则，对个人的不合作行为施以相互约束，且通过集体对个人自私的利益给予激励，可以促进合作。所以，如果将合作描述为行为规范，那么，各种道德原则、规范也可成为“合作”行为的源泉。

虽然偏好不同于道德规范，偏好可以没有道德内容，但是，偏好毕竟会受到文化、价值规范等的影响，比如，父母的教育、引导和劝说，榜样的模式和团体的压力，就会对偏好的形成、改变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虽然把利他主义视为一种个人内在的偏好或是一种道德品质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如果利他主义排斥道德，则肯定是不对的。同样，如果把利他主义仅仅视为道德价值，那么，由于人们通常认为道德性质排斥成本和收益的任何权衡，所以，利他主义就不应该进入个人效用函数，个人主义的效用最大化模型就无法正式分析它。总之，道德与偏好交织在一起，理应都纳入到效用函数之中，利他主义也可纳入到正式的经济学之中。

事实上，在利他主义的机制上，通常有两种解释：一是生物遗传和文化继承之解释，二是社会行为互动之解释。

前者借鉴的是社会生物学。生物学家认为，在生物进化过程中，生物个体采取利己的行为，还是采取利他的行为，这完全取决于保存基因的需要。一般的行为原则是以少数基因的拷贝来换取整体基因的存在。特别是，血缘关系亲密的个体之间之所以会产生出强烈的互助互依和利他的行为倾向，是因为它们拥有共同的基因，对相同或相似的基因载体的拯救也就是对自己基因的拯救。社会生物学的主要创始人 E. O. 威尔逊认为，在人类社会，虽然利他主义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所决定的，但是，就其生物学的根源来说，与其他任何动物一样，人类的利他主义行为也是亲密选择的结果，是通过基因而得以演变和发展起来的。一般来说，人的利他主义行为的表现形式“说到底都含有自私的成分”。无条件的利他主义行为旨在为近亲效力，其强度和频率随着血缘和亲属关系的疏远急剧下降，从而，成为有条件的利他主义行为。经济学家西蒙认为，按照进化论的思路，一旦在分析模型中引入用以识别利他者和有区别地给予其奖赏的各种机制，则利他行为得到进化的潜在可能性会大大提高。例如，利用“亲缘选择机制”来说明家族中的利他主义行为，以“结构化同族群”选择机制来说明非血缘关系的人们之间的利他主义行为。Bergstrom 和 Start (1993) 证明，如果基因是进化的单位，那么，在进化确实选择利他主义——合作行为的条件下，利他主义合作者就可以很好地生存下去，这是因为“基因遗传和文化遗传是感觉迟钝的工具，一般地不会对孤立的个人发挥作用。那些继承了进行合作的基因（或文化）倾向的人，更可能比其他人享受到同胞合作的利益”^①，而且，一般来说，也更可能与具有同样倾向的其他人进行交往。

后者认为，人们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具有重视邻居或同事对自己的评价的一种偏好。这种评价构成个人的“社会价值”——尊严、社

^① Bergstrom, Theodore C. and Start, Oded, 'How Altruism Can Prevail in an Evolutionary Environ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3 (2), May 1993.

会地位等。虽然人的尊严、社会地位等是非商品价值，但也是个人效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想获得尊重、荣誉和社会地位等“产品”所给他带来的效用或满足，他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其他人对自己可能产生的反映，且根据自己的各种资源的“储备”情况，采取最有效率的行为方式，以实现之。即，在各种具体的约束条件下，利他主义行为是得到他希望的“受人尊重”程度的最有效行为。总之，从对利他主义机制的解释中，也可以看出，无论基因遗传和文化遗传的解释，还是社会行为互动的解释，无不含有道德因素。

虽然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过度的”利他主义是无效率的，比如，对于“你先走”问题，由于过分的彬彬有礼，每个人都坚持让对方先走，所以，无人走过一道门。这一问题最终只能由一个利己主义者的出现来解决。这可以说，没有利己主义，也就没有利他主义。但是，有些经济学家已经证明，在家庭经济、公共物品等领域中，某种利他主义是有效率的，是必不可少的。这表现在：

第一，一般来说，利他主义、自愿转移支付与家庭内部资源配置之间具有很强的良好关系。这一观点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由于利他主义者会使外部性内在化，内部有利他主义成员的家庭将会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二是利他主义会增加团体互动的利益。前者可用“宠儿定理”加以阐述。“宠儿定理”表明，只要户主是利他主义者，则，每个受益者，不论其如何自私，都会使家庭收入最大化，从而使他的行为对其他受益者的影响内在化。这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考虑自己的行为对其他人的影响的激励，仿效利他主义，以避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结局。后者可以换个角度给予说明，可以把利他主义行为看作是人们相互保险的一种形式。例如，户主关心其他成员的福利，可以为每一个人提供某种灾害保险。如果人们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关系，人们就会把相互合作中的受益看作是一种互助保险的形式。

第二，利他主义行为常常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有经验证据表明：出于利他主义的或无偏袒的动机的再分配，有一个稳定的数量从富人流向穷人；但由自私动机驱使的再分配，在数量上并不稳定，且

没有明显的直接影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关于献血、再分配等问题一般不运用“所有的人都是自私的”这一标准假设。

综上所述，利他主义经济学的兴起说明，自利模型肯定有其局限性，利他模型自有其合理性。可以说，自利和利他交织在一起，缺一不可。同时，利他主义经济学还表明，道德因素已渗透到经济学研究与分析之中。特别是，偏好肯定是与人的道德品质紧密相联的。这可以说，经济学不讲道德是不对的。^①

3.4

经济学的价值分析

前面所论述的经济学主要指的是西方经济学。通过对它的分析可知，西方经济学已具有科学和人文的特质，但它的人文追求仍然从属于科学和功利的追求，即西方经济学仍然缺乏合理的人文追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有科学的追求，又有人文的追求，且通过科学实现人文追求，即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这是对西方经济学的超越。

在此，有必要对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价值分析。

3.4.1 两个不同的研究对象

在经济思想史上，古典经济学家虽然没有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尤其是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在其取得科学成功的地方，他们事实上把生产看做是资本主义生产，并在一定程度上透过物与物的关系看到人与人的关系。古典经济学家的这一传统没有被他们的后继者所继承。19世纪7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完全背离了古典传统，开始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局限于资源配置问题。在这方面，杰文斯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杰文斯……把‘经济科学的列车开上了’资源分配的轨道。”^② 1932

^① 参见杨春学：《利他主义经济学的追求》，载《经济研究》，2001（4）。

^② [美]西德尼·温特劳布：《当代经济思想》，陈玮、张廷玉译，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年，罗宾斯在其《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第一次正式地把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规定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罗宾斯的论文不仅在发表之初“产生了一场真正的轰动”^①，而且对现代经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这篇论文发表以来，西方正统的经济学教科书大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申罗宾斯的这一定义。当然，也有不少经济学家先后从不同的角度对罗宾斯的经济学定义提出了质疑和批评。马克思便是其中的一员。他认为，经济学是关于生产关系的科学，资源配置方式从属于生产方式。从上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就已显示了这一观点及其正确性。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非不研究社会资源的配置，西方经济学也非完全不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这在上面已经论述过。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资源配置，而在于怎样研究资源配置，即以何种方法来研究资源问题。具体地说，两者有重要的区别：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研究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人。社会生产不仅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而且是特定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的生产。资源配置不仅有计划或市场方式，而且有公有或私有的方式。西方主流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资源配置，是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研究的假设前提，而重点研究人与物的关系。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源配置、经济运行的方式是和社会制度紧密联系的，且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往往缺乏这样的历史感。两者更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它们的价值判断理论的不同。

3.4.2 两种不同的价值判断理论

由前可知，在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上，企图将经济学变成一门像自然科学那样纯粹的科学的做法由来已久，西方主流经济学往往排斥价值判断，崇尚规范经济学，主张实证经济学。马克思曾对这种现象作了分析，认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为自然

^① [英] 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黎明星等译，9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的、永恒的前提是具有辩护性的，或者说是很强的价值判断性的。马克思认为，他们撇开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研究，而专门研究物的关系，以物的关系掩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经济学充满着拜物教气息。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社会伦理对经济的反作用，即不可避免地涉及价值判断。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中的“实证—规范”两分法是一个陷阱。价值判断的幽灵是无所不在的，经济学分析也就永远无法摆脱价值判断。不仅规范经济分析是由价值判断构成的，而且实证经济分析也存在着或隐或现的价值判断。例如，对一个客观经济现象或事实的描绘，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人会有不同的说法，这是不可避免的。

实际上，经济学的研究不能摆脱价值判断，对经济学价值判断问题的研究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中的迫切课题。而在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着终极性价值判断和现世性价值判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则分别是以这两种价值判断理论为基础的。所谓终极性价值判断，是指在物质资料生产中，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以制度安排对人存在的意义为标准的判别方法。它认为制度的变迁或替代是必然的。所谓现世性价值判断，是指以稀缺资源配置和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为核心，以“自然形成”的既定制度是永恒合理的作为标准的判别方法。它以理性和实用主义为基础。

1. 终极性价值判断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体上是以终极性价值判断为导向的理论体系，终极性价值判断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是：

(1) 从经济制度上说，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私有产权制度是充满矛盾的，是一种野蛮制度。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它的外壳不相容，所以它具有历史的暂时性，必定要被一个更美好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所取代。

(2) 从劳动价值论上说，马克思将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看作价值的实体。这体现了尊重劳动、崇尚劳动、反对剥削的精神。

(3) 从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看，马克思运用劳动二重性原理，剖析了生产过程的二重性，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剩余

价值论，揭示了工人受剥削的根源。在论述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时，预见资本主义制度将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趋势。

(4) 从对资本主义的流通过程和生产总过程的分析来看，由于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使得这个社会的流通和再生产过程充满矛盾，通过对总生产过程呈现出来的各种现象的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是极端不合理、不公平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社会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以判断工人阶级在这种不合理制度下生存的命运为标准，它采用的是一种具有终极关怀性质的终极性价值判断方法。

2. 现世性价值判断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西方经济学总体上是以现世性价值判断为基础的经济学，现世性价值判断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是：

(1) 西方经济学以资本主义制度是自然合理的制度为其理论前提。它是在这种最符合“人性”的既定制度下来开展经济学研究的。斯密认为经济学应以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原因和增长为对象，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是最适合促进物质财富增长的。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也基本遵循了这一传统。

(2) 西方经济学认为，完全竞争、一般均衡的市场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按照社会福利函数，经济效率是最大福利的必要条件，合理分配是最大福利的充分条件。但福利经济学往往抽象掉了制度因素，而否认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利益的直接矛盾。所谓帕累托改善，即没有人受到损害，却有部分人的利益得到提高。这与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相矛盾。

(3) 西方经济学中的价值理论实际上是一种价格理论。它否认价值实体客观性的存在，从主观的边际效用出发来描述价值，并以生产要素的报酬作为分配的依据，在既定的制度前提下构建价值论和分配论。

(4) 无论是主张自由放任，还是主张国家干预，西方经济学都谈论个人自由、平等和社会福利的增进。

(5) 主张国家干预的经济学家认为，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的任

务就是要通过政府来控制 and 调节一个国家的收入、就业和价格，把失业和通货膨胀控制在人们所能容忍的范围内，以使资本主义制度成为一个永恒和谐的经济社会制度。

从这里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与资本主义制度天然地联系在一起，认为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最能保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了私有制就有了一切。这样，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和制度存在对人的意义等问题就从西方经济学家的视野中消失了，即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当作一个既定的前提，且在这个前提下来研究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无论是哈耶克、奈特、布坎南还是弗里德曼，在谈论人的自由、平等和发展等问题时，只不过是在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永久合理性。而在使用终极价值判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这些具有很强的辩护性。资本主义制度不是永久合理的制度，而是具有历史的暂时性，是终究会被替代的制度。

3. 终极性价值判断和现世性价值判断的结合

终极性价值判断和现世性价值判断是从价值观角度来看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以终极性价值判断为导向的经济学，这是就其总体框架结构说的，或者说是从元经济学（或经济学哲学）的意义上说的，但这并不等于它在研究具体问题时就不使用现世性价值判断，更不等于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不研究具体的经济问题。使用现世性价值判断便于认识和实证各种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描述经济运行的状态。

同样，西方经济学是以现世性价值判断为基础的经济学，这不等于说它就不研究经济学中带有终极意义的问题，只是它将这一类问题限制在纯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围内。比如，西方经济学对于社会福利函数、“外部性”或环境问题的研究，始终坚持理性人、完全竞争等观点，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下研究社会福利的增长、分配，将外部性问题内在化等，它始终坚持经济学的领域或范围限制，将经济学与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和宗教学等分割开来。

从这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西方经济学坚持其范围限制，坚持以现世性价值判断为基础，才使其成为一门狭窄但相对精细的学问。而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一门意义更广的、更有发展前途的科学。随着人类经济发展面临各种困境，如全球资源濒临枯竭、环境污染、道德沦丧、强权政治和制度变迁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更具解释力和生命力。

所以，在经济学中，不采用现世性价值判断就不可能真正构建起经济学理论的大厦。与此同时，经济学还必须以终极性价值判断为导向，使其敞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而具人文精神。只有将这两种价值判断方法结合起来，才能使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①

3.4.3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超越

1. 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是人的解放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共产主义就是要实现这一点。

(1)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目标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的归宿。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自由个性的实现是人的发展的最高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及未来社会特征时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状态，这是马克思根据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与人的个性发展的内在联系得出的科学结论。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人的全面发展、自由发展、充分发展的有机统一。人的全面发展从广泛性而言主要是指：

^① 参见伍装、张薰华：《现代经济学中的两种价值判断理论》，载《经济学家》，1999（5）。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第一，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人的需要是人对一定客观事物需求的表现，是人的本性，是人的全部活动的内在动力。马克思把人的需要的丰富性、普遍性看成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认为“社会主义形态的前提是工人有较高的生活需要”。^①人的需要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呈现出一种自然上升的趋势。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人们的生产能力极低，社会产品极其匮乏，人的需要只能在一个极其低下的层次上得到满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发展，使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劳动日的缩短、闲暇时间的增多，使人的需要有可能向多方面发展。但真正的人的需要的多方面发展总要受到资产阶级和资本利益的压迫和限制，人们不但在经济上受剥削而且精神也极其贫乏、空虚。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条件下，剥削制度被消灭，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的需要将不断呈现出丰富性和多面性。人的需要除了物质外，更多的是在社会关系方面和精神生活方面，人在普遍的交往中将按自己的个性来谋得一切合理需要，从而形成人的全面发展所具备的需求结构。

第二，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能力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包括体力、智力，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能力、社会交往能力、道德修养能力和审美能力等。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人的能力将成为目的本身。针对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劳动者片面发展的状况，马克思特别强调要使人的体力和智力相结合地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逐渐减少，人们除了从事物质生产劳动外，还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从事科学、艺术和社会公共活动。人的劳动的全面性、社会关系的普遍性、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将必然促使人的能力向多方面发展。

第三，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人的个性，是个人的自我意识及由此形成的个人特有素质、品格、气质、性格、爱好、兴趣、特长、情感等的总和。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个性在各个方面获得的最大限度的发展，它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综合表现，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的最高象征。马克思认为，在人类最初的社会形态和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人对人和物的依赖关系，人的个性难以形成和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这种依赖关系被冲破后，人的个性才得以充分发展，整个社会将是具有各种个性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把人的个性叫做“自由个性”，并认为人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在劳动能力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有个性的个人”逐步代替“偶然的个人”的过程，即与社会关系相适应、对社会关系有自主性的个人逐步代替与社会关系不相适应、没有自主性、处于被奴役地位的个人。

第四，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对人的本质的认识直接决定着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规定。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人的能力发展离不开他的社会环境和社会交往，人的存在无不受到具体的社会关系的制约，人的发展无不现实地表现在具体的社会关系的变革之中。

人的社会关系的普遍性从广度而言，最初主要表现为物质交换关系，但它还很不丰富，不能算是充分发展的社会关系。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地域和民族的界限被突破，整个世界成为统一的市场，人们之间的交往更加广泛和丰富。人们只有在物质交换关系基础上进行政治、法律、道德、文化、情感等方面的交往，才能逐渐摆脱个体、地域和民族的狭隘性，不断开阔视野，充实、完善和发展自己，最终在交往中形成全面的社会关系和丰富的个性。

应该强调的是，人的发展不仅应当是全面的，而且应当是自由的。马克思称之为“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发展是指人自觉自愿地发展自己的才能，施展自己的力量。马克思非常强调人的自主的自由发展，如“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全部才能的自由发展”，“不受阻碍的发展”等。而一定历史阶段的人的片面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不自由的发展。这就是说，一个人在某些方面得到发展，往往并不是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天赋选择的，而是被外界所强加的，或者是由于外界压力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这种不自由的发展虽然也能使人在某方面的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往往使人感觉痛

苦，不能发挥出人的自由发展的内在动因。人的自由的发展首先是指从为生计而劳动中解放出来；其次是指从阶级剥削、阶级压迫中解放出来；再次是指从各种错误观念、偏见、成见中解放出来，使自己的才能、素质、兴趣、志愿、个性、特长、喜好等能够尽可能地充分发展。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和“自由个性”。

此外，人的全面发展、自由发展是和人的充分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的充分发展是从程度上讲人的发展。人的才能和能力的发展总有个程度问题，人总是向着更高的层次来发展自己。马克思多次讲道，“一切天赋得到充分发展”，“自由而充分的发展”，等等。当然，人的才能的充分发展是人的才能的各个方面的相互协调发展，既不是单一方面的发展，也不是某一方面的畸形发展。人的个体的全面发展，不是指个人的所有素质和潜力都得到发展，而是指人的全部才能的“自由发展”，是人作为主体的自觉、自主、自愿的发展，即每一个个体的人不应受到他人的和外力的强制，而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发展自己想要发展的素质和能力。^①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性、人的本质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和生产劳动的结果。根据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与人的个性发展的内在联系，马克思把人的发展概括为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三个大的历史阶段。

第一个历史阶段是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这一历史形态是同社会发展中的自然经济形态相适应的。在这个阶段中，个人没有独立性，直接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共同体。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只限于共同体内部，只是在孤立的地点和狭窄的范围内发生地方性联系。在这种原始的社会关系下，“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原始关系相矛盾的”^②。这是人的发展的第一个历史形态。

第二个历史阶段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这一历史形态是同社会发展中的商品经济形态相适应的。在这一阶段

^① 参见夏兴有、王玉周：《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载《人民日报》，2002-01-08。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中，人们摆脱了对血缘关系、土地关系的依赖，而具有个体的相对独立性，社会形成了普遍的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要求以及整体的能力的体系。由于社会关系以异己的物的关系的形式同个人相对立，人的发展依然受到社会关系的束缚和压抑。然而，它“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①。从而为更高历史阶段的到来创造着条件。这是人的发展的第二个历史形态。

第三个历史阶段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②的阶段，这一历史形态是同社会发展中的高度发达的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在这一阶段，社会关系已不再作为异己的力量支配人，而是置于人们共同的控制之下。人们将在丰富、全面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成为具有自由个性的人。这是人的发展的第三个历史形态。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最终目标，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需要充分的条件和多方面的途径。

第一，生产力高度发展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物质前提。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才能使人在摆脱贫困状态，并在基本满足生活需要的前提下追求精神层面的享受和自由个性的发展；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也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自由时间。马克思指出：“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③

第二，消灭私有制和旧式分工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私有制和旧式分工阻碍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即使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由于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为了谋求生活资料，被迫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出卖自己的劳动，丧失了全面发展的机会，造成了自我发展上的片面性、被动性。因此，只有消灭私有制和旧式分工，才能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使劳动成为真正自由的活动，实现劳动者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第三，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马克思指出，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的方法”，^①它能弥补不同的人先天的差异，甚至超越人的天赋。恩格斯也指出：“教育可使年轻人很快就能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它可使他们根据社会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就会使他们摆脱现在这种分工为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② 这里的教育指的是真正的全面教育，是克服旧的分工所造成的人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教育。

第四，重视精神产品的生产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精神产品是相对于物质产品而言的，是一切科学体系、精神成果和意识形态的总和，它包括哲学、宗教、政治、法律、道德、文学、艺术等。任何一个社会要想生存和发展，都必须进行精神产品的生产。精神产品的生产可以强化人的主体意识，满足人们的精神和文化需求，使人逐渐形成对自身区别于他物的性质、地位、作用、价值的自觉；也增强了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主体能力，从而促进物质生产，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必要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第五，扬弃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对立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条件。劳动时间是人类维持和再生产自身的生命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时间。自由时间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可以用于从事科学、艺术、社会交往等非物质生产活动的时间。以剩余劳动为基础的自由时间的出现，对于人类自由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有了自由时间，才有了人类能力的全面发展，也才有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共产主义社会对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对立的扬弃的直接表现，就是实现劳动的普遍化，即劳动在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中得以进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一切社会成员的可供支配的时间都包括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两部分。每个人不仅能够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物质生产，而且有享有自由时间并运用时间全面发展自己的能力，从而达到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统一。

走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既是人类所向往的伟大历史目标，又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重大转折点，却不是这一过程的完成。要完成这一过程，还必须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社会关系进行全面的改造，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建设全面的和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向着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伟大目标进军。

（2）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

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是无时间先后的同一历史过程。究其本质和历史发展而言，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是一致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强调的侧面不同而已。在剥削阶级存在的历史条件下，应强调无产阶级的解放，并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来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在剥削阶级消灭的历史条件下，应强调全人类的解放。无论何时，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都应当把全人类的解放视为自己奋斗的崇高目标和最终目的。

在对共产主义的描述中，恩格斯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了人类彻底解放。一是人们将从自然界动物式的生存条件中最终解放出来，完全获得人的生存条件，成为自然界真正自觉的主人；二是人们将从社会关系中的剥削、压迫、统治中解放出来，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三是人们在行动上从各种盲目的必然性中解放出来，成为自己支配自己本身的主人。恩格斯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

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①

人类从自然界、社会、自身中获得解放，是互为条件、互相制约、互相渗透的。具体表现在：

第一，人类从自然界中获得解放，是人类从社会、自身中获得解放的基本物质条件。人类从自然界中获得解放，是指人类成为自然界的主人。这就是说，当人类从根本上认识自然界发展规律的时候，人类就会按照其自身的意愿去开发和利用自然界，使生产力得到高度的发展。此时，人类就有足够的力量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支配和控制自然界，结束以往对自然界的盲目掠夺，有计划地使社会财富充分涌流，满足全人类日益丰富的物质、文化需要。也只有到此时，人类才能最终消灭因生活资料的缺乏而发生的动物式的生存斗争，才能消灭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而带来的经济剥削和压迫；也只有到此时，人类才能卸去繁重的劳动负担，大大缩短劳动时间，消灭阶级以及奴隶般的社会分工，保证人们的体力和智力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使人们真正成为支配自己行为的主人，从自身中最终获得解放。

第二，人类从社会中获得解放，是人类从自然界、自身中获得解放的重要社会条件。人类从社会中获得解放，是指人类成为社会关系的主人。生产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当生产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和支配关系由私人性变为社会性之后，人们才能够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一切生产活动的组织和安排、一切生活的协调和处理都将在最合理、最自觉的条件下进行。此时，人们才自觉地根据人类共同发展的需要去安排人与自然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633～6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之间的物质交换，安排生产力的合理发展。人类也就能避免由于私人之间的生存竞争造成的对自然界的动物式掠夺，积极防止自然界的必然性对人类的报复；同时，又能避免由于社会关系的狭隘性给改造自然界带来的种种限制，使自然界得到全面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正如马克思所说：“要使社会的新生产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工人也同机器本身一样，是现代的产物。”^① 同样，当人们能够自觉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时，人们才能够根据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必然性来自觉地支配自己、改造自己、发展自己，从而自主、自觉、自由地生活，使自己真正成为支配自己的主人，从自身中获得解放。

第三，人类从自身中获得解放，是人类从自然界、社会中获得解放的根本主体条件。人类从自身中获得解放，是指人类成为自己的主人。无论人类从自然界还是从社会中获得解放，都是人类的实践活动。也只有每个实践主体在实践中真正确立起主人翁地位，主体才能最终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社会关系的主人。如果主体没有自我改造、自我完善的自觉能力，那么主体在实践中仍然不能成为自然界和社会的主人。因此，人类成为本身的主人，对于人们成为自然界和社会的主人有着强大的推动作用。

人类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获得彻底解放，是人类社会发展超越私有制阶段、克服私有制社会中劳动异化的必然趋势。

在私有制社会，人的产物，包括劳动产品、商品、国家、宗教、意识形态等，对人都发生着异化，摆脱人的控制而变成支配人、与人敌对的异己力量。在这种异化现象中，劳动的异化是一种根本性的异化。异化劳动，最初产生于人类的自发分工。在私有制逐步形成以后，异化劳动和私有制是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异化劳动强化着私有制，私有制又强化着异化劳动。在资本主义这个最后的、也是最发达的私有制社会里，异化劳动达到了顶峰。资本主义制度是雇佣劳动制度，雇佣劳动是典型的、充分发展了的异化劳动。马克思认为，异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化劳动表现为：第一，劳动产品的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者所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并不属于劳动者自己，反而成为一种同他对立的异己的独立力量。结果，劳动者创造的产品越多，他所受的剥削就越重；劳动者创造的商品越多，劳动力也就越成为廉价的商品；劳动者创造的物质财富越多，他自己也就越贫穷。第二，劳动本身即劳动活动的异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作为被雇佣者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他的劳动活动或劳动过程便不属于他自己，而成为属于别人的异己过程。劳动活动对于劳动者不是自觉的和自由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的、非自由自主的劳动。因此，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①。第三，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马克思认为人的真正本质在于劳动，在于劳动活动、实践活动这些物质的感性活动。人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证明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既然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剥夺了他所生产的对象，那么也就是剥夺了他的类的生活。第四，人与人的异化。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条件下，既然劳动者的劳动产品和劳动活动成为与自己相对立的异己力量，不受它们的创造者即劳动者支配，那么，它们就必然由另外的力量来支配。这样的支配力量既不属于人们虚构的、非现实的“神”，也不属于自然界，只能属于另外的一些人，即资本家。劳动者的活动给自己造成了不幸和痛苦，却给剥削者带来了享受和欢乐；劳动者所失去的一切，恰恰是资本家所占有的一切。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社会关系的异化，都通过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表现出来。所以，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这种经济事实的分析，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秘密，论证了扬弃私有财产同时也扬弃异化劳动的历史必然性。

资本主义一方面使异化劳动达到了极端，另一方面创造了克服异化劳动、消灭私有制的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高度发展、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提供了客观的物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1～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前提。它不仅准备好了克服奴役劳动的最重要条件——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而且锻炼了克服奴役劳动的中坚力量——无产阶级。体现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无产阶级，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力量。但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形成，只有经过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剥夺剥夺者，才能建立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总之，人的解放程度，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就意味着对所有束缚的一定的摆脱和克服，意味着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和一定程度的解放。原始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们过着共同劳动、共同享有劳动产品、平均分配的生活，人们似乎是自由的。但是，由于人们的生活条件极度低下，人们只能过着近于动物的生活，不可能成为支配自然和支配社会的主人。人类进入了文明的门槛，意味着人们逐步获得了较多的自由。但是“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①。由于两大对立阶级的存在，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处于受压迫和被剥削的悲惨境地，人类社会面临着首先解放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因此，无产阶级的解放之日，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之时，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就是“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②。全人类的解放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

（3）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最伟大的事业。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理想信念作为人们的世界观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从来都是一种能动地作用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巨大力量。各种社会形态的更替，固然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然而又都不是自发盲目的历史进程，而是当时先进阶级站在时代前列，顺应历史潮流，依靠人民群众能动地变革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使逻辑和历史不断统一的自然历史过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翻开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长卷，自从有阶级以来，古今中外许多仁人志士，为了寻找指引人类社会消除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航行灯塔，孜孜以求，锲而不舍。两千年前，我国古代思想家就憧憬“天下为公”的人类“大同”。五百年前，英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托马斯·莫尔怀着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残酷剥削的强烈愤慨，指出私有制是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和其他一切社会灾难的根源，提出了完全没有私有制的社会“乌托邦”。受历史和阶级局限，他们的社会理想蓝图只能是一种美好的空想。

直到一百五十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践，在批判地继承人类文明丰富思想遗产的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用全新的世界观考察了人类历史，特别是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程，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创立了共产主义学说，庄严宣告，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诞生，标志着人类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实现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上最壮丽的日出，共产主义因而成为人类最美好、最崇高的社会理想境界。实现共产主义因而成了进步人类的自觉追求，成了人类最伟大的事业。

广义的共产主义包括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和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是广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它涉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军事学、社会学、文化学、教育学、伦理学、人类学等各个学科创造的理论成果。其中最主要的是哲学、经济学和狭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三大组成部分，因为这是针对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这个主题最迫切需要作出理论说明的三门学科。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是同资本主义制度对立的，最理想、最进步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第一阶

段是社会主义。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专政必然被无产阶级专政所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被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而社会主义社会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思想、政治和文化的巨大进步，最后必然发展为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奋斗的最终目标。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运动是指通向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历史过程、一种社会实践运动，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实践。共产主义制度，必须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经过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后，经过长期努力，才能逐步建立起来。共产主义不仅要解放无产阶级，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无产阶级自身才能得到彻底解放。

从上述共产主义的含义中我们不难看出，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真善美统一的最高境界。第一，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是人类历史发展和资本主义内部矛盾运动的科学概括，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真”。马克思依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根本原则，阐明了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客观规律。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历史行程。马克思创立的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为无产阶级用革命手段剥夺剥夺者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二，共产主义将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符合人类需要的“善”。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因为：首先，共产主义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经济前提。这主要包括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其次，共产主义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精神前提。不能把个人的自由发展理解为离开社会的孤立活动，理解为离开社会发展的个人打算。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全社会的成员团结一致，每个人才能得到全面而充分的发展。再者，共产主义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活动方式。“生产劳动同智力和体力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

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① 共产主义教育是全面教育，包括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综合技术教育、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教育、美育教育、体育教育等。共产主义教育是与实践活动特别是生产劳动密切联系的教育，是在实际参加改造自然界和社会过程中的教育。第三，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是美好的社会制度，是符合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理想的“美”。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本身就体现了共产主义实践的合规律性、共产主义实践的合目的性、共产主义实践的合理理想性的三者的统一，即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是真善美的统一。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②。因而，共产主义才使人类在真正意义上进入自身的历史。共产主义乃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开端，共产主义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人类最伟大的事业。

2.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人的发展问题上对西方经济学的超越

第一，西方经济学虽然也强调人的自由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建立在旧式分工基础上的，以维护旧式分工为前提的。而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强调人的发展必须要打破旧式分工，建立新式分工，从而深刻地揭示和把握了未来。

第二，西方经济学更多地强调人的政治的自由，人应有天赋自由的权利，但对人的自由发展的内涵并没有下定义，特别是科学定义。而马克思通过长期对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说史的深入研究，通过对早期资本主义造成人的片面发展的研究，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即随着市场经济和科技飞速发展的需要，必然要求人能够适应不同的劳动需求。他们能把不同的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在交替变换的职能中使人的先天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的发展，从而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牢固地建立在政治基础上，也牢固地建立在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5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②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济基础上。这一理论也恰恰适用于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

第三，正如前面所说，西方经济学把人的自由发展作为手段，而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即人文追求从属于功利追求。而马克思主义正好相反，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自由竞争、追求效益乃至市场经济，只是手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目的。

第四，新旧古典学派包括预期学派、弗伦堡学派、哈耶克学派，虽然强调人的发展，但更多的是强调资本创造价值，按资本要素分配价值。这就是说，在价值创造中，人的才能、智慧、创造力，并不占有主要和重要的地位，占主要和重要地位的是资本、劳动、土地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在分配公式中，同样人的才能、智慧、创造力并不占有主要和重要位置，占主要和重要位置的是按资本要素分配。而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中，人的才能、智慧、创造力、复杂劳动占主要和重要的地位，同样在分配中也是如此。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既强调人的才能、智慧创造价值，又强调人的才能、智慧、创造力参与价值分配，且占有重要的特殊地位。这确实适合于当今所说的知识经济时代。

第五，凯恩斯经济学从克服财富分配不均、遏制乃至消灭资本坐收利息、消灭坐收利息阶级的伦理经济思想——价值观出发，反对古典学派自由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提出了以政府调节、财政调节为主，货币政策为辅，扩大政府对经济的作用和权力，大幅度地降低利率，增加税收，增加政府投资和政府对投资的干预，以创造需求、创造消费的一系列理论，阻碍了人的自由选择和发展，阻碍了经济自由。因而，只有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就导致了该理论的全面危机。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的人的全面发展的伦理经济价值标准，既坚持了人的自由选择、自由发展，又鲜明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是政府干预的经济学，而是自由选择的经济学，这确实是对凯恩斯经济学的一大超越。

总之，马克思主义始终把伦理经济的研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研究，作为其经济学的主要关注对象、目的。或者说，其经济学是以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归宿的。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超越西方经

济学、始终具有强大魅力的主要原因所在。^①

3.4.4 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类的商品生产经历了简单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阶段。在简单商品生产发展阶段，商品生产的发展是缓慢的、很不充分的，因而，它对人的个体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微弱的。直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出现，人类商品生产的历史才从此出现了一个新纪元，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分而迅速的发展，这对推动人的个体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是，根据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所实现的人的个体的发展，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②这就是说，人的个体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马克思认为，随着人的个体发展要达到具有全面的能力、多方面的需求和全面的关系的时候，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成了人的个体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于是，在资本主义所能达到的人的个体发展的高度上，一种新的历史形式——社会主义就诞生了。由于实际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在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时爆发，甚至也不是在资本主义十分发达的国家内爆发，相反，却是在一些资本主义不发达，甚至是在一些刚进入资本主义形态不久的国家内取得胜利的。所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人的个体发展的起点是低的，必须发展商品经济以促进人的个体发展。这是一条唯一的途径。这就是说，今天的社会主义面临着双重的任务：一是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二是要努力促进人的个体的发展。当然，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人的全面发展对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对商品生产的发展有巨大的反作用。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作了详尽的

^① 参见许崇正：《人的全面发展理论：马克思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超越》，载《经济学动态》，2001（12）。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论述，指出工人的全面发展对劳动（物质）生产力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且在一定的条件下，是物质生产力、商品生产进一步发展的决定因素。马克思说：“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生产发展本身要求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客观趋势。”^① 社会主义时期更是如此，马克思指出，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物质生产力的限制，取决于物质生产对于个人完整发展的关系”，^②“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是社会个人的发展”。^③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下“消灭旧的分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也不是只有损害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的一种要求。相反，它已经被大工业变为生产本身的条件”^④。

在简单商品生产下，商品交换时价格是以价值为基础的，因而商品是按照价值进行交换的，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但在发达商品经济下，情形却完全不同了。竞争和供求矛盾不属于简单商品经济，但却属于发达的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初期，商品的价格以价值为基础，也就是发展到了以市场价值为基础、围绕着市场价值上下波动的阶段。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机器大工业时代，商品价格发展到了以生产价格为基础的阶段，市场价格紧紧围绕着生产价格这个中心上下波动，马克思曾经指出：“市场价格围绕生产价格波动，这要比价格反映价值，需要有多得多的商品发展阶段。”^⑤ 价格主要有以下五项基本职能：传递信息、刺激生产者采用先进生产技术、调节生产和消费、刺激劳动者在不同职业间的合理流动和改进劳动态度、调节收入分配。其中，最基本的职能，是价格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价格调节收入分配，可以说是价格传递信息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价格传递信息，就是空话。如果价格调节收入分配职能不能发挥作用，那么价格刺激生产者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的职能也就不可能实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3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197~1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现。在发达的商品生产的社会里，价格之所以具有调节生产的职能，主要是因为在这背后，价格调节收入分配在起作用。价格是改变消费需求结构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而这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价格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劳动者要求合理流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原有的工资报酬有意见。价格刺激劳动者改进劳动态度，毫无疑问也与价格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密切相关。这是因为，如果价格不能调节收入分配，价格也就不可能刺激劳动者改进劳动态度。

当价格的最基本职能——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时，它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就能得到有效实现。价格调节收入分配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调节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企事业单位的收入分配，它主要是通过有效地调节资源分配和生产要素的合理有效配置而实现的。而在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调节、配置中，最主要的就是人力这一资源和生产要素。这就是说，这一切离不开人能否得到自由充分的全面发展。二是调节个人间的收入分配，它主要是通过劳动力的价格——工资来实现。通过工资在不同行业、部门、单位之间的差别与不断的涨落、变化，促进人们不断地改变工作岗位，变换工种，鼓励先进的、符合社会需要的行业、部门、工种；淘汰落后的社会不需要的部门、行业、工种，从而将不同的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人的潜能和创造性精神得到充分的挖掘。所以，价格调节收入分配这一价格的最基本职能是与人的全面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在社会主义时期，人要得到全面的发展，社会就必须充分、有效地使价格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反过来，人不能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价格这一基本职能就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两者处理不好的话，还有可能对社会和社会生产起严重的破坏作用。可见，衡量一个价格体系是否合理，应该是看它能否调节收入分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各尽所能是按劳分配的前提，而各尽所能的原意的主要内涵是人的自由充分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曾经指出，“工人们在自己的共产主义宣传中说，任何人的职责、使命、

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实现自己的一切意向，其中也包括思维的能力”。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指出，未来社会的人们将“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生产部门……这样一来，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地发挥他们各方面的才能，而同时各个不同的阶级也就必须消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更加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这就是说，“各尽所能”包含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设想社会主义阶段实行按劳分配时，首先就谈到按劳分配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必须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离开了自由人的联合体，也就谈不上按劳分配。根据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解释，“自由人的联合体”就是“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就包含了人的才能应得到自由充分全面发展的思想。所以，马克思将“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按劳分配的条件，也就包含有将人的自由充分全面发展作为按劳分配的前提。同时，按劳分配的目的和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说：“对于要把人的劳动力从它作为商品的地位解放出来的社会主义来说，极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劳动没有任何价值，也不可能有任何价值……从这种认识产生了进一步的认识：只要分配为纯粹经济的考虑所支配，它就将由生产的利益来调节，而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地全面发展、保持和运用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在这里，恩格斯认为，分配原则是受生产利益所调剂的。而对生产最有利的分配方式，是尽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的才能得到充分运用和全面发展。所以，恩格斯的这段话，实际上是指出了社会主义时期分配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的才能的全面充分的发展。

所谓消费，是人们在一定社会经济关系中，且借这种关系而进行的用消费资料满足自己生活需要的行为和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消费的社会条件建立在私有制及其阶级对抗的基础上，所以，人的消费，就异化为对抗性阶级的再生产过程，即奢侈消费资料是再生产出的资本家阶级的物质条件，必要消费资料是再生产出的劳动力商品

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的消费关系中，工人的消费只有在保证取得利润这一任务的限度内，才是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在此之外，消费问题对于资本主义就失去了意义。人及其需要就从视野中消失了。雇佣工人的消费并不是为了再生产人，而仅仅是为了再生产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劳动力商品的再生产，完全从属于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目的。”^①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是公有制，因而社会主义消费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表现在：

第一，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对资本的依附关系不复存在，因而，劳动者的消费不再以维持劳动者在生理上的最低限为界限，而是“扩大到一方面为社会现有的生产力（也就是工人的劳动作为现实的社会劳动所具有的社会生产力）所许可，另一方面为个性的充分发展所必要的消费的范围”^②。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者是生产的主体，也是生产资料的主人，这应排除人的异化。社会主义消费，不仅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而且，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再生产出全面发展的新人，逐步实现人的本质的全面复归，从而使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体在更高的质量上再生产出来。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③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财富，也在于“无限地发掘人类创造的天才，全面地发挥，也就是说发挥人类一切方面的能力”，不是“在某个特殊方面再生产人，而是生产完整的人”。^④

第二，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就使社会主义消费具有全面性的特点。从消费的层次来看，消费的全面性可以分为生存性消费、享受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恩格斯指出：“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要的资料，都将同等地、愈益充分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9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9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④ [德]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3分册，1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交给社会全体成员支配。”^① 生存性消费是消费的基础层次或最低层次，是人们最基本的消费。生存性消费是维持人们的生存，实现人类自身的生产——“生命”生产，以满足生存需要的消费，是一切社会形态下消费的共同特点。为了实现生存性消费，就必须生产出生存资料作为生存性消费的物质内容。但是，社会主义消费不能仅仅停留在满足人们生存消费这一最低层次上。社会主义消费的目标，是要造就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人的全面发展，客观上要求进行享受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享受性消费是指人们为了满足其家庭的需要、健康的需要、交际的需要、尊重和信任的需要、审美的需要，而进行的消费。发展性消费是指人们为了满足学习的需要、竞技的需要、探究的需要、创造的需要、劳动的需要（为社会谋利的需要、服务需要和贡献的需要）而进行的消费。这就是说，发展性消费，主要是指人们为增强其自身的思想文化素质、智力素质、体力素质，使自己的才能得到多方面发展和体现的消费。所以，社会要相应地生产出供人们接受教育、从事文化和科技学习、体育锻炼等发展性消费活动所需要的各种物质资料和设备。

虽然，人的消费能力的不断发展，必然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但是，人只有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消费能力才能得到提高，才能具备多方面的消费能力。这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也显示出了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所谓“消费能力”，是指人满足消费需要而进行消费活动的的能力。所谓“消费水平”，是指按人口平均消费生活资料和劳务的数量，它主要是从数量上表明消费者的物质的、文化的需要及其满足程度。显然，人的思想文化素质、智力素质、体力素质等如何，直接影响着消费。也只有在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显现出人的消费能力和水平的提高。^②

与消费较为密切的是闲暇。在此，有必要深入地探索一下闲暇的本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2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② 参见许崇正：《伦理经济学再论——经济选择与人的发展》，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马克思指出，“休闲”就是“非劳动时间”，“不被生产劳动所吸收的时间”。^① 它包括“个人受教育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问、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② 马克思又指出：“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的和外在的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讲，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而作为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世界——自由王国，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的。^③ 在这个自由的天地里，人们可以不再为谋生活资料而奔波操作，个人才在艺术、科学等方面获得发展。马克思说：“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④ 马克思还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⑤ 恩格斯认为，除了这句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格的话”，^⑥ 来描绘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内容、基本特征。

综上，闲暇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又是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内容、基本特征。所以，马克思认为，闲暇也是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内容、基本特征。马克思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⑦ 马克思还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会随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分册，2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9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18~2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1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5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①

马克思关于闲暇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学者的休闲理念。瑞典哲学家皮普尔说，休闲是一种精神状态，是一种为了使自己沉浸在“整个创造过程中的机会和能力”。美国学者凯利则说，休闲应被理解为一种“成为人”的过程。有的西方学者提出休闲的价值更在于衡量人类进行的标准和人类生存的真正目标的问题。^②

因此，我认为，休闲是实现人文精神的必要条件。没有休闲，就没有人文精神的实现和发展。

显然，只有生产力非常发达，才能缩短工作日，增加自由时间或闲暇，才能实现人文精神的追求。

总之，经济学具有人文的特质。西方经济学有人文的追求，但是，这从属于科学和功利的追求，即西方经济学缺乏合理的人文追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科学追求的基础上强调人文的追求，这无疑是对西方经济学的超越，可以对西方经济学起指导的作用。

3.5

经济学的境界

3.5.1 人生四大境界

如上所说，经济学归根到底是一门关于人的欲望如何得到满足并提供各种物质手段的学问。随着人类欲望满足程度的提高，经济学面临的问题也会发生变化。而人类的欲望及需要所达到的层次，又决定于人们的思想境界状态和对世界的觉悟程度。这些反过来都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影响经济运行、制度安排等。所以，有必要将人生境界问题引入到经济学之中，于是提出了经济学境界之说。

“人生境界说”是我国著名学者冯友兰先生人生哲学思想的核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② 参见陆彦明、马惠娣：《马克思闲暇思想初探》，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

心，也是他对中国哲学的重大贡献。所谓境界，并非指与心相对的外部客观世界，而是指由人对宇宙人生的了解而得到的宇宙人生的意义。他认为，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每个人的境界都是一个个体的境界，没有两个个体是完全相同的，所以，也没有两个人的境界是完全相同的，但可以忽其小异而取其大同。就大同方面看，人所可能有的境界可以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这四种境界有高低之分，是一个由低到高的动态发展过程。

自然境界的特征是：在此境界的人，其行为是顺才顺习的。所谓“顺才”，就是顺其生物本性，也即顺其自然本性。所谓“顺习”，就是顺应个人的习惯或社会的习俗。顺才而行，就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顺习而行，就是“照例行事”，人云亦云，人行而行。因此，在此境界中的人，对于其所行的事的性质并无清楚的了解，对于其所行的事的意义也无清楚的了解。这样的境界似乎是一个混沌。自然境界中的人，其心理状态正如古诗所云，“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识天工，安知帝力？”。“帝之则”既可以是自然法则，也可以是社会法则。自然境界中的人，虽然都遵循这些法则，但其遵循是不自觉的。他不但不了解这些法则，而且不觉有这些法则，即他对这些法则无觉解，所以说是“不识不知”。

但是，人终究不是动物，即使自然境界中的人，也不完全不识不知。他在凿井耕田时，了解凿井耕田是怎样一回事，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其是在凿井耕田。这就是他高于别的动物之所在。只不过，他所谓的了解，是不很清楚的。

功利境界的特征是：在此境界中的人，其对“自我”有了明确意识，其行为是为利的。所谓“为利”，是指为他自己的利。自然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有时也是为利的，只不过，其对于“自己”及“利”并无清楚的觉解，即其行为不是出于心灵的计划，而是出于本能的冲动。但是，功利境界中的人则是对于“自己”及“利”有了清楚的觉解，他的行为或者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财产，或者是为了发展自己的事业，或者是为了增进自己的荣誉。并且，他是自觉地为自己

求利益的。功利境界中的人主要关心自我之利，虽然其行为在客观上可以利他，但是其境界毕竟有限。

道德境界的特征是：在此境界的人，其行为是“行义”的。所谓“行义”，就是为社会谋利益。道德境界中的人，对于人之性已经有了觉解，他了解人之性蕴涵着社会之性，了解社会是个“全”，人是社会之“全”中的一部分。人不能离开社会，人不仅需在社会中才能存在，而且需在社会中才始得完全。社会的制度及其道德规范、政治规则并不是压迫个人的，相反，它们都是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中应有之义，人必须在它们之中才能发展自己之人之性、人之理。

天地境界的特征是：在此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事天”的。天地境界中的人，了解其有社会的“全”之外，还有宇宙的“全”，即人不但是社会的一部分，而且是宇宙的一部分。人不但对于社会应有所贡献，应在社会中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而且应在宇宙间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人的行为不仅与社会有关系，而且与宇宙有关系。他觉解人虽只有七尺之躯，但可以“与天地参”；虽上寿不过百年，但可以“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人类一旦到达此种境界，便超越了人己、内外、物我的区分，而将人与人、天人合而为一，最终使人道与天道走向统一。

四种境界与不同程度的觉解是紧密相联的。自然境界中的人对于宇宙人生没有觉解，对于外在事物和自己的行为也只有模糊的了解。功利境界中的人对自己的行为有清楚的觉解，但对人之性并非完全觉解。道德境界中的人不仅对于自己的行为有清楚的觉解，而且对于人之性已有觉解。天地境界中的人已有完全的觉解，不仅知性，而且知天。

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是自然的产物，自然的产物是人不必努力即可得到的，这就是说，一个人只要不呆不傻，随着年龄的增长便可以由自然境界进入功利境界。但是，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是精神的创造，精神的创造则必须经过人的努力才能获得，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经过“格物致知”、“反身而诚”的努力，才能进入道德境界和天

地境界。^①

3.5.2 不同人生境界中的经济学问题

根据人生境界说，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大致也可以分为四大类：人类在自然境界中的经济问题、人类在功利境界中的经济问题、人类在道德境界中的经济问题、人类在天地境界中的经济问题。

1. 人类在自然境界中的经济问题

自然境界是指人类处于自在而不自为、“由之而不知”的意识阶段。在经济发展阶段上，它相当于封建社会的短缺经济时期。而此时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大多也是和人类迫切面临的饥荒、赋税、劳役等一类与短缺经济相关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围田法令、均平思想、仓社制度，还有一系列的赋税、理财、分工思想等，大多是和人类的自然境界状况相一致的经济思想。由于历史上人类长期处于短缺经济的经济状态和混沌的自我意识状况，这便决定了近代以前的经济学者的研究意识和研究境界，主要局限于与短缺经济状态相联系的经济学问题的研究，即他们研究的主要是如何减轻饥荒、对付灾荒、增加赋税收入等诸如此类与短缺经济相关的问题，而不是主要研究如何“趋利”。

2. 人类在功利境界中的经济问题

功利（utility）抑或效用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在功利境界中，人从“自我”的立场出发，关心的是对于自我之利的追逐。追求个体行为的最大利益是处于这种境界中的人类行为的基本动因。古典经济学以来的各种西方经济学流派主要研究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的效用最大化问题，这便属于人类在功利境界中的经济学说，效用最大化也就成为功利经济学求解与面对的主要问题。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人类自主生产能力的增强，人类的自我与趋利意识也在增强，从而进入了以追逐自我之利为核心的功利境界的觉悟时期。自亚当·斯密以

^① 参见陈战国：《冯友兰哲学思想研究》，165～16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来的西方经济、文化体系，尽管看似变幻不绝，其实仍是主要在功利境界状态中来认识和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由于受功利境界的局限，这种经济学还没有到达对人的经济行为作价值判断与规范分析的觉悟与境界，而只是把人抽象为一个简单的价格要素，按照经济人行为本身的狭义客观性进行实证分析。这实际上就是略去了人类事实上还存在的、潜在的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而只是将人类行为定在单一的功利函数上来研究问题，而对群己关系、天人之际的大问题的研究却不成风气，对许多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的解释与解决显得软弱无力。

3. 人类在道德境界中的经济问题

道德境界是把利己与利人、个人快乐和最大多数人的幸福统一起来的人生境界。这又涉及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复杂的价值判断和经济伦理问题。道德境界范围内的经济学研究是把个人与社会这两个主题同时纳入了经济学研究之中，将人、由人组成的社会与在社会体包含之中作为基础的经济三者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并将规范方法与实证方法相结合。它不仅研究经济现象中的“是不是”的问题，而且讨论人类经济行为中的“该不该”的问题。它不仅研究“实际”存在的经济现象，更加注重对人类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本质——“真际”问题的研究。福利经济学、伦理经济学、合作经济学、利他主义经济学等在一定程度上就属于这一范围内的经济学说。与前一类经济学相比，两者有一个重要的差异，就是前者把自己的研究限定于以自我为核心的经济人，后者则是把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人的功利性和人的道德性相统一的“社会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前者的研究重物轻人，重利疏义；后者则以义利统一甚至是偏向重义轻利的社会之中的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主体，以达到一定国民收入水平下的社会效用最大化——把实现“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原则作为经济学的目标。

4. 人类在天地境界中的经济问题

道德境界之后的天地境界是将人置于天地之间，把天与人统一起来考虑经济和人类的未来问题的经济学，也是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它涉及“天人合一”问题。在这一境界中，人不仅是“自我”

的，也是社会的一员；人不仅是社会的，而且还是宇宙的一员。这是将人的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种境界相并合，顺天、利己、利人、事天相统一，是带有最多的实在性、实际性和整体统一性的经济学。它研究人类经济运行中最重要、最根本性、最全面性的问题。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人文经济学、佛教经济学等关于生态环境与人类关系的见解，以及“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并受到高度重视，便是属于对人类存在的更高境界思考的经济学思想。^①

3.5.3 走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功利困境

由上可知，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仍然局限于功利境界范围内的经济问题研究，其基本分析方法是实证分析方法特别是数学手段，这已经极大地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突破经济学研究的境界局限，事实上已经成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的真正关键。

随着社会经济进步，人类觉悟在提高，人类境界也在不断提高，这就必然会推动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起源于“家政”或“经邦济世”，这就是说，寻求生存之策是短缺经济条件下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比如说，赈灾、垦荒、均税、劳役、官办工商业就是如此。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与发展，短缺经济逐渐向过剩经济转化，因而，人类的“求存”欲望逐渐减弱。虽然如此，人类的“趋利”的重要性却日益显示了出来。于是，经济学转向了对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等微观利益最大化目标的研究，经济学的功利倾向日益明显起来。相反，对于国民财富增长过程中天人关系紧张和道德倾向弱化等一些对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命运具有最终关照意义的大问题，经济学却不予考虑。

这就是说，当今的经济学面临的迫切任务已不仅仅是为人类寻求传统意义上的生存之策，也非仅仅是追求微观利益增长的趋利之道，而更应当致力于解决自然、经济与人的和谐、持续的发展，即诸多对于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更加根本性与重大意义的经济问题。经济学

^① 参见陈惠雄：《经济学的境界》，载《经济学家》，1999（2）。

如果继续以狭隘的功利境界来对待已经变化了的存在世界，就会失去其对于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和解决能力，也就丧失了其生命力。现代经济学只有由经济学的功利境界进入经济学的道德境界乃至天地境界，才能使经济学对于诸多社会经济难题有更加深刻的解释与解决能力，也才有其发展的前途。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福利经济学，应当是西方经济学终将走出功利境界而走向道德境界的一次重大宣示与觉悟。^①

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于崇尚人文，也就必然会克服西方经济学的功利困境，指导着当今的人类继续走自然、社会、人、文化等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恩格斯在其《自然辩证法》中就曾特别强调人和自然界的和谐发展，他指出，如果人类不保护自然界的生态系统的平衡及其发展，自然界就会对人类进行报复，甚至使人类毁灭，古巴比伦的灭亡就是教训。当然，人和自然界的和谐，需要人有很高的科学素养，尤其是道德素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仅有科学、功利的追求，更主要有人文的追求，这无疑是在当今人类继续前进的指导思想。

如果借用我国著名学者冯友兰先生人生哲学思想的核心——“人生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那么，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上仍然停留在功利境界，还没有上升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虽然福利经济学、伦理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有这样的思想取向，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还远远没有达到。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达到了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当然，这是以科学的追求为基础的。

3.6

人文经济学如何可能？

本部分从人的本性——利己与利他，即“经济人”与“道德人”

^① 参见陈惠雄：《人本经济学原理》，11～12页，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的统一来分析竞争与合作之间的互补性，还简要地提出了要从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来构建经济学。

3.6.1 “经济人”和“道德人”框架

(1) 要走出仅仅运用“经济人”分析任何行为的范式，从人类的终极目标出发，从利己与利他的角度研究微观主体的行为。

按照黄有光在《经济与快乐》中的观念，人类尤其是经济社会的最终目标是人的快乐。“金钱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快乐才是最终目的。如果经济增长不能增加人们的快乐，则经济增长并不重要，如何增加快乐才重要。”^① 我们知道，利己可以实现快乐，利他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如果用 H 表示快乐， a 表示利己， b 表示利他，那么人类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快乐的最大化，即 $\max H(a, b) = \alpha a + (1 - \alpha)b$ （其中 α 表示快乐因子）。人类选择利己或利他的行为，取决于快乐因子的大小。下面举例进行说明。

2002年，浙江省近4万个村进行了村民委员会选举，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以来的浙江省首次全省换届选举。据粗略统计，在全省新当选的13.32万名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先富群体”约占30%。其中，义乌市共2726名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先富群体”当选比例高达60%。那么，这些先富群体参选的动机是什么呢？据省民政厅的调查显示，其动机无外乎三类：谋求经济利益，谋求政治利益和为民办事。其中第一类人抱着损公肥私和保护既得利益的目标；第二类人谋求政治利益，既有保护既得利益的潜在动机，也有求名的社会心理，多数是各种动机相互交织；第三类人则出于公心，为改变家乡落后的面貌造福邻里，甘愿做出经济上的牺牲。^②

在这个例子中，第一类人更多地选择利己来实现其终极目标，第三类人更愿意选择利他来实现，第二类人则处于第一类人和第三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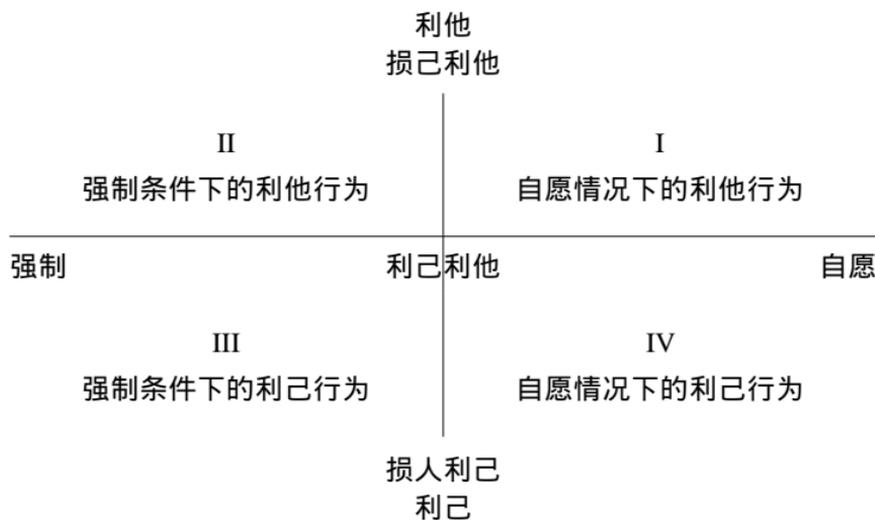
^① [澳]黄有光：《经济与快乐》，85页，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② 转引自王玉珍：《道德秩序的经济学分析——对利他行为的一个分析角度》，123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之间。人类之所以会有不同的动机，实际上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终极目标——快乐最大化，只不过快乐因子的大小不同罢了。

(2) 无论是“经济人”还是“道德人”，在采取行为时总是处于特定的外部环境（对行为的约束与限制）之中。

下面从人类的动机——利己和利他的角度出发，结合外部环境，来解释微观主体的行为。^① 参见下图：



图中横坐标表示行为主体所处的外部环境及其对行为主体影响的自由程度。右半轴表示自愿性，也就是主体从自身的动机出发，其行为选择不受外力影响。左半轴表示强制性，也就是主体的行为是受外力制约或约束的。

纵坐标表示微观主体动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行为。上半轴代表“道德人”的行为，上限为损己利他（无私利他）、下限为利己利他。下半轴代表“经济人”的行为，上限为利人利己、下限为损人利己。

下面分别来解释主体行为的四种情况：

第一象限：在现实中，一些微观主体往往会在自愿的情况下选择一些利他行为，这些利他行为同样是一种理性选择。比如，不论慈善家选择捐款的动机如何，其利他行为都是为了整个社会福利的改善；

^① 参见王玉珍：《道德秩序的经济学分析——对利他行为的一个分析角度》，107～118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不论家庭中父母对孩子、孩子对父母以及夫妻之间出于何种动机采取利他行为，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家庭团体利益的最大化。特别是，社会中见义勇为的利他行为也是为了被救助者处境的改善，放弃救助对于“道德人”来说，将产生更大的道德成本。因此，选择救助对于“道德人”来说，同样是一种理性选择。

第四象限：这是非常典型的“经济人”行为。在这个象限里，微观主体的行为是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中进行的。当然，任何自由的市场经济背后都一定包含了与其相适应的各种制度。在各种制度中，行为主体出于利己动机对利己行为的选择完全是自愿的。

第二象限：对于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政府会通过制度性规定对微观行为主体的行为提出强制性的要求，使其做出利他的行为。这种利他行为可称为制度性利他。比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主体的任何行为都处于制度设计中，不仅包括生产，而且包括消费、分配。这就是说，主体的基本经济权利没有一个实现的自由空间，只能囿于制度设计的框架内。所以，计划经济的制度设计的理想模式对主体提出了单面的“义务人”的要求。

第三象限：这里的制度性的利己，并不是指运用制度设计来强制地满足微观主体的利己，而是主体运用制度设计来实现利己，这是因为任何制度的设计都不可能实现完美，即使制度的设计能够达到完美，制度在其具体的运作及其实施上也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尤其是在制度不完善时，一旦个人理性的选择偏离了制度理性的设计，制度性的利己行为的出现也便成为必然。例如，利用自身的职务之便进行的各种贪污受贿行为就是非常典型的制度性的利己行为。

这种制度性的利己行为和“经济人”基于制度之上的利己行为是完全不同的。后者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无意识地促进了“道德人”所追求目标的实现，即促进了社会福利的增加，或团体利益的最大化。前者却恰恰相反，它往往是在追求团体利益最大化的幌子下，追求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团体利益最大化的最大侵蚀。

微观主体行为的这四种情况中，“损己利他”和“损人利己”都会导致无效率。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过度的”利他主义反而会导致无效率，比如说“你先走”的问题。这就是说，每个人都站在完全为对方考虑的角度进行选择和决策时，根本就无法产生一个结果。“以利他为目的的谈判则不存在能使双方都同意的均衡点”^①，因而是无效率的。也就是说，当人们采取“道德人”行为时给团体带来的总产出水平反而为零。这就产生了一种悖论：在市场交换中理性的“道德人”的选择行为，反而最终不能实现任何一桩交易。如何才能解决这个矛盾呢？方法之一就是引入自利。比如，在一些义务为群众做好事的人面前总是会排很长的队伍。试想一下，如果每个人都持有“道德人”的态度，那么就沒有人会抱着一种捡便宜的态度来排队。^②再比如，一些村官为了老百姓实现集体富裕而在别人都住进高楼时，自己仍住着破旧的房子，这从一个方面也反映了其他人的自利。如果没有“经济人”的参与，“道德人”的目的就无法实现。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人到义务为群众服务点排队的话，“道德人”的目标将如何实现？

同样，理性“经济人”在做出行为选择时，也会出现“囚徒悖论”。如果站在理性“经济人”自利的假设基础上，必然会得出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不一致的悖论。这需要引入利他。在“道德人”假设之下，“囚徒悖论”不仅不再是不可解决的问题，而且通过它的解决，可以产生效率。这就是说，当每个人都站在利他的角度，站在团体的角度进行决策时，就会走出“囚徒悖论”，实现效率，最终达到一种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一致。事实上，“自利行为与非自利行为的结合是团队忠诚的一个重要特征”^③。

所以，从“损己利他”和“损人利己”的两个极端问题的解决，

① 茅于軾：《中国人的道德前景》，3页，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

② 茅于軾：《中国人的道德前景》，5页，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

③ [印]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2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也可以得出结论，利己和利他是紧密相联的。

(3) 基于“经济人”与“道德人”统一基础上的合作。^①

合作是主体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自愿进行的协作互利的关系。所以，合作虽然偏重的是利他，但是还蕴涵着利己，这就是说，合作是自利性与互利性的统一。无论人们如何去看待合作，都无法否认合作中所蕴涵的道德维度。只不过在合作中所体现的利他并不是“无私的利他”，而是一种互利，是以自利为基础、利他为手段的互惠互利。这就是说，合作体现着“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特征。

市场经济中交换行为所蕴涵的互利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而互利原则实际上就是利己与利他的统一，这是因为在交换中，获取别人的东西是利己心的表现，对自己来说是获得了利益；将自己的东西让给别人则是利他的一种表现，对自己来说则是一种责任。斯密在论述“看不见的手”时，就将互利视为最基本的道德原则。他说：“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建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②哈耶克说：“市场秩序并不是以共同目的而是以互惠互利为基础的，也就是建立在对不同的目的进行协调进而使市场秩序的参与者得以互惠互利这个基础之上的。”^③

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是与竞争相伴随的，是内含于商品之中的。合作表明了主体之间是一种建立在平等自由基础上的契约关系。科斯在解释企业为什么会出现的时，实际上也解释了市场中行为主体之间真正意义上合作的出现，这是因为企业是一个合作体。

由于合作的最基本的特性就是自利性与互利性的统一，即互惠互利，

^① 参见王玉珍：《道德秩序的经济学分析——对利他行为的一个分析角度》，139～162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②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13～1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③ [英]冯·哈耶克：《哈耶克论文集》，邓正来译，125页，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所以，人类既不是完全的利他主义者，也不是完全的利己主义者。

这样，基于“经济人”假设基础上对合作行为的解释，就不是一个接近现实的合理的解释。行为经济学及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对主体完全自利的行为假设在现实中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挑战。行为经济学不承认经济人理性，一方面不承认经济人假定，认为人的本性中有利他的一面，不承认利他是从利己派生的，人可以从利他中直接得到快乐，另一方面不承认理性是绝对前提，不管它是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都不是无条件承认。行为经济学认为人可以依据非理性直接行事，而按理性原则行事反而可能是派生的。实验经济学利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也证明了人的经济非理性行为的真实性。

下面简要地针对“经济人”假设对合作行为解释的“贫困性”进行剖析。根据亚当·斯密对“看不见的手”原理的阐述，虽然每个追求自利的“经济人”都会促进社会利益，但是这种利他行为完全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这就是说，“经济人”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时，并没有从主观上想去促进社会的公共利益，只不过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无意识地促进了公共利益。这就是说，“经济人”假设无法对有意识的利他动机和行为进行解释。特别是，当合作的利益大于竞争的利益时，单纯的自利性假设并不能保证合作行为的必然产生，“囚徒困境”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此时的囚徒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必然会选择不合作。在对“囚徒困境”的博弈论的解释中，“经济人”在有限重复博弈中的理性选择总是不合作，尽管合作的利益要远远大于不合作的利益。但是，在现实中广泛存在着类似的“囚徒困境”情境，人们却选择了合作。阿马蒂亚·森明确指出：最近几年，有关研究表明，在有限重复的‘囚徒的困境’博弈中，合作行为是普遍存在的。”^①“实际上，不仅在无重复的博弈中，而且在无重复的现实生活中，合作行为都是经常可见的。对于这一现象，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一个人的真正目标并非其正在努力最大化的那一目标。同时，下面的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存在，即人们清楚地理解他们

^① [印]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8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的目标所在，并希望实现自己目标的最大化，但是，由于认识到了成功的相互依赖性，从而关心他人的目标。”^① 所以，对于互惠互利这种体现于合作中的结果来说，单纯地从“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解释是远远不够的。

对于“经济人”假设对合作行为解释的“贫困性”，阿马蒂亚·森认为其主要原因是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分离。“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性现象。”^②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并对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融合与重构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如施蒂格勒、布坎南、黄有光等。

总之，西方经济学运用“经济人”的假设来分析合作是片面的。对合作，还需要用“伦理人”（或“道德人”）来解释。

对于合作所包含的互惠互利的行为，即使被解释为站在利己基础上的利他，这种利他行为在主体行动之前也是可以预料到的，它是一种有意识的行动。对于合作的主体来说，即使采取合作，其目的是为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即“经济人”的动机，但是，为了实现其目的，也不得不采取对他人也有利的行为，即“道德人”行为。

所以，互惠互利既可以从利己的角度，也可以从利他的角度来进行解释。当人们选择合作时，既不是基于单纯的“经济人”假设基础，也不意味着基于自利最大化基础上的选择就一定是理性的。“为什么一个人只有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并拒绝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东西才是唯一的有理性的呢？当然，如果说自利最大化不是非理性的行为可能还有一定的合理之处，至少不是完全荒谬的；但是，如果说除了自利最大化以外的其他任何行为都一定是非理性的，恐怕就很少有人能够接受了。”^③ 所以，除了自利最大化的选择是一种理性选择之外，“道德

^① [印] 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8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② [印] 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1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③ [印] 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2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人”在利他基础上所追求的团体利益最大化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3.6.2 “理性人”和“非理性人”框架

记得康德的二律悖反：矛盾的两方面都可以得到说明和证明。所以，理性和非理性同样都能够得到证明。

在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是最基本的假设。但是，经济学不需要研究“非理性”吗？或者说经济学不需要从“非理性”进行构建吗？答案是否定的。

事实上，“理性人”也具有非现实性。“理性人”从斯密开始，主要经过了三次大的争论。在斯密那里，经济理性表现为：人们在市场活动中，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得失和盈亏进行精密计算。到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理性被视为与自身利益最大化等同，理性经济人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这就使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被广泛应用成为可能。这种理性观，被后来的经济学家概括为三条基本含义：目标的一致性、手段与目标的一致性以及收益最大化。随着博弈论进入经济学，经济理性的外延被进一步放宽，“理性人”被理解为每一个人的自利行为与群体内其他人的自利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假设。这是一个很弱的理性概念。对于这一观点，阿马蒂亚·森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仅仅有选择的内在一致性对理性来说是不够的，至少它还必须要求在一个人实际持有的目的与他所作的选择之间存在一些令人信服的关系，而一致性假说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他进一步把“理性经济人假设”斥为“理性的白痴”。他进而建议，应该建立一种比理性原则更为复杂的理论结构。他还指出，即使人们能够以理性的方式行动，正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也不必然是有道理的。这是由于我们都会犯错误，都会陷入混乱，“冷静的理性方式可以充斥我们的教科书，但世界要丰富得多”。^①“理性经济人假设”本身是虚弱的，它的合理性来自于一些增强的补充性假设，如完全竞争、市场均衡、充分信息以及同质性假设，还应该加上个人有足够强大的信息

^① Sen, A. K., On Ethics and Economics, Oxford: Blakwell Press, 1987, p. 11.

处理和计算的能力。^①而这些补充性假设却是难以得到现实有力支持的。

事实上，虽然理性通常在人及其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但是，非理性因素依然起着一定程度的作用，这也是不可忽视的。其实，唯有理性和非理性处于一种有机协调的状态，人的活动才能是合理的、成功的。因此，作为现实人的经济活动的市场，就是理性和非理性共同起作用的一个场所，这既要求重视研究理性因素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也要求探讨非理性因素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近现代西方一些赫赫有名的经济学家都探讨了非理性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且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的甚至从非理性出发构建了自己的经济学。

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马尔萨斯指出人不是理性的动物，而是情欲冲动和愚蠢的动物，其所作所为完全和理性的劝导相反，否则，就不会有人口过剩、困苦、战争。由此他认为，研究经济学尤其是研究人口理论必须从现实的非理性的人出发。

约翰·穆勒虽然提出了理性经济人假设，把理性摆放在政治经济学最为核心、最为基本的方法论坐标上，但是，他提出了“趋势定律”（或“趋势法则”）。他认为，任何理论都是在有干扰因素条件下对某一现象达到的不完善、近似的正确认识。由于干扰因素不可能排除掉，所以，任何理论不可能永真，总有错的时候。干扰因素包括情感、习俗、意志、动机等，这实际上就是非理性因素。

威尔弗雷多·帕累托虽然坚信经济学所研究的人的行为大部分是理性行为，但是，他也认为，在实际生活中，逻辑行为和非逻辑行为几乎是混杂在一起的。“非逻辑行为”是指“非理性”，即手段与给定目标没有逻辑关系的行为，它包括价值观念、信仰、情感等领域。

美国经济学家索尔斯坦·本德·凡勃伦是第一个从非理性的方法角度来构建其经济理论体系的人。他认为，制度可对经济最大化产生偏离的影响。制度是社会习惯，而习惯又产生于本能。本能可分为三

^① [美] 肯尼斯·J. 阿罗：《经济理论与理性假说》，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72～78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类：父母的天性、工作的本能和随意的好奇心。所以，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归根到底是受本能支配的。

1962年，贝克尔发表了《非理性行为和经济理论》论文，他指出经济生活不仅有理性行为，而且有非理性行为。他不仅指出广义的非理性行为包括处于极端情形的怠惰行为和冲动行为，而且提出了怠惰和冲动两个非理性行为的模型。

西蒙把其讲的“有限理性”直接解释为“非理性”。他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经济学界已经提出了一种有限理性，以代替古典的全面理性观。他对非理性决策发生的认识论原因还作了深刻的揭示，他认为市场非理性决策有三个重要的认识论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需求函数、成本函数中客观存在着市场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二是市场行为者所具有的有关备选方案只能达到不完全信息状态。三是成本函数或其他环境的约束极其复杂，致使行为者无力计算出其最佳行为方案。

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G. M. 霍奇逊认为市场信息的撷取、加工过程需要非理性的参与，市场行为者的决策行为本身有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时则是无意识、潜意识状态所激发出的非理性行为。

美国经济学家哈维·莱宾斯坦将其经济非理性“X—低效率”理论摆放在与新古典学派分庭抗礼的位置，他认为新古典理论描述的企业运行方式与现实完全相违：一是企业内部不是有效率的。二是企业利润不是最大化的，厂商并不是按边际分析原理经营的。三是市场中普遍存在着偏离最大化原则的非配置型低效率现象。

身为斯特拉斯堡路易·巴斯德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皮埃尔·路易·雷诺一直对非理性问题十分关注。他把经济可变因素和心理可变因素互相结合起来，特别强调人的心理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他所强调的心理可变因素更多的是指非理性因素。他发现“人的行为并不是严格合乎逻辑的，而往往是一半合乎理性的或非理性的”，他认为这种“非理性的人”是由一些“外部刺激”或自己的“内部冲动”所决定的，他希望能创立出一种有关这种“非理性的人”的经济理论。

奥地利经济学家欧内斯特·迪希特从大量的市场调查中得出如此

重要的结论：市场行为者的“行为是一种假象”。人的各种购买动机一般是无意识的”，是与“里比多冲动”有关的。在大多数时间里，消费者的“选择”往往是由偶然性或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

总之，在西方经济学界，一些经济学家早已在其理论中探讨了非理性因素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西方经济学已从全知全能的理性经济人模式向“理性—非理性”经济人模式拓展。

从哲学角度来看，非理性主要指欲望、习俗、情感情绪、无意识等。而这些在哲学中探讨很多，但在经济学中探讨得太少。

“欲望”在我国被认为是“需要”，奥地利经济学家弗·冯·维塞尔认为，欲望与需要、需求可以通用。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专辟一篇讲述经济学中的欲望范畴及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特别是从市场消费心理角度论述了人的欲望和市场消费倾向的内部机制，认为个人消费欲望呈现为随价格变化而变化的需求函数曲线。欲望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表现在：第一，欲望是市场经济发育的重要内驱力。市场经济中的经济行为，不过是在市场上通过货币或相当于货币的商品来进行交换，进而得到某种商品或货币，以实现人的欲望的行为。但相对于人们无限多样的欲望来说，有用的资源是相对不足的，因而，必须通过市场的交换形式来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使社会成员的欲望达到相对满足的程度。如果没有人类无限占有资源的欲望和有限的社会资源相矛盾的推动，就不会有以资源配置为主要功能的市场出现。这就是说，欲望使得市场及其运行的机制得到发育和成长。第二，欲望的盲目驱动可能会给市场经济带来负面效用。虽然欲望是市场经济赖以生存和发育的重要内驱力，但是，欲望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是每时每刻不断产生的对最基本生存需要的渴望，它不时地驱动着人的一切市场行为。由于每个市场行为者对其欲望的调节乃至控制随着个人或集团心理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市场上往往会出现一些被欲望盲目驱动的现象。一旦盲目驱动的欲望超出了合理的极限，就会导致市场行为抉择失误或市场败德行为产生以及经济损失惨重等。

作为非理性因素的“习俗”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表现在：第一，

习俗往往从人们主导价值上对人们的消费行为起潜移默化的心理上的导向作用。人们的某种消费行为如果严重地违反了所公认的习俗，就会遭到人们的冷遇，甚至引起人们的耻笑、愤怒、斥责乃至宗教情绪。第二，习俗是企业“有组织的记忆”。这是因为企业中不论是“熟练工作”还是“不熟练工作”都包括随时间推移而获得的、且往往依惯例而形成的实际技能。事实上，企业中多数技能也都是由一套习惯组成的。第三，某些习俗可以被制度化，从而为人们提供有关市场行为者的经济活动信息。习俗一旦被制度化，就会更加约束市场行为者的行为，就会更有利于人们作出有意识的决策。第四，习俗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可以起重要的保障作用。市场行为者往往是靠着其共同遵守的习俗来发生各种业务关系的，一旦发生了相互间的经济纠纷，就会由习俗最先来进行调解。第五，习俗在制度创新时期有着重要的作用。对现存的习俗的全盘否定，会导致体制缺乏连续性而陷入混乱、危险的境地。固守旧的习俗，会导致原有体制的进一步僵化。一种失去现实性的习俗往往对制度的创建有着极大的阻碍作用。

无意识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集中表现在市场行为者的决策和评价行为中。虽然决策具有鲜明的理性特征，但是，在实际的市场行为中，有“不假思索”的决策行为。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或者个人，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无意识的市场决策行为。虽然评价行为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但是，在实际的市场行为中，也有不少评价行为是不假思索的。要特别一提的是文化无意识对决策的影响。文化在人的心理上的长期积淀和内化，形成了文化无意识。在一般情况下，市场行为者遵循文化无意识准则会得到一定的支持或鼓励，反之，就会遭到非议乃至排斥。正确地把握文化无意识现象对企业决策的成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否则，企业决策就会失败。比如，我国曾出口一种品牌为“芳芳”的口红到北美，其品牌按拼音写成 Fang Fang，结果，这种口红在市场上遭到了非议，这是因为在英语中 Fang 的意思为狼的尖牙或者蛇的毒牙，有谁愿意购买这种品牌的口红呢？显然，企业的决策与消费者的文化无意识发生了抵触。类似的例子很多，美国雪佛

兰以“NOVA”命名一种新车型，英文的意思是“神枪手”。这种新车在拉丁美洲却受到冷落，这是因为按西班牙语理解，“NOVA”是“走不动”的意思。我国的“蓝天”牌牙膏销往美国时碰到了钉子，这是因为厂方把“蓝天”直译为“Blue Sky”，在美国，“Blue Sky”含有“不能兑现的证券”之意，很不吉利。山羊牌羊毛衫，原本是想说明产品质量的纯正，但是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Goat”既是山羊，也是“色鬼”的代称。白象牌电池在外销时采用“White Elephant”的品牌，在英国人眼中，大象是“沉重的包袱”，是“蠢而无用的东西”。

情绪、情感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表现在：第一，它们影响市场行为者的认知过程，进而，影响其行为。投资者在各种投资条件已基本具备时，其良好的心情可能会使其思维正确、投资成功；其极度低沉、郁闷乃至恐惧等心情往往会导致其思维的失误及投资的失败；其过分冲动且已达到激情状态的心情往往会使其出现反常态思维或行为。第二，它们对市场行为者的价值偏好有着一定的导向作用。情感、情绪的本质就在于它们以心理体验的方式反映着市场行为者和事物之间的价值关系，表现着市场行为者对事物的价值态度。当某一事物和人的需要毫无关系时，它对人是无所谓价值的，进而，人对它也是无所谓情绪和情感的；只有那种与人的需要有关的事物，才能引起它对人的价值，才能引起人的情绪和情感。凡是满足人的需要或价值的事物，会引起快乐、满意、爱等体验；凡不能满足人的渴求的事物，或与人的意向相违背的事物，或违反了人的价值观的事物，则会引起愤怒、哀怨、憎恨等体验。第三，它们可以协调市场交往中的人际关系，提高经济人的工作或经济效率。情绪和情感总是通过人们表情的中介作用来达到人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彼此沟通。它们不仅有可能为经济人建立起相互协作的感情纽带、及时地传递市场信息，而且可以为经济人辨认其所处的市场环境和人的态度，从而，有可能提高经济人的工作或经济效率。尤其对厂商来说，他可以从情绪、情感方面来协调企业和职工、职工和职工之间的人际关系，以达到提高

工作或经济效率的目的。^①

综上，唯有理性和非理性处于一种有机协调的状态，人的活动才可能是合理的、成功的。作为现实人的经济活动的市场，就是理性和非理性共同起作用的一个场所。近现代西方一些赫赫有名的经济学家都探讨了非理性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且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的甚至从非理性出发构建了自己的经济学。以我看来，单从理性角度或非理性角度来构建经济学都是片面的，将非理性划归到理性或将理性划归到非理性，进而来构建经济学也是片面的。所以，西方经济学已开始从全知全能的理性人模式向“理性—非理性”模式进行拓展。

3.6.3 经济学的最高指标：人文指标

人文——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其天然的客观尺度是人的寿命。人文以科学为基础，也就包含着科学因素，当然也包含着经济因素。国际上通常取政治与民事权益、收入、期望寿命和受教育水平，为综合性的人文发展指标。经济学是关于生命成本最小化和寿命最大化的学问。如何以少的资源损耗，来达到人的寿命的提高，这才是经济发展的真正目标与各种制度安排的根本出发点。福利供给的丰富完善仅仅是实现人长寿的手段，绝非经济发展的目标本身。

探索寿命指标的意义，可以使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成为一个可以测量的东西，这是非常重要的。

1. 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自由发展、精神快乐与寿命

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自由发展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范畴。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体力、个性、智力、品质等各方面能力的协调发展，它强调的是人的发展的一种客观状态或境界。人的自由发展指的是人在不屈于任何外在目的和压迫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积极主动、自觉自愿地发展自己的体力、个性、智力、品质等方面能力，强调的是人的发展的一种主观状态以及人对自己发展的驾

^① 参见张雄：《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世界》，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

驭。当为谋生所迫和旧式分工所限时，人就不可能自由地发展。马克思就强调了这一点，他认为，只要分工还不是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就是说，对人来说，旧式分工是一种自发的、被迫的活动，造成了人的片面发展。

所以，只有在人的自由发展的基础上，即在获得广阔的自由发展的空间和条件的人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来发展自己的基础上，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成为现实。人的全面发展就包含着人的自由发展。人的能力发展愈全面，人的自由选择的空间也就愈大，从而也就愈能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来发展自己。反之，当人的总体能力发展程度低且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时，人就不可能获得较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和条件，也就难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去发展自己。由此，学界通常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简称为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从人的发展的全面性来看，“经济人”当然是片面发展的人，“经济人”的商品意识一旦泛化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会导致人的精神家园的失落。当前，不少人由于追逐实利，以一种实用主义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和世界，且将实用主义贯穿于其为人处世之中。这些人只关注眼前的物质利益，忽略对人本身精神世界的追求和满足，最终对人生的意义表示怀疑，对人生价值的理解发生错位，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未来失去信心。这样的人也就是“单向度的人”。所以，仅有经济发展，而人的精神贫乏，人就不可能全面发展，也只有在发展经济和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中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根据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内在联系，马克思把人的发展过程概括为三个基本的历史阶段：“人的依赖关系”的历史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阶段、“自由个性”的历史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个人没有独立性，直接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共同体。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只限于共同体内部，只是在孤立的地点和狭窄的范围内发生的地方性联系。在第二个阶段，社会形成了普遍的物物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要求以及整体的能力的体系。社

会关系以异己的物的关系的形式同个人相对立，即人被物化的社会关系所支配，或者说人被受物支配的社会关系所束缚和压抑。在第三个阶段，社会关系不再作为异己的力量支配人，而是置于人支配之下，即人支配物。人们将在自觉、丰富、全面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成为具有自由个性的人。显然，当今市场经济中人的发展仍然处于马克思所说的第二个历史阶段。虽然人的发展无法逾越对物的依赖性这一阶段，即无法跨越市场经济这一环节，但是，关键在于如何利用人对物的依赖性以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出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条件。最后消灭物对人的统治，把人从物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人从物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主要表现在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两个方面，即马克思所说的“两个提升”，这就是说，人从自然界、人类社会中解放出来而成为真正的主人，使人与自然、人与人达到和谐。进而，人的身心状况发生了变化，人能够达到身心和谐、精神快乐。最后，人的寿命得以提高。这就是说，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程度是人的寿命长短的充分条件。可见，人的寿命是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天然的客观尺度。人的寿命长，就反映了这个社会中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程度高；人的寿命短，就反映了这个社会中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程度低。

事实上，一个和谐的生活环境和人际关系、一个竞争向上的工作环境等都会有利于人的健康；而一个差的环境只会使人的身心受到损害，寿命受到减损。这就是说，社会一切方面的发展变化最后都会引起人的身心状况的变化，并最终表现为人的寿命的变化。寿命是检验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综合指标。

在经济学中，就一直存在着社会发展指标的论述。下面，再简要地回顾一下发展的指标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们一般把人均GNP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志。20世纪60年代初期，“福利增进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的观念已逐渐地被确立起来。福利指标体系包括人均医生数、蛋白消费量、人均钢消费量、各次产业的产值比例等。1967年，美国经济学家阿德尔曼和莫里斯提

出了“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量”40个指标，试图以人们的物质生活、政治待遇与文化涵养诸方面发展来全面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1977年，美国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莫里斯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测度指标——“物质生活质量指数”，它包括预期寿命、识字率、婴儿死亡率三项指标。特别是阿马蒂亚·森最终把体现社会经济发展成败的指标确定在死亡率，即人类自身寿命这个单一指标的变化上，也就最终以人的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最高尺度。人类自身寿命的变化是唯一可以确切地反映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自然环境总体发展水平的最高综合指标。

传统经济学所讲的效用是不可测量的，快乐是不可测量的，帕累托最优也是难以测量的。但是，效用的多少、快乐满足程度、帕累托最优等最终可以反映为人的寿命。只有有利于人类健康长寿的经济生活方式，才是值得追求的。以人类自身寿命变化来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全新的含义。现在的高能耗的生活消费，实际上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所以，如何以少的资源损耗，来达到人的寿命的提高，是中国目前最值得研究的，也是经济发展的真正目标与各种制度安排的根本出发点。

因此，依我看来，经济学是关于生命成本最小化和寿命最大化（或快乐满足最大化，或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学问。所谓生命成本，就是在经济社会活动中所付出的以“新陈代谢”为基础的体力、脑力、时间等。人类经济活动中所有成本，归根到底，都是人的生命成本的支出。经济学与人类发展需要解决一个人的生命成本最小化问题，这是人类所有经济行为的出发点。所有的经济发展，要么是减少人力资本，要么是加大人力资本。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为了节约生命成本，使有限的生命成本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在生命成本的约束下得到寿命的最大化。应当以这条原则来检验经济发展、检验经济增长模式。

2. 科学、人文与广义的人文指标

简单地说，“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人文”主要指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的最根本特点是实证性，即笔者所理解的“实证精神”。

“实证精神”依我看来，主要是指“求真”的精神、“求实”的精神，具体地说，指客观性、精确性、肯定性、确实性、明确性、检验性、系统性、普遍性等。与此同时，人文学科的最大特点是非实证性，即主观性、个别性、模糊性、不可重复性、难以控制、难以量化等，其中包括“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强调人的价值，即对人的“终极关怀”。它主要偏重“求善”、“求美”的精神。由于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致富”的强劲形势下，科学常被称为“工具理性”或“功利意识”。而人文学科由于缺乏直接的功利效率，被人们称为“价值理性”。所以，笔者所理解的“科学精神”除了实证精神之外，还包括功利意识。“人文精神”又称为“价值理性”。文德尔班将“两种文化”对立，看成是事实知识和价值知识的对立。石里克把自然科学视为“事实科学”，把人文学科视为“规范科学”。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关系是：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灵魂”。具体地说，人文精神应该以科学事实为基础，且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科学标准，而科学精神应以人文精神为价值规范。简单地说，科学精神偏重对“真”的追求，人文精神偏重对“善”、“美”的追求，两者都是对人类社会最高境界——“真、善、美”的追求。

事实上，科学与人文融合的趋势已得到学界的公认。C. P. 斯诺曾指出“两种文化”的对立已使西方人陷入了危险的境地。奥本海默使原子弹变成了现实，但是，原子弹用于战争，给人类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他认为，哲学话语和技术发明都是缺一不可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科学技术已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已悲剧性地变成了人统治人的工具，从而使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罗蒂消解了实证科学的客观性和理性。他把科学等同于理性，称为“强理性”。他认为，与其说科学有客观性，倒不如说科学有“亲和性”。“理性”应该相应地弱化为一系列的道德德性：容忍，尊敬别人的观点，乐于倾听，依赖于说服。这样，“两种文化”就没有什么根本区别。

笔者认为，人文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超越。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总是强调自己的理论是科学，自己的哲学是科学

的方法，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也总是认为自己的理论不仅是为了“解释世界”，最主要是为了“改变世界”。“解释世界”是科学的任务，“改变世界”即“实践”。实践当然包括了科学，但还需要“人文”的规范。实践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文’，也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总是认为，自己的理论是科学，但不仅仅是科学，更主要是为了“人文”。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强调自己的经济学是科学，进而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尤其对拜金主义、拜物教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最后将“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视为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原则。在人的发展问题上，西方经济学把人的自由发展当作手段，其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把人的全面发展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自由竞争、追求效益乃至市场经济，只是手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目的。所以，经济学不仅可以从科学层次来进行理解，而且，更主要的是可以从人文层次来进行理解。

既然人文以科学为基础，人文因素也就包含着科学因素，当然包含着经济因素。而社会发展是以人为目的的，人绝不仅仅是手段。其实，人文体现的是以人为本，这当然包含了满足人的经济利益以及精神追求。所以，可以将包含经济等在内的人文因素视为广义的人文因素，这一广义的人文因素也就是上面所说的社会发展的直接的具体的指标。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学术界一直在开展“国际人文因素项目”(International Human Dimensions Programme, IHDP)研究，这涉及人文发展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诸多方面。所以，“人文因素”涉及个人、社区、国家和全人类层面上的生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这实际上就是上面所说的社会发展指标，这里再简单地论述一下。1992年，Dasgupta和Weale采用包括人均收入、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成人文盲率、政治与民事权益等5项指标，对48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由于政治与民事权益的政治敏感性较强，所以，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去掉政治指数，取收入、期望寿命和受教育水平三项指标，在对它们进行指数化

处理后，再加以平均，得到了综合性的人文发展指数，进而，对各国国民的生活质量进行了评价比较。1993年，Dasgupta将人文权益分为两类需求：基本性需求和享受性需求。前者指维持基本生存所需的生物性需求，包括营养、住房、环境卫生、医疗保健、基础教育和基本劳动技能等内容。后者主要指政治和民事权利，多属政治、社会、法律、文化艺术等非物质性服务内容。例如，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结社与言论自由、人身安全、财产保障等。可见，货币收入或经济增长不能充分体现人文发展的内涵。“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实际上就蕴涵了人文发展指标。在可持续发展中，人是中心，经济是基础，环境是前提。

人文发展的实现，需要一定的资源消费保障。随着社会的巨大发展，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工业革命之后，社会对资源的消耗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不断增加，逐渐破坏了大气中的碳平衡，引起了温室效应，加剧了全球气候的变化。于是，大气中碳排放容量便成了一种经济上的稀缺资源。一般说来，人文发展水平低，对碳排放的需求就低；人文发展水平高，对环境质量的需求高，对碳排放的需求反而下降了。这就是说，人均碳排放需求随着人文发展潜力的实现而趋向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人文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基础还有一定数量的营养、医疗、住房、衣物等，而最根本的则是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地球。由此可见，人文发展不可能是无限的。一方面，不同的个体、社区、国家或国家集团使人文发展的基本权益能够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一旦人文发展的潜力得到基本实现，生物学上的物理扩张，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没有意义的。营养需要应该是一定的，营养过剩对身体反而有害。住房也并非越大越好。这就是说，奢侈性或浪费性消费不属于基本的物质需求。当然，非物质性的政治和民事权益，对于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个人来说，同样受到义务的约束。^①

总之，如何以较少的物质资源牺牲来使人类获得一种更加合理的

^① 参见潘家华：《人文发展分析的概念构架与经验数据——以对碳排放空间的需求为例》，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6）。

生活方式，达到天人、人际、亲情、劳逸之间的和谐，即达到人文，以利于人的长寿，这才是人类所要真正研究的，经济学更应当如此。只有有利于人类自身健康长寿的经济增长与生活方式，才是人类经济发展之唯一合理的追求方式。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寿命的提高。福利供给的丰富完善仅仅是实现人类长寿的手段，绝非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

第4章 语言、文化传统和经济学

当代哲学的“语言转向”表明，知识与价值的关系实质上是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科学与价值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这最明显地表现在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间的争论。事实上，经济学是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新途径。经济学的语言转向表现在：一是制度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现象。二是博弈论认为，任何词语的特定含义都是通过由某种语言演化的最优化过程而形成的演化均衡而确定的。三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只强调了科学语言而排斥了人文语言和日常语言，这恐怕很难向人们提供和展现一种失真较少的真实经济世界图景。^①

西方经济学有其浓厚的文化传统，这已成为共识。日本的经济体制及其经济学有其深厚的民族文化特色。西方经济学要从功利境界提高到道德境界、天人合一境界，不仅要吸取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而且要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性。

我国应当构建出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经济学。就其现实性来说，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参照19—20世纪的西方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每一种文化的合理思想，这样，才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构建出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经济学。

^① 参见韦森：《当代哲学中的语言转向与经济学的语言反思》，载《河北学刊》，2003（1）。

4.1

经济学的语言哲学反思

4.1.1 经济学中“语言转向”的根据

1. 当代哲学的“语言转向”

纵观西方哲学史，就会发现，哲学经历了一个从对本体论的形而上把握，到认识论的思考，再到对语言的语言哲学反思的过程。具体地说，首先，哲学家思考这个世界是什么；其次，哲学家反思人自己认识世界的方式；再次，哲学家转向对表达人们认识世界的媒介和工具的关注。

哲学的语言转向萌发于对“康德哲学问题”的回答。康德哲学思考的问题有以下几个：第一，我能够认识什么？第二，我应该做什么？第三，我可以希望什么？第四，人是什么？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于这样一个核心问题：知识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关系。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过程中，首先，康德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了考察，发现人的认识能力只能达到关于现象界的知识，而不能认识物自体和价值世界，这便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主要内容。其次，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通过对实践理性进行的考察，探索了人的道德能力与道德自由意志的根据问题。最后，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通过对审美的“判断力”的分析，试图在外部客观的自然世界与人的内部的、主观的自由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但是康德失败了，终于走向了“道德神学”。

20世纪之后的西方哲学的主流——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依然围绕着康德所提出的基本问题即知识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而展开：人能否通过语言去把握现象界背后的“本体”和理解价值与意义？如果可以，通过语言呈现出来的这种意义与价值世界到底如何？

综上，正如第1章所说，知识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实质上表现为科学与价值（或人文）的关系问题。科学主义发展表明，价值问题

最终无法划归到科学问题，科学最终也就无法把握价值。人文主义发展也表明，价值问题最终无法全部包括科学问题，科学问题最终也就无法通过价值来加以解决。唯一的结论是，科学与价值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事实上，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间的争论就反映了在知识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争论，这是因为，实证经济学实际上是科学的经济学，而规范经济学涉及了人们的价值观。

2. 经济学：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新途径

笔者认为，从科学层次来看，经济学是科学，这是对经济学的低层次的理解。从人文层次来看，经济学是人文，这是对经济学的高层次的理解。

这在第一章已经详细地论述了，这里不再赘述。

4.1.2 “语言转向”在经济学中的表现

具体地说，“语言转向”在经济学中表现为经济学家对经济学与语言之间关系的探讨，主要有以下几点：

1. 语言和经济学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一，制度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现象。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及其后果的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假定人是理性的，而理性和人的语言又是紧密相联的，所以，人为什么有理性，这是和人的语言紧密相联的。事实上，种种制度（还有习俗、惯例、规范等）都是在语言中形成、以语言为载体、在语言活动中演化的。这样，语言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序”，并成为了“文化”的代名词。

具体地说，一个社会中语言现状及其特征会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偏好和选择，进而会影响到人们的社会活动和交往（或社会博弈）及其结果，从而影响秩序的形成、形态，并导致了不同的规则及其多样性，即非正式的约束规范，最终通过法律制定和普通法的前例而变为制度，即社会或群体内部的正式规则中的秩序及其所显现出来的规则。事实上，东西方习惯、习俗、惯例、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及其在现代化过程中演化的差异与东西方不同的语言秩序是紧密相联的。所

以，语言标识了使人成为人的存在和能力的独特的约定俗成的制序，即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方式。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指出，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

第二，语言与思维是紧密相联的，而人的经济活动离不开思维活动。所以，人类社会的交易、交换等与人的语言是密切相关的，不同的语言秩序往往会影响人们的交易活动等。实际上，经济活动中的博弈活动也是思维、语言交流的过程。由于在人类相互作用中最基本的常规性就是日常语言（即自然语言），所以，经济学理论与语言是密切相关的。事实上，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数学等科学语言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也充分说明了语言在经济学理论中的重要意义。

2. 对语言的经济分析

这最明显地表现在博弈论对语言形成等的解释上。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词语”与外在对象相符的原因是语言符号任意性的约定俗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则将之归结于人们的“语言游戏”。但是，鲁宾斯坦从博弈论出发，将之归结为人的语言中实际存在的某种最优化的线序关系。而这种最优化的线序关系是自然的演化力量自发造成的。所以，鲁宾斯坦认为，演化赋予语言以意义，且演化过程生成了语言的最优化的线序关系。这就是说，任何词语的特定含义都是通过由某种语言演化的最优化过程而形成的演化均衡而确定的。或者说，任一话语方式都是同一语言在社群内部说话者之间博弈均衡的结果。

3. 对经济学的语言分析

上面所说的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显示，对经济学来说，用科学语言（或概念语言）可以表述实证经济学（或科学经济学），但无法表述规范经济学（或人文经济学、艺术经济学）。

事实上，在经济学中，一直存在着经济学究竟是运用科学语言还是运用人文语言之争。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只强调了科学语言而排斥了人文语言，这明显地表现在自马歇尔和凯恩斯以来以新古典主义为主流的当代经济学各学派，它们一般只注重数学分析工具的运用和计量模型的运用，这是有很大问题的。这里，以两个例子来加以说

明。英国语言学家利奇（Geoffrey Leech）在其《语义学》^①第四章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假如存在一个理想的机器人社会，每个机器人都能发出和接收某种信号，即“机器人语言”，并且每个机器人在接收这种信号后，都能进行自己的“逻辑计算”，进而开展活动和执行任务，那么，在这个理想的机器人社会中，语言的唯一功能就是讲述知识和传递信息，从而使每个机器人互动和合作。但是，稍加思考就会发现，这种机器人社会与真实的人类生活世界相去甚远，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语言要比“机器人语言”的功能和内涵复杂得多。与此相对应，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主流的当代经济学所假定的，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人人都是“理性最大化计算机器人”的机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由于不考虑伦理判断、价值规范、人们的即时情绪和心境会通过所用言语的言辞、语音甚至语调的媒介影响人们的决策，尤其是影响博弈对手的策略选择，从而改变了社会博弈的后果。因此，单从语言和人们言语活动的角度来看，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实际上可能比任何生化实验室的“无毒”和“真空”条件要求还严格得多，显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假定的社会没有反映人类社会的真实生活，这是有很大问题的。语言学家还常用下面一个例子来说明，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语言绝非仅仅是一种机械的符合某种语法和逻辑的机器人信息编码。假如在火车上甲把腿横放在人行通道上而妨碍了乙的通行，乙想通过便怒吼到：“请让一让！”甲就有可能回答到：“怎么能这么说话？不让！”但是，如果乙面带微笑并轻声柔和地说：“请让一让”，甲可能会立即客气地让乙通过，并可能说：“对不起，请！请！”同样的一句话，同样的言辞，同样的语法结构，却因语调和口吻不同而导致不同的人际关系和不同的社会结果。这正是人们通过语言交流而达到人们情感和社会交流的玄妙之处。在日常的市场交换中，正是由于交换一方或双方语言使用的巧妙，使不能成交的交易成交了，甚至买方付了高价或者卖方低价售出而他们各自心里仍感到高兴。相反，在现实中，在许多情形中本来存在的交换与交易机会，却因当事

^① [英] 杰弗里·利奇：《语义学》，李瑞华等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

人所用语词不当或语调和口吻不当而失去了。所以，人们的言辞使用和言语交流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博弈结果。而这一点，显然是新古典主流学派和博弈论支付最大化模型迄今不能用其精美的数学模型“捕捉”和“再现”出来的。

另外，人们日常用的是日常语言，而日常语言往往是模糊的，比如说，什么是高？在当今中国，一个 1.9 米高的人，大家会认为他是个高个子。如果是一个 1.89 米高的人，人们也会说他是个高个子。这同样也适用于 1.88 米、1.87 米、1.86 米……但是，如果依此类推，人们就会得出 1.5 米、1.4 米甚至 1 米的人都是高个子。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追求的是语言的清晰性，而不是语言的精确性。所以，日常语言很难为科学语言所代替。当今科学哲学尤其是数学哲学表明，科学语言也是有问题的。比如，数学的基础就存在着问题。维特根斯坦从早期的逻辑哲学转向晚年“日常语言分析”哲学研究也表明，不仅需要科学语言尤其是数学语言，还需要日常语言。

于是，当当代主流经济学嘲笑古典经济学用日常语言建构“经济世界”不“科学”时，为什么不能反过来问主流经济学家这样一个问题：用科学语言尤其是数学语言建构和推导出来的“经济世界”就是“真实的”、“科学的”？至今人们也无法判断是当代主流经济学的“数理模型经济世界”还是古典经济学的“日常语言经济世界”更接近人类社会的“真实经济世界”。事实上，至今有的经济学家仍然坚持用日常语言来表述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理论由于过分追求数学语言，而使一般的人很难理解它。经济学随笔表明，只有借助于日常语言，经济学理论才能被一般的人所掌握。

事实上，早在 1965 年，J. Marschak 在《行为科学》杂志上以“语言的经济学”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但是，这好像没有引起主流经济学家的注意。197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也曾意识到经济学的研究终究要受到经济学语言的束缚。到了 20 世纪末，博弈论经济学大家鲁宾斯坦终于醒悟了，提出了语言的经济学分析和博弈论经济学的语言问题。黛尔德拉·迈克洛斯基于 1998 年出版了《经济学的花言巧语》一书，这也表明了必须要对经济学的语言进行反思。

所以，作为研究人们经济行为的经济学，如果不反思经济学自身的语言问题，恐怕很难向人们提供和展现一种失真较少的真实经济世界图景。但是，当今沉睡在对人类经济行为进行数学建模迷梦中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好像还没有反省经济学的理论问题也有一个自身的语言问题。^①

4.2

构建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经济学

正如第一章所说，西方经济学及其方法论的争论最终会反映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以及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争论。约翰·内维尔·凯恩斯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对以前的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进行了总结，认为以前的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是作为一门实证的抽象的演绎的科学和作为一门伦理的现实的归纳的科学之间的争论^②。前者往往表现为实证经济学，其遵循的是科学主义传统，正如阿马蒂亚·森在其《伦理学与经济学》所说的“工程学”方法，这也是主流西方经济学所惯用的方法；后者往往表现为规范经济学，其遵循的是人文主义传统，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说的伦理学方法^③，这是新、旧历史学派和新、旧制度学派所遵循的非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当然，这两种方法是交织在一起的，比如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是紧密相联的。所以，单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来看，西方经济学是与其西方文化传统紧密相联的。如果再从西方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定出发来看，西方经济学也具有浓厚的西方文化的特色。现代经济学家们非常强调经济学理论背后的一整套西方文化传统，如个人主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和契约主义等。当代西方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在一定的文化

^① 参见韦森：《当代哲学中的语言转向与经济学的语言反思》，载《河北学刊》，2003（1）。

^② 参见[英]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党国英、刘惠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③ 参见[印]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背景中来研究或构建起一种新经济学。1949年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获得者——肯尼思·博尔丁认为其一贯努力的目标是把各种知识融为一体，在融汇各门学科的情况下重建经济学，这种新经济学不仅要实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经济学中的统一，而且要吸收和应用宗教精神，进行经济行为分析，实现理性分析和价值判断的统一。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亚历山大·西蒙认为其最初的兴趣和成了经济学家之后的兴趣是去了解人们是怎样作出决策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决策的。现在他在心理学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多，都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人类是如何思维的，人类又是如何去解决问题的。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M·布坎南认为其起初进入的是政治哲学而不是经济学本身的研究，其实，他后来所研究的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

中国经济学虽然可以吸取西方经济学的精华，但是毕竟和西方经济学是有区别的，其中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其基础——中西方传统文化之间的区别。西方文化传统塑造出了西方经济学，日本的经济体制及其经济学有其深厚的民族文化特色，中国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也必将深深影响中国经济学。

4.2.1 日本民族文化特色的管理经济学的启发

日本是在其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建立了其市场经济体制及经济学。日本在要建立现代经济体制的时候，也曾有过是否应该完全欧化的问题。1897年就任外相的进上馨就提出过这样的口号“把我国变成欧洲化的帝国，把我国人变成欧洲化的人民”^①。著名思想家和外交家森有礼也提议废除日本文字，使用罗马字母。有的甚至提出要改进日本人种，倡导日本男子和西洋女子结婚。但历史选择了涩泽荣一的《论语加算盘》的道路，也就是使市场经济植根于日本民族文化的道路。一方面，对传统儒家学说既不完全照搬和沿用，也不完全批判和抛弃，而是加以改造、重释和利用；另一方面，对西方经济体制

^① 转引自许火盈：《日本经济体制的民族文化特色给我们的启示》，见《中国高校科学》（第10卷，第2分册），314~317页，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7。

既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也不是完全拒绝和批判，而是有批判地学习和利用。涩泽荣一的思想无疑是指导日本现代化建设的唯一正确的方针，因此，他被誉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最高指导者”。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日本传统文化和日本发展道路又面临危机，人民大众对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丧失了信心，甚至憎恨它们^①，在美军占领时期，又提倡发展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但是，在文化价值观上，西方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并未在日本扎根；在经济体制上，重建的日本经济如战前一样，在经济中，政府的领导是起根本作用”^②；企业管理仍是十足的日本式的管理方式。更值得人们深思的是，日本的现代化过程表明，当经济体制与文化价值观相悖而指望由法律来强制实施这种经济体制时，法律是无能的。例如，日本式的家族制度，在战后已被新宪法和新民法等所否定，但是，源于日本式家族制的团体主义依然继续存在于企业中，甚至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中存在，相反，“战后各届内阁所支持的‘经济计划’并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使它一直毫无问题地得到承认，而人民也一直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进行合作”^③。同样，终身雇佣制的实施也不用法律条文的规定。

特别是，日本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和企业管理更是体现了民族文化特色。

日本经济可称为“行政导向型经济”或“政府主导型经济”。在欧美市场经济国家中，没有哪个政府像日本政府那样，对国民经济实行如此全面的干预。日本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各种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直接地或间接地参与经济活动，调节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全部过程。例如，日本的市场是组织起来的市场，在产业政策方面，保护幼稚工业和扶植重点产业；在金融政策上，为保证企业发展

① 转引自许火盈：《日本经济体制的民族文化特色给我们的启示》，见《中国高校科学》（第10卷，第2分册），314~317页，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7。

② [日]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转引自许火盈：《日本经济体制的民族文化特色给我们的启示》，见《中国高校科学》（第10卷，第2分册），314~317页，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7。

③ [日]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转引自许火盈：《日本经济体制的民族文化特色给我们的启示》，见《中国高校科学》（第10卷，第2分册），314~317页，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7。

所需要的资金，实行低利率政策等，日本调节经济的两手是“看得真切，并且采取极为彻底的形式付诸实施”的。^① 欧美国家的官员和学者甚至把日本经济称为“计划经济”。从西方人的价值观看，很难理解日本的官民协调方式。在西方，没有哪一个政府像日本政府那样周详地关照企业，也没有哪一个西方国家的企业像日本企业那样顺从政府。

这是与日本民族的价值观和伦理观不可分割的。日本人对群体、对企业、对国家的“忠”的观念根深蒂固。他们把对国家的繁荣富强和社会和谐所做的贡献，看得比个人的赚钱更重要，日本经济新闻社编写的《东洋奇迹》一书中称：“政府、经营者、劳动者三方同在一条船上，必须同舟共济，否则就会沉没。”^② “英国的资本主义是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口号下，由‘上帝的看不见的手’指引着前进的，日本则注定要沿着一条完全不同于英国的道路发展”。^③ 韩国金日坤教授认为：儒教秩序仍作为日、韩两国的重要秩序原理，它表现为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方式、将企业视为命运共同体的认识等。^④

日本企业管理的特征是，以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会为支柱。

终身雇佣制就是企业所雇的员工如无特殊原因一般不会在退休前解雇。每年春季企业从学校毕业生中成批招聘新员工，一旦录用，就像结婚一样，是一种终身的义务和权利。雇员在企业里得到职业教育和培训，学习技术，交流经验，工作和职务不很固定，工资和职务由其在企业工作的年限和学历决定。这种做法虽然没有形成法律条文，但对大企业来说，它已是很稳定、很完善的制度。

^① 魏礼群：《国外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模式与借鉴》，转引自许火盈：《日本经济体制的民族文化特色给我们的启示》，见《中国高校科学》（第10卷，第2分册），314~317页，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7。

^② 转引自许火盈：《日本经济体制的民族文化特色给我们的启示》，见《中国高校科学》（第10卷，第2分册）314~317页，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7。

^③ 转引自许火盈：《日本经济体制的民族文化特色给我们的启示》，见《中国高校科学》（第10卷，第2分册）314~317页，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7。

^④ 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转引自许火盈：《日本经济体制的民族文化特色给我们的启示》，见《中国高校科学》（第10卷，第2分册），314~317页，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7。

年功序列工资制度，是日本企业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根据职工的年龄、连续工龄、学历来决定资历工资，一般每年定期提升一次。基本工资以资历工资为主，职工的奖金、退休金都以基本工资为基础。假如职工离开原来的企业到另一个企业工作，其工资就要按在新单位的工作时间重新算起，这样不但基本工资低，而且其他奖金、退休金等都低。职工的职位一般来说每过四年经考核晋升一次。

日本的工会与欧洲各国也不相同。欧美国家工会是跨公司的工会，而日本的工会是企业内的工会。从成员上看，日本工会不仅包括工人，也包括低级经营人员。它代表工人的利益，但更重要的是协调劳资关系，协调经营者与工人的关系。企业的重大决策尽量与工会协商，而工会也多从整个企业利益来考虑问题。劳资双方的分歧少、对立少，日本工会很少罢工。日本工会与其说是代表工人利益与雇主斗争的工具，不如说是协调工人同经营者、所有者关系的机构。

上述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会三根支柱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像三种互补的黏合剂，使企业的股东、经营者、雇员紧紧地凝聚在一起，共同支撑着具有和谐精神的日本经济大厦。企业把员工当成自己的家庭成员，不但关注每个员工的工作，而且过问员工个人生活问题，对每个职工家庭的婚丧嫁娶也要关照，员工也把企业当做自己的家，对企业有很强的归属感，员工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离开原来企业而另求他就，即使在企业遇到如石油冲击那样的危机，员工也能自愿减低工资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建立在这种团队精神基础上的日本企业，其经营方针同欧美国家的企业也大相径庭。欧美企业注重的是股东的利益，日本企业较重视雇员的利益；欧美企业注重收益目标，而日本企业重视市场占有率；欧美企业投资着眼于短期成绩，日本企业则从长期观点来决定投资等。

日本民族文化精神也是企业全面质量管理成功的根基。全面质量管理要求，从设计、采购、生产、检测、保管到出厂，每一个环节的每个成员都必须参与其中。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等所产生的集体负责原则和集体主义的经营方针满足了全面质量管理要求的

条件。这就是日本企业全面质量管理比欧美企业更成功的原因。

此外，日本的所有制方式和决策方式也是团体主义精神的体现。日本企业的资产是法人之间相互持股，这使得法人、企业乃至整个社会都被捆在一起，形成命运共同体。微观决策中的自下而上程序、工人参与形式，宏观决策中的官民协商的审议会制度等，都只有在日本的团体主义精神的文化氛围和价值观念条件下才能形成和存在。

4.2.2 构建有中国文化特色经济学的设想

我国也应在当今文化背景基础上建立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经济学。

虽然在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下，中国人的生活、文化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至于西方的某些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已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认同和接受，但是，中国人世代相传的传统心理、思维方式、伦理道德等依然存在，这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离人们而去，中国人待人处世、对事接物依然是“传统的”，中国人仍然是“中国人”。简要地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性有：第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第二，道德修养和人际协调，在道德规范下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第三，集体本位和天下为公，以集体为本位，尤其当个体与集体发生冲突时主张牺牲前者，这就是天下为公。第四，“天人合一”的意识，强调人与自然界和谐统一。

除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背景之外，我国当今的文化背景还有两个：第一，是西方近代理性文明，其主要构成有：一是理性至上；二是人性至善，肯定人的现实幸福；三是人和自然对立的意识，认识自然、驾驭自然，这是人的权利；四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五是个人主义。第二，是检讨以近代理性文明为核心的19世纪尤其20世纪以来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思潮，其主要特点有：一是检讨、反思理性，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都对当时资本主义中的经济问题、异化问题等进行了理性的反思，20世纪科学技术的异化（如战争、环境污染）使人感到理性的非至上性，于是兴起了非理性主义、人文主义思潮；二是人和自然的协调，大自

然不只是人类征服改造的对象，而且是人类的母体和家园；三是重精神文化价值，人类的未来问题并非科学技术所能全部解决的，当代人类生存危机的背后是人类的精神危机，人类只有在精神层面变换其观念，注意矫正文化发展方向，才能有光明的前途；四是全球意识的培养，世界经济一体化所形成的全球性问题，如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等，也只有全人类合作才能解决，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体化趋势必然会改变人类以往的存在方式。这些文化形态是我国走向现代化所必须面对的背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是在这些文化形态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①

人是文化的产物，现代市场经济文化塑造出的是现代化的人。就其本性来说，市场经济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自主性经济。市场经济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即人有现代人格和个人自我意识，这主要表现在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培养的结合上。人的全面发展是个性完善所趋向的目标，这一点也是马克思所特别强调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和条件。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有赖于个体和社会两方面的共同努力。就个体本身来说，首先应该考虑如何完满地发挥自己的天性和潜能。每个人都应该从人类文明，尤其从能够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化中吸取营养，以实现自身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和审美情趣的全面更新，进而在现实生活中去创造一种真正满足其生命本质需要的生活而充分显示出人生的意义。就社会方面而言，社会应尽最大可能为个体的发展创造条件，使全体公民关心、参与现代化，并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社会权利和义务。

市场经济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道德。斯密认为，市场经济的人格前提是与市场经济中人的道德相适应的。如果追求金钱、名利超出了对道德的追求，那么整个社会就会产生道德的堕落，就会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德国历史学派虽然强调国家干预，虽然对个体的自发性作用有所怀疑，但是，由于仍承认市场机制是基本的调节方式，仍以承认个体的权利和自由作为国家干预的基础，因而仍然尊重竞争、流动、

^① 参见邹广文：《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三重文化背景》，载《东岳论丛》，1993（3）。

自由的作用，这也就在精神上相应地强调民族精神（如道德、公道等）对经济秩序的支持。布坎南在分析市场经济所要求的道德秩序时指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是以“信任”为核心的道德世界。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法权形式的权利，承认自己的平等自由，同时也有责任承认他人的平等自由，每个人只要求在平等的条件下相互尊重和信任。

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其合理部分如刚健有为、互助友爱、注重实际等，有助于现代人格的塑造或人的全面发展；但是，现代人格是与人的个性完善相结合的，而个性意识却是我国传统文化所忽视的。显然，这一不足有赖于现代市场经济文化等来克服或补充。这就是说，我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性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就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不足也有碍于人的个性发展，最终也会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总之，我国当今应立足于传统文化，更要以现代市场经济文化，尤其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构建出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的经济学，这样的市场经济体制或经济学才有中国文化特色。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性也就包含在所构建的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经济学之中。

马克思主义强调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人与人的统一、自然界和社会的统一、科学和人文的统一，所以，马克思主义崇尚自然、经济、社会和人的协调发展，强调利己、利他、利天的统一，这无疑是构建有中国文化特色经济学的指导思想。由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我们可知，处于自然境界，人对自己的行为缺乏清楚的认识，对自我存在的独立性还相当模糊，行为往往顺乎习俗，是一种近似“混沌”意识世界，此时的社会处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处于功利境界，人有自觉意识，且以“自我”、“求利”为中心展开活动，此时的社会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处于道德境界，人已摆脱功利境界，意识到“人是社会的一员”，人已把利己和利

人、个人快乐与最大多数人的幸福统一起来；处于天地境界，人不仅自觉到其是社会的一员，而且是宇宙的一员。人由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到天地境界，即由“顺天”、“利己”、“利人”到“事天”。

与人的境界相对应，经济学也有这四大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人境界。处于自然境界，经济学主要研究如何减轻饥荒、对付灾荒、增加赋税收入等与稀缺经济相关的问题，这是封建社会的短缺经济时期的经济学；处于功利境界，经济学主要研究功利、效用最大化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就是研究微观、宏观层次效用最大化的经济学；处于道德境界，经济学主要研究利己和利人、个人快乐与最大多数人的幸福统一起来的问题，当今的伦理经济学、利他主义经济学、合作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等就是此类经济学；处于天人境界，经济学主要研究人与“天”的关系问题，特别是人与自然界如何协调、“人如何奉天”的问题，即天人合一问题，当今的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佛教经济学等就是此类经济学。所以，当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还处于功利境界，必须上升到道德境界和天人境界。经济学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境界。因此，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经济学应该是顺天、利己、利他、事天的统一。

特别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对于构建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经济学是有启发的。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与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①有人据此将共产主义概括为“完成了的自然·人道主义”，或“天人合一”境界的共产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义。虽然这有争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共产主义是人文精神的实现，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具有朴素性，但是，其中毕竟蕴涵了“天人合其德”、“天为人母”、“人要尊重、保护自然界”等合理思想，这显然要为有中国文化特色经济学所吸收。

黄少安教授的《经济学研究重心的转移与“合作”经济学构想》一文令人颇有启发。首先，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成为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谈敏博士在其博士论文《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中，系统而充分地揭示了法国古典经济学渊源于中国古代哲学及其经济思想，其“自然秩序”观源于中国古代的道家和儒家文化。斯密奠定了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且这种体系至今依然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斯密十分崇拜法国重农学派代表魁奈，“斯密体系”深受魁奈经济学的影响。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哲学和经济思想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之大。其次，他比较了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指出，前者偏重竞争，后者偏重合作。因此，西方经济学主要是竞争的经济学，只要人类经济行为的竞争性还将存在，它就将继续存在。由于人类经济行为及整个经济运行就像一枚硬币，一面是竞争，一面是合作，特别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随着理性程度的提高，人们在不断竞争的同时，“合作”越来越多，或者说“合作”倾向越来越强烈。许多过去通过竞争解决的问题或者看来必须通过竞争才能解决的问题，最后都是“化干戈为玉帛”，即通过合作而解决了。个人与个人之间是如此，企业与企业之间是如此，国家与国家之间是如此。所以，经济学应该由竞争经济学转向以合作为主线的经济学。^①但是，对当今的经济学家而言，还没有完全建立起“合作经济学”。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有有助于这种经济学的形成。

4.2.3 西方经济学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

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经济学虽然直接来源于西方经济学，但是也要

^① 参见黄少安：《经济学研究重心的转移与“合作”经济学的构想》，载《经济研究》，2000（5）。

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合理性。西方经济学如果要克服自己的缺陷的话，则可以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

第一，经济学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西方经济学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吸收营养以提高其境界。

中国儒学一直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孔子认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进而得出“万物皆备于我”的结论。理学（朱熹）认为“天即人，人即天”，心学（陆象山）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所以，儒学认为天与人在本性上没有区别。这样，儒学“仁者，爱人”就演变为自然万物生生不息的生机、生意。这就是说，儒学把仁义理解为“生生”的意思，也就是把仁义贯穿于天地万物之中，天与人之间便是以生命的纽带而联系起来的。“天为父母”的思想就表明了：天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血缘之间的联系。

道学（老子）所谓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表明，天与人之间是以道联系起来的，即“天人”是合一的。实际上，道学认为人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即人达到了长生不老境界，即成“仙”——至人、神人、真人。正因为如此，庄子在其妻死后，鼓盆而歌。其朋友子桑户死时，庄子也高歌唱到：“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尔）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庄子·大宗师》）当庄子要死的时候，他的弟子想厚葬他，庄子反对说：“吾以天地为棺槨，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赇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如此？”（《庄子·列御寇》）弟子们说：“我们是怕乌鸦和鸢子吃你呀！”庄子说：“在上为鸟鸢食，在下为虫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庄子·列御寇》）

通俗地说，天人合一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第二，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也要服从这个规律。第三，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和自然规律是一致的，且人和自然界在本性上是相通的。第四，人生的理想是天人的和谐。笔者认为，这才是

资源配置最优的标准。由于在天人合一境界中，人不仅是“自我”的，也是社会的一员；人不仅是社会的，而且是宇宙的一员，所以，这一境界将人的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种境界相并合，也表明了人已达到了很高的道德境界。没有很高的道德境界，而局限于功利境界，就不可能达到天人和谐，也就不可能达到资源配置最优。这就是说，把天与人统一起来考虑经济和人类未来问题的经济学，才是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境界。

笔者认为，天人合一思想将人降为物，这是对人类的第四次打击。总的来说，人类经受了三次打击：日心说、生物进化论、弗洛伊德等的人本主义。日心说表明：地球及人类不是宇宙的中心，人类由宇宙的中心降了下来。这是对人类的第一次打击，但是，人依然比其他动物高明，这是因为人是由神创造的。生物进化论表明：人是由古猿进化而来的。这就是说，人不是由神创造的，人从被神创造的位置上降了下来。这是对人类的第二次打击，但是，人依然比其他动物聪明，这是因为人是有理性的。弗洛伊德等西方人本主义思潮表明：人也是非理性动物，人和其他动物没有本质区别，人已降为动物。这是对人类的第三次打击。而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将人降为物，人与物在本性上是相通的。这是对人类的最大的打击。实际上，我们可以设想：“人是自然界的主人吗？人定胜天吗？”答案是否定的。其实，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怎么就比自然“高贵”呢？况且我们还认为“自然界是母亲”，即天地是父母。人们通常也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伙伴的关系。

冯友兰先生的高足——涂之光认为，环境哲学就是研究、修炼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的学问。它有两条原则：大平等——万事万物皆平等；致中和——万事万物之间的关系要恰当地处理。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是非常有道理的。可以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或“精髓”。如果理解不了它，也就理解不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基本含义是“肯定自然界与精神的统一”。这是因为儒学仁义贯穿于天与人之间，又是与知、智合一的。

与此相反，西方文化偏重的是“天人相分”，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主人，这主要是工业文明的产物。西方经济学是与工业文明相一致的，奠定在西方文化——主客体相分的基础上，即通常所说的知识论立场上。西方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是难以测量的，也具有“理想”（或被人理解为“乌托邦”）的性质。其原因就在于“天人相分”、主客体相分的知识论立场。但是，当今严重的环境问题，不仅表明了“人是自然界的主人”是片面的，而且表明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是有问题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也表明，工业文明及“天人相分”是有问题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特别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及主客体一体的思想是合理的。这就是说，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应当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中去吸收营养。

第二，经济学由功利境界上升到道德境界意味着西方经济学要从功利境界所强调的竞争经济学转向合作经济学，这无疑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所蕴涵的“人际协调、道德修养”中吸收营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各种各样的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这也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道德修养。

具体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处理的人际关系主要有：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个人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折射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与自我的关系是一个人格塑造的问题，即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理想人格”问题。对此问题的解决主要表现在儒学和道学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儒学认为，理想人格的内容是“仁（德）、志（勇）、知（文）”，即修德、尚志、求知。所谓“仁者不忧”，是指一个人如果自我反省没有内愧于心的事，就不会有任何忧愁和恐惧。所谓“勇者不惧”，是指一个人必须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一个人如果被剥夺独立意志，就会表现为反抗的意识。“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就是这个意思。孟子还说：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孟子·告子上》）所谓“智者不

惑”，是指一个人如果有了智慧、文化，就不会有疑惑的问题了。通常所说的“文过饰非”中“文”与“饰”是同样的意思，都是指“修饰”、“装饰”，也就是指以知识等来培养人、影响人。至于人们通常所说的理想人格中的“美”，是指“仁美”。但，理想人格的主要内容是“仁”。

儒学认为，最高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其次是“仁人”。“圣人”可分为“清者（注重名节高洁）”、“任者（注重责任意识）”、“和者（随和）”、“时者（识时务、择时善世）”。其中，“时”是“清”、“任”、“和”三者的综合。“仁人”是自己想确立的道德自觉，同时，也使他人有所立。这实际上蕴涵着深层的“群体至上原则”。一个人也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能有意义或价值。孔子提出不忧个人的利害得失，而忧天下的利害得失，就反映了人的道德境界。“仁者不忧”更是反映了人的道德自觉境界。

儒学认为，理想人格的成就之路是“三不朽”，即“立德、立言、立功”。“不朽”就是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这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内圣外王”，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具体地说，就是《大学》所说的：“格物——致知——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平天下”。

道学认为，人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要达到这一境界，就必须对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修炼：生与死的自然大限、情与欲的个体障碍、时命的社会束缚。从而，达到“生死齐等看待”、“无情无欲”、“超脱世俗生活”，其中也蕴涵着很高的道德要求。

人与他人的关系，是人伦与群己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处理个人与他人关系的的原则主要有仁、礼、和、义、信。“仁”除了上面所说的“生生”意思之外，还有道德方面的含义，主要指“爱人”、“泛爱众”。“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就是说，人我俱立，人我俱达，即人人和谐。孔子提倡爱人，但又承认等级差别。墨子主张兼爱，称“爱人若爱其身”、“视人之室若其室”（《墨子·兼爱上》），认为应当不分远近亲疏地爱一切人。“礼”是古代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孔子重视礼，说：

不知礼，无已立。”（《论语·尧曰》）又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主张克制自己的言行，使之符合礼，以达到仁的境界。这也就是说，以礼待人、尊敬他人，是仁，也就是爱人的表现。古代的礼具有等级性，但应有的礼节、礼貌还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行为规则。“和”是不同事物相互联系、会聚而得其平衡，也就是多样性的统一。西周末年的史伯说：“以他平他谓之和”（《国语·郑语》），儒学也以和为价值的中心原则。“义”的基本意义是公正，公正是对待他人应有的规范。“信”，诚实、信用，认为朋友之间应当遵守信用。信用是基本的道德规范，是任何时代最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

对于个人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中国古代提倡“忠”。忠的原则是对他人尽心尽责，到了汉代以后，转为对国君尽忠，强调对君主的绝对服从。辛亥革命废除了君主，但是，忠于民族、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是每一个国民的崇高职责。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关心社稷民生、维护民族独立和保护中华文化为基本内容的爱国主义传统，爱国主义被认为是人生的崇高价值。

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面所说的“天人合一”就强调了两者之间的和谐。这里再简单地论述一下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人对自然的态度三种学说。第一，因任自然说。庄子说：“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庄子·德充符》）这就是说，一切要顺乎自然而不用人为地去补充营养。又说：“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庄子·大宗师》）庄子认为，自然界是和谐美好的，应当排斥一切人为，以免破坏自然状态。第二，控制自然说。荀子强调人为的作用，他在《天论》中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蓄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聘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这里的“制天”、“化物”、“理物”，就是主张治理自然，利用万物以提高人类的物质生活。第三，相互协调说。《周易大传·泰卦》说：“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这就是说，主张裁成天地之规律，辅助天地之所宜，以支配万民从事生产，安排生活。《周易大传·系辞上》又

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这就是说，《易经》是包括天地之变化而不超过，普遍容纳百物而不遗漏的。《易传》也有“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即它视宇宙自然界为一生生不息的生命过程，人则是这一过程的实现者与完成者，仁便是这一过程的最高体现。人之所以尊贵，就在于实现天地“生生之德”，使万物各得其所，各遂其生，这便是仁。因此，人与自然界处在有机生命的统一体中。人的主体性就在于“参赞化育”，“为天地立心”。人如果将自己同自然界对立起来，将自己仅仅看作认识主体，将自然界仅仅看成认识对象，那么，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就有问题了，人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也就值得怀疑了。

总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各种各样的处理人际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个人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原则，其中也蕴涵了道德修养的思想。

如上面所说，黄少安教授认为，西方经济学主要是竞争的经济，但是，随着理性程度的提高，“合作”越来越多，所以，经济学应该由竞争经济学转向以合作为主线的经济学。但是，对当今的经济学家而言，还没有完全建立起“合作经济学”。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有助于这种经济学的形成。西方经济学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所蕴涵的“人际协调、道德修养”中吸收营养。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在《教育——财富蕴涵其中》中指出，21世纪教育有四大支柱：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发展。“学会认知”是指学会运用注意力、记忆力和思维能力来学习，也就是说，学会学习。

“学会做事”是指学会有效地应付变化不定的情况，能够胜任、愉快地工作，且能够积极参与对未来的创造。所以，“学会做事”绝非学会某种技能。“学会共同生活”是指要学会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人，要与周围人群友好相处，并从小培养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团结合作的精神。“人与人相处之道——伦理道德”是其核心内容，其目的是要建立良好的“学会发展”是指要促进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即身心、智力、敏感性、交往能力、审美意识、个人责任感、精神价值等方面的发展。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可以发挥其积

极的作用，由此，在市场经济及其理论基础——经济学中也必然有其积极的作用。

第三，经济学由功利境界上升到道德境界意味着西方经济学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所蕴涵的“仁义”中吸收营养。

中国传统文化所蕴涵的“仁义”除了生生不息、伦理道德的意思之外，还有制度（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含义。通常所说的“仁政”就反映了这一点。考察义之本义，当求之于礼。礼起源于原始社会集体生活、生产的习俗，几乎任何活动之先，都要有长老主持举行祭告典礼。此时无论是作为给膳的羊，还是作为祭品的牺牲、腊肉，最后都要由长老按等级平均地切割分施于大家。长老的威仪威望，一方面固然得之于典礼仪式的庄严肃穆，另一方面也得之于其分配祭品的均平得当。在祭礼之后，或会食之中，对给膳之羊如何分配及取与弗取，“我”都要经过从中裁断，度之务使合宜。《说文》就认为，“义”字涉及的是“从我”和“从羊”。《说文段注》中说：“义之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礼容得宜则善矣。”这种合宜的取予行为是美的、善的，因而是义的。推而广之，凡关于财富的分配，以及商品的交换，只要是均平合宜的就是义。在上古，羊不仅是膳品、祭品、礼品，同时也是用以交易的商品，在原始商业活动中，取与弗取，换多换少，也须裁制，务使均平合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易·系辞下》）。《礼记·中庸》中说：“仁者，人也，义者，宜也。”因此，义的本训具有物质的内容与经济的含义，是一个关于财富分配的经济概念。墨子说：“义，利也。”“义”与“利”是相同的。由上可知，在上古时代，“利”必须经过分配后才能取得，即通过“义”才能取到。“义”重在分予，“利”重在取得。

以后，作为分利的“义”就不仅仅局限于分配方式，还涉及到了生产方式，成为分利与生利的一种建制。“义”几乎包括了国计民生的所有方面。在春秋时代，社会急剧地变化，诸侯大夫互相横恣侵夺，“专利”、“专欲”的现象十分普遍，从而导致“藏财而不用”、“委而不分人者，百姓必进自取”（《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的情况发生。采取何种生产方式及分配方式（包括赋役制度），以保障国家

和各阶层利益的问题，便迫切地摆在统治者面前。于是，统治者以及士阶层就提出了如何制定、区分、处理、遵行以义利为基本范畴的生产关系和利益关系的问题。孟子所议论的经界、井田，正是由此而发。田制、经界分配、划分合宜就是“义”。孟子所谓的“仁政”，也是以正经界、均井田、“分田制禄”、“制民之产”为中心内容。农业则征什一之税、商业则“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任人民以时捕鱼采樵等关于生产、分配方式的主张，都是孟子游说诸侯的中心议题。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这就是说，以仁爱为原则的王道仁政所要实现的道路，正是通过制定有关生产与分配的政策或制度，即由“义”来实现的。在分配方式方面，孟子的议论最多，如关于赋税，“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孟子曰：‘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孟子·滕文公下》）《万章》也有“其取诸民不义也”的话，超过制度的税收就是不义，不合规定的俸禄是“不义之禄”，超出规定的居室是“不义之居”。人对财利的取予标准，是看其是否符合有关规定。“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孟子·尽心上》），“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予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孟子·万章》），《离娄下》也有“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的话。“义”在这里无疑是指有关经济制度的规定。

其实，孔子赋予义的实质是“因民之利而利之”（《论语·尧曰》）。郑子产治国为政，“视民如子”，曾作“封洫”，发展农业，以惠政著称于世，孔子称赞他能“惠人”（《论语·宪问》），“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而最好的惠民方式是“惠而不费”（《论语·尧曰》）。“惠而不费”正是所谓的大惠，也就是义。“子曰：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论语·卫灵公》）这就是说，不从根本制度上解决的惠是“小惠”，而只有制定合理的田制与赋役制度，“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才可推动生产的发展。“惠而不费”也就是说大惠和义。所以，孔子所说的“义以为上”（《论语·阳货》），重视的正是国计民生的经济制度。

汉代以后，在义利关系方面，则较多地强调了两者的道德蕴涵，即强调了对经济原则的遵行。董仲舒在著名的《贤良对策》中，针对土地兼并的现实，提出了以限田为中心的经济主张，并成为后世土地政策的样本。其指导原则是“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春秋繁露·制度篇》）。又说：“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可家足。”并认为这是“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对策》三）的。但是，“今弃其度制”，“则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这里的义是指经济制度。循以为行的义，是对制度的遵守。从而，义含有经济与伦理的双重含义。由此，董仲舒关于义利关系的名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可以解释如下：正义自然致其利，明道自然见其功。颜元将此语改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卷一）。

至唐代，作为经济范畴，义已为“制度”一词所取代。制有制裁、分割之意，形而同于利，制度是关于利之度的规定。白居易说：“夫制度者，先王所以下均地财，中立人极，上法天道者也。”（《白居易集·策林二》）他认为：“地之生财有常力，人之用财有常数。如羨于上，则耗于下也，有余于此，则不足于彼也。是以地力之财皆待制度而均也。”（《白居易集·策林二》）这就是说，白居易所谓的制度，就是反映客观经济过程的法度，只不过比礼义更具体些罢了。

在宋代，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实际上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他在《周官新义》中，发挥了《周礼》的经济思想，且作为变法的理论内容，还以“理天下之财”为己任。他在《乞制置三司条制》的奏章中说：“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夫以义理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贿之有无不可以不制，而轻重敛散之权不可以无术。”（《王文公文集》卷三十一）这里的义是理财的原则规定和具体方法，内容涉及转输之均、货贿之制以及敛散之术。他在《议茶法》中说：“国家罢榷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贩，于方今实为便，于古义实为宜。”这里的“义”就是古代相关的经济政策或规定。凡限田、均田、轻徭薄赋的税役制度就是“义”的理财

方式。

宋明理学家并非只谈义利不谈经济，仅宋代理学中大谈经界、屯田、水利、赋役以及兴利除弊等经济措施的就不下数十百家，且所谓的义理的讨论也是以政治经济为指归的。特别是，宋明理学将义利之辨结合或化解为公私之分、理欲之别等。程颐说：“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遗书》卷十七）二程并不一概否定利，只要与义的规定一致的利，就是善的。他们说：“阴为小人，利为不善，不可一概论。夫阴助阳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阳者小人也；夫利和义者善也，其害义者不善也。”（《遗书》卷十九）又，“程子曰：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唯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孟子集注》卷一引）二程批评人不能为善行时说：“只是义理不能胜利欲之心。”（《遗书》卷十九）因而，强调“与众同利”。其所谓与众同利与张载“义，公天下之利”（《正蒙·大易》）的意思相近，公平地分配天下之利，就是义，而个人的利也在其中了。朱熹视“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子大全集·与延平李先生书》），他说：“正其义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朱子语类》卷三十七）“利是那义里面生出来底。凡事处制得合宜，利便随之。”（《朱子语类》卷六十八）朱熹的学生陈淳在申述师说的《义利》一文中，仍把生产、分配方式作为义的首要义项。^①

由上，可以得出结论：中国传统文化所蕴涵的“义利之争”实质上是“见利思义”、“以义生利”，包括取利要合理合法（即生财有道、买卖公平）、以义制利、整体利益至上等含义。

由此，便可知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了。孔子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这就是说，君子所要推行的是“因民之利而利之”的政治经济主张。“君子喻于义”是说，君子的作用就在于其为一个社会制定合理的经济政治制度，且使之在现实中发生作用。其追求的是“大恩”、“大惠”、“大利”、“公利”。“小人喻于

^① 参见陈启智：《儒家义利观新论》，载《东岳论坛》，1993（6）。

利”是说，在现实中，“小人”也就是平民，所关心的只能是自身的利益。其追求的“小恩”、“小惠”、“小利”。“小人怀土”、“小人怀惠”应是孔子对小人利益的肯定。

孔子还认为，在一个制度比较合理的社会里，君子更应当富裕。孔子说，“富而贵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篇》），“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篇》）。但是，孔子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篇》）。孟子认为，如果他自己“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则也不过分。这是因为“利”是他自己通过“义”的途径取得的。

由于西方经济学停留于功利境界，没有上升到道德境界，所以，西方经济学从中国传统文化所蕴涵的“仁义”中吸收营养有助于其发展。制度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冲击便表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制度学派对正统经济学的价值标准持否定的态度，它认为，除了经济价值以外，价值还应包括诸如社会平等、生态平衡、环境舒适，以及美、尊严、生活情趣等。它强调，不能为追求经济价值如增长速度，而牺牲其他的价值，要考虑到经济增长的代价。由于人们的价值标准的差异和目标的不同，所以国家要担负起协调目标的责任。如果一个社会不符合与其制度相适应的价值标准，那么，它是不能生存下去的。这就表明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必须要提高其境界。阿马蒂亚·森对现代经济学进行了反思，认为现代经济学越来越走向了绝路，而要克服这一缺陷，就必须要提高境界，和伦理学结合起来。

第四，经济学的天人合一和道德境界意味着西方经济学还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所蕴涵的“中庸”思想中吸收营养。

“中庸”思想的合理性就在于人在处理“人和自然关系”时，一定要恰当、适当，切不可过度。这实际上意味着要利天（即利自然界）。“中庸”的本意是无“不及”，也无“过”，处理的是“不及与过”的矛盾，实际上是恰当、适度的意思。“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不偏左、不偏右。不过大、不过小”。比如，在炒菜时，放盐适度就是“中庸”的要求。放盐太多，则咸；放盐太少，则淡。这都

违背了“中庸”。从中也可以看出，要达到“中庸”的要求，需要人的不断修炼。炒菜不经过多次实践（或反复的修炼），就不可能达到“中庸”所要求的盐的适度。所以，“中庸”对做人、做事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人一旦达到了“中庸”的要求，就表明人已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例如，正如上面所说的，涂之光认为，通过“致中和”等原则可以修炼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人确实是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的许许多多实践或修炼中，才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是相互平等、尊重和友好的，即天人合一的关系。没有这许许多多实践或修炼，人就不可能达到“中庸”的要求，也就不可能达到天人合一。所以，西方经济学要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就必须通过“中庸”。

其实，在西方经济学中，有不少理论体现着“中庸”思想。效用递减规律就是如此，比如，在吃馒头时，吃饱之前效用一直是递增的，但在吃饱之后，效用一直是递减的，这体现了“中庸”的恰当、适度的要求。作为经济学两大主题之一的资源配置问题，以一条生产可能性边界为“中庸”，“不及”则是资源闲置和资源的低效利用，“过之”则是现有资源无法达到的，此时如果进行生产就必定造成资源的掠夺性利用。所以，只有生产可能性边界才是对社会现有资源充分而适度的利用。微观经济学中的生产均衡也是一种“中庸”境界，无论是局部均衡还是一般均衡，均衡点都是无“不及”与无“过”之点，在该点既不会出现供不应求也不会出现供过于求现象，供给和需求在此点合于中。消费者也是如此，只有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相切的点，才是效用最大化的“中庸”之点。若“不及”该点，即预算线以内的点则表示消费者的收入没有全部花光，其效用还可以进一步提高；“过”该点，即预算线以外的点则表示消费者在预算的约束下无法达到的效用。此外，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规模经济中也都蕴涵着“中庸”之道。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中心问题是国民产出决定理论，而在国民产出趋向的均衡点，总需求等于总供给，这体现的也是“中庸”。供应学派的经济学家拉弗曾提供了分析税率与政府税收总额之间关系的一种工具，即著名的拉弗曲线。在该曲线的初始阶段，随着税率的提高，政府税收总额增加，但是，当税率达到某一水平时，继

续提高税率，政府的税收总额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这一税率就是一个国家最适宜的税率水平，这一点同样是无“不及”与无“过”的平衡点，是“中庸”。当然，中庸思想也有被人误解的地方以及其自身的缺陷。如现在不少人认为中庸是折中、调和的意思，这是对中庸的误解。在封建社会里，“中庸之道”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造成了中国人以保守退让为美德的现实，因而有其缺陷性。

第五，中国传统文化含有“自由经济思想”，也曾成为西方现代经济学中的中国渊源。

市场经济的本质特点是自由经济，即按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自由发展、自我调节的经济运转方式。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便是自由放任。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这样论述其“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当每个人在追求自利的目标时，他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实现公共的最好福利。在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里，政府对于自由竞争的任何干预几乎都肯定是有害的。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也是西方经济学界从亚当·斯密直到20世纪初期以前所推崇的经济运作模式。然而，20世纪30年代，一场持久而严重的经济危机向以自由经济为核心思想的古典经济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几乎宣告了古典经济理论的失败。凯恩斯主义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为消除市场经济盲目发展所造成的经济危机，提出了国家要顺应市场规律，采取适当的干预政策，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实施介于自由放任与高度管制的经济体制之间的现代发展模式，形成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自由经济思想，可以从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明代的丘浚、宋代的叶适、汉代的司马迁等儒家人物，一直追溯到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者。他们倡导自由经济论，认为国家对经济管理的要义在于顺应经济发展的自然，不主张过多干预。孔孟的自由经济思想与先秦时期的法家思想相对立，法家强调采取国家干预模式，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控制越严越好。孔子所主张的自由经济体制，是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活动减至最小，听凭人民在经济活动中自由而充分地发挥其聪明才智。他的名言“天何言哉？四时行

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就是他心目中的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作用的写照。孔子强调“惠而不费”（《论语·尧曰》），即民众获得物质利益，并由此调动其生产积极性，而政府又没有为此花费成本，这实际上是管理经济中的成本收益原则。但如何能做到“惠而不费”呢？孔子的回答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论语·尧曰》）孔子主张让民众自由地从事对其有利的经济活动，从中得到好处，政府不必进行干预。孟子不但继承了孔子的自由经济思想，还有所发展，表现在他倡导法乎自然，重视个人产权、利益与维护竞争上。

说到自由经济思想，不能不提的是道家文化的创始人老子的“道法自然”和“无为而治”的思想。虽然老子的思想主要是政治主张，但对经济生活也是有意义的。“道法自然”的“道”既具有规律、法则（包括自然法则、社会法则、人生法则）的含义，也具有万物本原的含义。“自然”是指顺其自然。由“道法自然”推演而来的是“无为而治”的主张，“无为”并不是消极等待，而是一种立身处世的态度和方式，是一种崇高的境界，是尊重客观规律、顺应客观规律，不妄为，不妄求，“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道德经》），所以，老子是强烈反对国家干预的，他说，“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也就是说，谁去干预，谁就会失败，由此看来，“无为而治”似乎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如出一辙。但是，老子并不认为人在客观存在的规律面前只能听天由命，并不反对人们自觉的有意识的努力，他让人们去“为”，老子说，“为无为，则无不治”（《道德经》）。可见，他并不主张完全的放任自流，而是在尊重客观规律基础上有所为，反对的是无视客观规律的横加干涉，只有这样才会“无不治”，这也符合老子有无相生的辩证统一思想，即“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儒家传统文化中的自由经济思想比西方自由经济思想的产生要早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盛洪博士曾提出：儒家的自由经济思想，在近代通过西方传教士输回到了欧洲，并影响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先驱和代表人物魁奈与亚当·斯密，从而成为西方现代经济学中

的中国渊源。如前所说，谈敏博士在其博士论文《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中，也系统而充分地揭示了这一点。

4.2.4 中国传统哲学的意象语言与经济学

既然科学语言与人文语言都是经济学所必需的，而仅用科学语言或人文语言都不能全面地把握经济的本质，那么，有没有一种语言能够把科学语言与人文语言融合起来，从而全面地把握经济的本质呢？依我看来，中国传统哲学中意象语言有可能达到这一点。

意象语言是一种介于概念（或科学）语言与诗性（或人文）语言之间的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有以下几个特点：（1）具体与抽象的统一。对西方语言传统来说，语言的具体性与语言的抽象性是“分家”的：哲学与科学领域使用的是抽象性的概念语言，文学艺术使用的是具体的形象语言。但对中国传统哲学来说，它的语言是具体与抽象的统一。比如说，中国传统哲学中“天”既指可被人们感觉到的自然意义的“天”，又指一个异常抽象、不易捉摸的抽象实体，它类似于西方宗教中的“上帝”。“气”既是物理意义上的“气体”，又是构成一切事物，包括人在内的元素，“通下一气耳”。中国哲学认为，只有使用这种既具体又抽象的术语、名词，才能把握形而上的“实体”。（2）自然与自由的统一，也即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对于西方哲学来说，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是分离的，这就是上面所说的科学（或知识）与人文（或价值）之间的差异。由于固守知识论立场，所以，西方哲学家们往往倾向于对人文作逻辑上的语义分析，即把人文转换为关于事实性的语言。但是，一旦对人文作出了逻辑分析，人文也就没有意义了。而中国哲学中的名词术语则不然，它们既体现了事实界的自然律，又体现了价值界的自由律。如宋明理学中的“诚”，原来的意思是指“天道”，但，事实上，还指“人道”，成为评价“人”的一个尺度。“仁”既是自然界之“天道”，也是对人的一种道德规范与要求。（3）现实与理想的统一。这包括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但是其含义较广。价值可

以在事实层面上实现，但理想相对于现实却永远是理想，始终包含着对于现实世界的一种超越性。比如，儒学对人性的理解就是如此。虽然儒学强调“人性善”，且认为“性善”在人的现实层面上可以找到根据，但是，真正的人性的完善实现却永远是一个理想，或者说是一个不断修养的过程。因此，“性”对于儒学来说永远是两重性的统一：一方面它在现实的人身上有其实现的根据，另一方面却永远是一个理想和追求的目标。这在宋明理学中被称为“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天地之性”是就人性的理想层面而言的，它总是善的；“气质之性”是就人性的现实层面而言的，它是可善可恶的。就现实中的人的人性而言，它总是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统一。与“性”有密切联系的“理”也是如此。“理”的本意是事物之条理、规律、现象之本质，乃至人的行为之准则。对宋明理学来说，“理”虽然常常是“天理”，但是，“理”也总同时兼有客观事物之本质、规律与对客观事物规范之意，即包括了客观世界秩序中的“实然”与“应然”的统一。同样，对中国哲学来说，宇宙既是一个事实的世界，也是一个道德与价值意义的世界。既然是道德与意义的世界，宇宙就总是有理想与超越现实的一面。这就是说，中国哲学中的世界图景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理想主义的。

那么，中国传统哲学中意象语言能否把握指涉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形而上学？老子就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认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就是说，道一旦用语言说出来，就不再是原来的道；名一旦用语言说出来，就不再是原来的名。到了魏晋时代，这一问题就演变为“言意之辨”，即“言不尽意”派与“言可尽意”派之争论。“言意之辨”实际上表明：一方面对形而上学的把握离不开语言，另一方面对形而上学的把握又必须超越语言。到了宋明理学时期，“言意之辨”又演变为“道问学”与“尊德性”。对于道问学来说，它强调“言可尽意”，认为，读儒学的经典必不可少，且必须深入钻读，求得一丝不苟的了解。所以，道问学在方法上接近于汉代人的训诂之学。道问学在这一点上遭到了尊德性派的批评。“尊德性”认为，通过致良知而直接能够把握形而上学。其实，在道问学

中，常常融入了尊德性的方法，反过来，尊德性也要以道问学为基础。它们之间的对立直到清代才得以消除。清儒强调把道问学之“博”与尊德性之“约”结合起来。

总之，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人对形而上学的把握运用的是一种意象语言，而这种语言的“义理”往往来源于古代的经典。因此，所谓用意象语言来把握形而上学，也就是如何运用古代经典的语言来重新对形而上学加以言说的问题。一方面，对经典文献的了解必须是求其“义”、求其“通”，绝非仅仅停留在字面意义上的浅层次的了解；另一方面，在对经典文献求“通”、求“义”的过程中，除了必须具备文字、文献和历史性的知识之外，还必须融入理解者的性情与人格。

这里，再简单论述一下我国现代思想家金岳霖先生的观点。他在《论道》一书中，不仅用这种意象语言尝试了对形而上学的把握，而且提到了元学与知识论的区别。他认为，研究知识论“我”可以站在知识的对象范围之外，“我”可以暂时忘记“我”是人。凡问题直接涉及人的“我”可以用冷静的态度去研究它，片面地忘记“我”是人。知识论的裁判者是理智。而研究元学则不然，“我”虽可以忘记“我”是人，但“我”不能忘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我”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求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的结果上要求情感上的满足。元学的裁判者是整个人。从中可以看出，金岳霖先生的元学与知识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上面所说的“言不尽意”派与“言可尽意”派、“道问学”与“尊德性”之间的关系。^①

中国传统哲学中意象语言对关于人生意义与价值的形而上学的把握，给经济学以什么启示呢？经济学也应当用意象语言来表述，或者说应该用概念语言与诗性语言、“道问学”与“尊德性”方法、知识论与元学立场，也即用科学与人文语言来理解、解释经济学。由于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有效用、需求、供给、帕累托最优等，所以，有必要用意象语言对它们进行表述。效用是指商品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

^① 参见胡伟希：《从中国哲学看意象语言把握形而上学何以可能》，见《21世纪中国哲学走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这种能力不是商品的客观属性，而是人们对商品的主观评价。消费者在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与消费者收入为已知的条件下，总是根据自己的愿望、偏好、欲望等来选择某一商品。消费者宁愿选择 A 商品而不是 B 商品，这是因为在消费者心目中 A 商品的效用大于 B 商品的效用，这纯粹是消费者的一种主观上的心理感觉。所以，既可以用科学的语言来理解、解释效用，也可以从人文的角度来理解、解释效用。绝不能仅仅从科学的角度来理解、解释效用，比如说，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就是如此。事实上，人们也确实无法对个人之间的效用水平进行纯科学的比较，经济学家也无法量化人们的快乐或痛苦。需求是指在某一时间内，消费者在一定价格条件下对商品的需要。这种需要是有效的、现实的需要。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购买欲望和购买能力。显然，也必须从科学和人文角度来理解、解释需求。供给是指在某一时间内，生产者在一定的价格条件下愿意并可能出售的产品数量。这种供给是指有效的供给。它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出售的愿望和供应的能力。所以，仅仅从科学的角度来理解、解释供给，是肯定不对的。

帕累托最优状态标准是：如果至少有一个人认为 A 优于 B，而没有人认为 A 劣于 B，则认为从社会的观点看也有 A 优于 B。利用帕累托最优状态标准，经济学家对资源配置状态的任意变化可以作出“好”与“坏”的判断：如果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的变化使得至少一个人的状态变好，而没有使任何人的状态变坏，则认为这种资源配置状态的变化是“好”的；否则，则认为是“坏”的。以帕累托最优状态标准来衡量为“好”的状态改变，通常被称为帕累托改进。由此，所谓“最优”资源配置，是指，如果对于某种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所有的帕累托改进均不存在，即在该状态上，任意改变都不可能使至少一个人的状况变好而又不使任何人的状况变坏，则称这种资源配置状态为帕累托最优状态。帕累托最优状态又被称为经济效率。显然，仅从经济角度而不从价值角度来理解、解释帕累托最优状态标准，肯定是片面的。其实，在前面已经论述过，帕累托最优状态标准本身就有问题。依笔者看来，帕累托最优状态标准更主要是一个价值标准，而不是一个经济标准。

第 5 章 结 论

“经济学是什么”一直是经济学哲学的根本问题。经济学中几乎所有的争论、困惑和危机都会上升到这一问题及对其的回答上。对此问题的回答最终会体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这两大思潮，尤其是前者。这就是说，应该从这两大文化背景来理解经济学。

从两大文化思潮的对立、影响，可以得出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以自己的观点来努力改造对方的做法最终都失败了，这表明科学与人文是有区别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这表明科学与人文又是相互联系的。科学与人文的相对确定性的区别表现在：科学多是以外物作为研究对象，而人文多是以价值作为研究对象；科学主要以实证方法为主，而人文主要以解释学方法为主；科学的认识成果一般具有共识性，而人文的结论通常是个别性的；科学往往要根据实验或实践来判别，而人文往往很难通过设计实验的方法来进行判别。

由上，笔者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

(1) 经济学是科学特质与人文特质的统一。

社会科学具有科学特质与人文特质。因为经济学是社会科学，所以，经济学具有科学的特质与人文的特质。如果仅仅将经济学视为科学，就是科学主义的理解，必将使经济学缺乏人文性。如果仅仅将经济学视为人文，就是人文主义理解，必将使经济学缺乏科学性。

不少学者乃至“大家”都有与此相近的观点。盛洪认为，经济学就其最高境界来说，不是科学，而是人文，他呼吁“经济学精

神”。汪丁丁认为经济学介于哲学与科学之间，并直言经济学是“作为人文精神的经济学”。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处于科学与人文之间。

虽然西方经济学有人文追求，但是，这从属于科学追求，且局限于功利追求。所以，西方经济学仍然缺乏合理的人文追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有科学追求，又有人文追求，并且强调通过科学来实现人文追求。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更具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2) 经济学是“两种文化”——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新途径。

这是第一点的逻辑推论。

如在导论中所说，主张“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途径很多，如萨顿所认为的“科学史”、波兰尼所认为的“意会认知”理论、马斯洛所认为的“人本心理学”、罗蒂所主张的“将科学归于人文学之中”、费耶阿本德所崇尚的“科学与迷信、巫术等平权”、格里芬所主张的“整体有机论”等等。但笔者崇尚的是“经济学”。经济学当今被人们称为“显学”，理应为“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最有效的途径”。

(3) 经济学不仅要应用科学方法，而且要应用人文方法。

这是由第一点、第二点必然得出的结论。

由于经济学应用科学方法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在这里有必要简介一下人文方法，以期在经济学中被广泛地利用。由于人文学科是以人文世界为研究对象的，而人文世界实际上是人的精神世界。所以，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对“意义”的理解方法，而不是像研究自然界那样去进行实证分析。人文方法具有人化的、感悟的、形象的、生动的特点，而缺乏科学那种客观性、普遍性、规律性等特点。人文方法是一种“人化”的方法。正是人使得世界从“无意义”变得“有意义”。正如没有人类，鲜花无所谓可爱，杂草无所谓可憎一样。人文方法尽管并不绝对地排斥科学方法，但是，它强烈地带有诗意般的感悟特点。由于人本身的复杂性，所以，人对人文世界的认识就难以确切一致，人文就具有多样性、丰富性。

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人文学科必须遵循的历史学科的原则和

方法。

历史学科的原则和方法归结起来有三个方面：历史主义的原则、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人学或人道主义的方法。

历史主义原则认为一切事物都不是永恒、绝对的存在，而是历史的暂时产物，也必将在历史中消亡。经济学的德国历史学派则在某些方面不自觉地运用了这一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彻底结束了任何关于永恒的幻想。在现代，历史主义原则成为一切有生命力的学术传统的主流共识。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实践哲学，从库恩到劳丹的现代科学哲学，以及新制度经济学中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都自觉不自觉地坚持了历史主义原则。这一原则表明：第一，不存在抽象的、绝对的、超时空而普遍适用的原理、观念、范畴或公式；第二，任何一门科学，尤其是人文学科都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的，它本身作为一种历史的范式将随那个历史阶段或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历史主义原则决定了历史学科的研究方法必然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逻辑是对历史的反映，因此，思维中的逻辑必须从抽象上升为具体，与历史事实的内容相一致。历史的把握需要逻辑的方法，而历史规定着逻辑抽象的限度，不能以逻辑裁剪历史。当然，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指发展趋势上的统一，绝非一一对应式的统一，这是因为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和曲折地前进的，而逻辑不可能处处跟随它，逻辑的东西是“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逻辑对历史的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①因此，任何科学的观念、范畴都应当是描述与抽象、现实与理想的统一，而历史事实则是其最终的合法性源泉。

作为区分于自然科学的历史学科蕴涵着自己独特的方法，那就是人学或人道主义的方法。历史与自然的区别在于历史是人创造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①。这就是说，历史的发展就是人的发展。这同时也意味着，人没有固定不变的本性，人和人的本性就是在历史活动中逐渐生成的。所以，历史学科就是广义的人学，反之，一切人文学科都是历史学科。即使是自然，也是为人而存在的自然，有了人类以后，自然史就与人类史相互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乃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②。历史学科的人学特色表明：第一，历史学科研究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物，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且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着的人和人的关系。对于那些表面上看来是研究物的科学，就必须透过物和物的关系看到人和人的关系。恩格斯说：“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③第二，历史学科的出发点和目的都在于人的存在与更好的存在，最终都是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否则，就会导致人的异化、自由的丧失、危机的产生。

（4）构建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经济学。

这是由上面观点必然得出的结论。

既然经济学具有人文特质，经济学也就必然具有文化特色。西方经济学就具有西方文化特色，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契约主义。日本也是在其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建立了其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经济学。所以，我国也应构建出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经济学。就其现实性来说，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参照19—20世纪的西方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每一种文化的合理思想，这样，才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构建出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经济学。

所以，中国经济学在追求科学化同时，还必须体现人文关怀。

（5）西方经济学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丰富的营养。

西方经济学要从功利境界提高到道德境界、天人合一境界，当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还应当要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天人合一”思想、“人际协调、道德修养”思想、“义利”思想、“中庸”思想、“自由经济”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意象语言。进而，当今西方经济学才能克服其基本上仍然停留在科学与功利境界的缺陷性。中国传统哲学中意象语言是一种介于概念（或科学）语言与诗性（或人文）语言之间的一种语言。所以，中国传统哲学中意象语言有可能全面地把握经济学的本质。

主要参考文献

主要中文参考文献

1. 廖士祥《经济学方法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2. 狄仁昆《走向大科学的经济学——经济学的哲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3. 韩永进《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科学哲学方法论与经济学方法论变革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4. 林德宏、步惜渔:《经济哲学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5. 张雄《经济哲学——从历史哲学向经济哲学的跨越》,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6. 张雄、陈章亮主编《经济哲学——经济理念与市场智慧》,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7. 张雄:《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世界》,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
8. 余源培、荆忠《寻找新的学苑——经济哲学成为新的学科生长点》,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9. 马涛《理性的崇拜与缺憾——经济认识论批判》,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10.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11. 唐正东《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诠释》,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2. 黄家瑶《经济哲学导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3. 陶永谊《旷日持久的论战——经济学的方法论之争》,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14. 陈璋、陈国栋、刘霞辉《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证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5. 刘诗白《构建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16. 于光远、董辅初《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17. 陈宪《经济学方法论通览》,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18. 许崇正《伦理经济学再论——经济选择与人的发展》,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19. 王玉珍《道德秩序的经济学分析——对利他行为的一个分析角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20. 汪丁丁《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21. 张旭《20世纪经济学解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2. 张旭《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与发展》,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23. 杨占生《经济学跨世纪批判》,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24. 黄河《经济科学学》,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
25. 刘永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26. 刘永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史》,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27. 刘永佶《劳动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28. 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1992。

29. 杨欢进《经济学向何处去》,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1。

30. 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

31. 陈惠雄:《人本经济学原理》,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32. [澳]黄有光:《经济与快乐》,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33. 胡祖光、朱明伟:《东方管理学导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34. 陈彩虹《经济学的视野》,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35. 盛洪《经济学精神》,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

36. 王询:《文化传统与经济组织》,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37. 韦森《难得糊涂的经济学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38. 韦森:《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39. 韦森《文化与制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0. 韦森《经济学如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1. [英]杰弗里·利奇《语义学》,李瑞华等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

42. [英]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党国英、刘惠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43. [英]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4. [印]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5.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黎明星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46. [美]唐·埃恩里奇《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朱纲译,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47.[英]马克·布劳格、罗杰·E. 巴克豪斯《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张大宝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48.[美]劳伦斯·A. 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王铁生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49.[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梁小民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50.[爱尔兰]托马斯·A. 博伊兰、帕斯卡尔·F. 奥戈尔《经济学方法论新论》,夏业良主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51.[美]马克·斯考森、肯那·泰勒《经济学的困惑与悖论》,吴汉洪、苏晚因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52.[德]威廉·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朱绍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53.[美]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上、下册),胡雪峰、武玉宁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54.[英]G. M. 霍奇逊《现代制度经济学宣言》,向以斌译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55.[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6.[英]安东尼·D. 道顿《经济学的两面性》,刘立、姜浩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57.[美]迈克尔·佩雷曼《经济学的终结》,石磊、吴小英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58.[英]特伦斯·W. 哈奇森《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李小弥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59.[美]阿尔弗雷德·S. 艾克纳《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苏通、康以同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60.[美]B. 约瑟夫·派恩、詹姆斯·H. 吉摩《体验经济》,夏业良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61.[美]加里·S. 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陈琪

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62.[美]小罗伯特·B.埃克伦德、罗伯特·F.赫伯特《经济理论和方法史》杨玉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63.[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64.[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二卷,杨敬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65.[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66.[美]保罗·安东尼·萨缪尔逊《经济分析基础》,甘华鸣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67.[英]F.A.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68.[美]詹姆斯·M.布坎南《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罗根基、雷家瑞译,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

69.[美]黛尔德拉·迈克洛斯基《经济学的花言巧语》,石磊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70.[美]麦克洛斯基等《社会科学的措辞》,许宝强等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71.[美]马克·A.卢兹、肯尼思·勒克斯《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挑战》,王立宇等译,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72.[美]马克·A.卢兹《经济学的人本化溯源与发展》,王立宇等译,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73.冯友兰《觉解人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74.陈战国:《冯友兰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75.孙正聿《哲学通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

76.孙正聿:《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

77.杨适:《人的解放——重读马克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

社,1996。

78. 陆杰荣《哲学境界》,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

79. 黄克剑《心蕴——一种对西方哲学的读解》,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80. 黄瑞雄《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科学人文主义思潮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81. 肖峰:《论科学与人文的当代融通》,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82. 朱红文《社会科学方法》,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83. 胡平《呼唤新时代的商人》,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

84. 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85. 胡伟希《从中国哲学看意象语言把握形而上学何以可能》,见《21世纪中国哲学走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86. 洪汉鼎《理解与解释》,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87. 孙慕天《新的边疆:从经济学哲学到科学哲学》,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2)。

88. 杨玉成《西方经济学中的“范式”和“研究纲领”——科学哲学影响经济学的典型范例》,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12)。

89. 杨建飞《逻辑实证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方法论关联》,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7)。

90. 韩永进《波普尔与二十世纪西方经济学方法论》,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4)。

91. 蔡仲《现代经济学方法论中的证伪主义》,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11)。

92. 李伯聪《略论经济学哲学中的波普后方法论》,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6)。

93. 杨渝玲《试论西方科学哲学介入经济学哲学》,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5)。

94. 杨建飞《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个在竞争和反常中不断进步的研究纲领》,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5)。

95. 杨建飞《科学哲学对西方经济学思想发展演化的影响》,载《哲学动态》2002(1)。
96. 韩永进《波普尔哲学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影响》,载《哲学动态》,1999(5)。
97. 桂起权:《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经济学应用》,载《经济学家》,1999(6)。
98. 黄剑平《哲学与经济学的共生互助——拉卡托斯之科学哲学对当代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载《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B2)2001(12)。
99. 黄家瑶《论科学哲学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载《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B2)2001(9)。
100. 陈志生《经济哲学与科学哲学》,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0(3)。
101. 韩德强《经济学是什么》,载《读书》2001(2)。
102. 曾祥云《经济哲学:哲学与经济学的联盟——“全国经济哲学高级研讨会”综述》,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5)。
103. 狄仁昆《西方经济学理论检验问题的哲学分析》,载《江海学刊》,1997(6)。
104. 狄仁昆《经济知识增长的模式》,载《江苏社会科学》,1998(1)。
105. 狄仁昆《经济理论的性质和结构——知识观的对立及“走向大科学”的当代经济学》,载《社会科学》,1999(12)。
106. 杨玉生《“穆勒问题”和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1(9)。
107. 杨玉成《经济学中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1(1)。
108. 谢林平:《论西方经济学哲学的形式与发展》,载《岭南学刊》2001(3)。
109. 秦朵《科学哲学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载《经济研究》,1988(7)。
110. 丁文锋《评中国经济学方法论中的现象》,载《经济研究》,

1996(5)。

111. 韦森《当代哲学中的语言转向与经济学的语言反思》,载《河北学刊》2003(1)。

112. 陈彩虹《道德与功利——现代经济学的一种理解和现代经济学面临的选择》,载《东南学术》2001(6)。

113. 蔺子荣《论经济学的现代化与科学化》,载《文史哲》2001(1)。

114. 张旭昆《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区别》,载《社会科学》,1994(8)。

115. 张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与方法论特征》,载《经济科学》,1998(5)。

116. 胡洪力、胡昊《试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哲学传统》,载《郑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

117. 杨立雄《“个体主义”抑或“整体主义”》,载《经济学家》,2000(1)。

118. 张理智《当代西方经济学批判》,载《江海学刊》,1999(4)。

119. 程祖瑞《数学化,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载《经济经纬》2001(6)。

120. 孙勇《从经济学派理论假设的变迁中看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载《江苏社会科学》2002(3)。

121. 郑秉文《20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回眸》,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3)。

122. 丁文锋《经济学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载《当代经济科学》,1996(3)。

123. 赵凌云《“裸体的皇帝”: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载《开放时代》,1998(6)。

124. 蔡荣鑫《现代经济学的困扰》,载《经济学消息报》,1999-07-21。

125. 沈湘平《作为历史科学的经济学——经济学危机的哲学透视》,载《经济评论》2002(2)。

126. 汪丁丁《数学与经济学的精神》,载《经济学消息报》,第220期。

127. 伍装、张薰华《现代经济学中的两种价值判断理论》,载《经济学家》,1999(5)。
128. 庄宗明、杨旭东:《“经济人假说”:争论与超越》,载《学术月刊》2001(2)。
129. 叶航《经济学视野中的人类道德——现状·假说·模型》,载《学术月刊》2001(2)。
130. 蔺子荣、王益民《中国传统文化与东方伦理型市场经济》,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1)。
131. 杨春学《利他主义经济学的追求》,载《经济研究》2001(4)。
132. 罗卫东《经济学与道德——对经济学某些倾向的反思》,载《浙江学刊》2001(12)。
133. 许崇正《人的全面发展理论:马克思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超越》,载《经济学动态》2001(12)。
134. 蔡志明《经济学中的实验方法与技术——兼论实验经济学的发展》,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3)。
135. 潘天群《经济学何以预测》,载《经济学家》2001(5)。
136. 朱汉民《略论西方经济学伦理道德观的演变与承继》,载《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5)。
137. 陈惠雄《人的研究:经济学研究的新层次》,载《财经论丛》,1997(6)。
138. 陈惠雄《经济学的境界》,载《经济学家》,1999(2)。
139. 黄少安《经济学研究重心的转移与“合作”经济学的构想》,载《经济研究》2000(5)。
140. 潘家华《人文发展分析的概念构架与经验数据——以对碳排放空间的需求为例》,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6)。
141. 张建伟《现实主义、制度主义与中国经济学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4)。
142. 沈玉龙:《论作为价值学的经济学》,载《学术研究》,1996(12)。
143. 沈莹《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深层关系刍议》,载《当代经济

科学》,1996(3)。

144. 徐志远《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载《广东社会科学》2001(6)。

145. 王友洛《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载《中州学刊》2001(6)。

146. 王锐生《论人的两种全面发展》(对话),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

147. 丛大川《马克思的实践人道主义哲学的心路历程》,载《青海社会科学》,1999(3)。

148. 丰子义《关于人文精神批判与建设的几个问题》,载《青海社会科学》,1999(3)。

149. 张之沧:《鉴定科学与非科学的原则和方法》,载《学海》,1999(1)。

150. 吴国林:《主体间性与客观性》,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6)。

151. 伍光良《科学技术何以成为人本主义的杀手》,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6)。

152. 张功耀《哲学是什么?哲学家应该做些什么?》,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1)。

153. 江天骥:《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载《哲学研究》,1996(11)。

154. 曹志平、邓丹云:《论科学主义的本质》,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4)。

155. 孙宏安《对“数学是什么”的哲学思考》,载《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3)。

156. 韩骏《证实和证伪》,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5)。

157. 胡伟希《从中国哲学看意象语言把握形而上学何以可能》,见《21世纪中国哲学走向》,商务印书馆,2003。

158. 方立天:《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价值》,载《光明日报》,1999-10-22。

159. 陈启智《儒家义利观新论》,载《东岳论坛》,1993(6)。

主要英文参考文献

1. J. C. Glass and W. Johnson *Metaphysics ; MSRP and Economics* ,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39. 1988.
2. Roger E. Backhouse , ' An Empirical Philosophy of Economic Theory ' ,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46. 1995.
3. Donald Gillies ; ' Keynes as a Methodologist ' ,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39. 1988.
4. Hans Lind ; ' A Note on Fundamental Theory and Idealizations in Economics and Physics ' ,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 44. 1993.
5. D. Wade Hands , ' Metaphysics , Economics and Progress : A Comment on Glass and Johnson ' ,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43. 1992.
6. Gerard Radnitzky ; '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 ,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38. 1987.
7. Tony Lawson , ' The Context of Prediction (and the Paradox of Confirmation) ' ,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36. 1985.
8. Douglas W. Hands , ' Discussion : What Economics Is Not : An Economist 's Response To Rosenberg ' , Philosophy of Science 51. 1984.
9. Alexander Rosenberg ; ' Discussion : What Rosenberg 's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Is Not ' , Philosophy of Science 53. 1986.
10. Neil De Marchi ; ' Discussion : Mill 's Unrevised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 A Comment on Hausman ' , Philosophy of Science 53. 1986.
11. Daniel M Hausman ; ' John Stuart Mill 's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 , Philosophy of Science 48. 1981.
12. Samuelson , P. A ; ' Problem of Methodology —Discussion ' ,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 , vol. 53 ,May ,1963.

13. Ernest Nagel , ' Assumptions in Economic Theory ' ,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 ,May ,1963.

14. Alexander Rosenberg ' If Economics Isn 't Science , What is it ? ' , In Daniel M Hausman , The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5. Boger E. Backhouse , 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Contributions , Chippenham : Routledge /Thoennes Press ,1997.

16. Daniel M Hausman , The Inexact and Separate Science of Economics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7. Caldwell , Bruce J. , Beyond Positivism , George Allen & Unwin Australia , 1982.

18. Daniel M Hausman , Essays on Philosophy and Economic Methodology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9. Neil De Marchi , The Popperican Legacy in Economics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20. Spiro J. Latsis , Method and Appraisal in Economics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21. Roger E. Backhouse , New Directions in Economic Methodology , First Published 1994 by Routledge 11 New Fetter Lane , London EC4P 4EE.

22. Lawrence A. Boland , Critical Economic Methodology ——A Personal Odyssey , T J Press (padstow) ,1997.

22. Rubinstein ,A. , Economics and Language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3. Bernard Hodgson , Economics as Moral Science ,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2001.

24. David Throsby , Economics and Culture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致 谢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继续研究的结果。经济学哲学(或经济学方法论)就像物理学哲学、心理学哲学一样,是科学哲学的一个分支。所以,特别感谢我的导师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刘猷桓教授,是恩师将我引向了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

2003年起我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得到了华民教授的亲自指导。在博士后开题、中期和出站报告会上,袁志刚教授、洪远朋教授、尹伯成教授、陈建安教授、石磊教授都给予了建设性的意见,同时,韦森教授、马涛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张雄教授、苏州大学狄仁昆教授、浙江财经学院陈惠雄教授也给予了不少的帮助。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外,我还参考乃至引用了国内外许多学者(详见“主要参考文献”)的观点,也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是,陈惠雄教授、许崇正教授、杨春学研究员、蒋自强教授、张熏华教授、陈宪教授、伍装副教授、王玉珍副教授的观点深深地启发了我。

本书也是我在中国第37批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经济学的‘科学困境’及人文转向”和辽宁省教育厅“经济学的‘科学困境’及人文经济学转向”课题基础上完成的。同时得到了大连市人民政府的资助出版。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是我在经济学方法论方面研究的继续,我真心愿意进一步钻研下去,取得更大的成绩,以答谢关心、帮助过我的人。

2006年12月